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E 国际贸易”的理论内涵与理论体系 陈文玲 颜少君 (005)

以自主创新不断增显中国道路的内涵和特色

——我国科技改革开放 40 年的探索和实践 刘琦岩 (018)

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关键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王晓红 (032)

• 宏观经济 •

中国银行业如何走向成熟? 黄志凌 (039)

完善战略储备功能 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何晓伟 别震烁 郭红 韦小迷 (049)

农村产权治理机制创新释放改革发展新动能 李红娟 刘现伟 (061)

“十三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难点及建议 易 信 (073)

• 国际经济 •

美元指数运行态势及中国对策选择 徐长春 (086)

国际湾区发展比较分析与经验借鉴 田 栋 王福强 (100)

• 智库信息 •

全球化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新对策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圆桌会议综述

逯新红（114）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5）



CONTEN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E – international trade”
Chen Wenling and Yan Shaojun (005)

Wit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o constantly enhanc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oad——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Liu Qiyan* (018)

The key to reshap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ang Xiaohong* (032)

How ca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become mature? *Huang Zhiling* (039)

Perfecting strategic reserve function and ensuring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He Xiaowei , Bie Zhenshuo , Guo Hong and Wei Xiaomi (049)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mechanism releases new
function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i Hongjuan and Liu Xianwei* (061)

The trends, difficulties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Yi Xin* (073)

The movement trends of the US dollar index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 choice
Xu Changchun (086)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bay area development
Tian Dong and Wang Fuqiang (100)

The new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new challeng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ountermeasures——a summary of the parallel round table meeting
at the Fifth Global Think Tank Summit *Lu Xinhong* (114)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E 国际贸易”的理论内涵与理论体系

陈文玲 颜少君

摘要：国际贸易形态和方式的演进是一个缓慢、渐进和自然演变的过程，当演进不断积累，在一定条件聚合的时点，就会产生颠覆性的变革或变化，成为新的不断替代的国际贸易方式或业态。E 国际贸易是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革命、业态变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变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贸易形态的演化，是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并将逐步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方式交互融合。本文旨在界定 E 国际贸易方式的理论内涵及其演化规律，探索构建 E 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E 国际贸易 贸易方式 贸易形态 国际分工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颜少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处长、副教授。

一、科技革命与业态变革催生 E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形态和贸易方式的演进，是一个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国际贸易发展而不断缓慢、渐进和自然演变的过程。当演进不断积累，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者特定的聚合时点，就会产生颠覆性的变革或变化，成为新的不断替代的国际贸易方式或贸易业态。

国际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部分产品作为商品在国与国之间交换，国际贸易由此产生。到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有所演变。这一时期，中国

与欧亚各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国际贸易活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社会分工不发达，国际商品交换和国际贸易只是个别的、局部现象，时断时续，时盛时衰。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地理的大发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和商品种类迅速扩张，产生了国际分工的萌芽。由于受运输工具等流通渠道的限制，此时贸易国际化还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当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制造业之后，自然经济让位商品经济，建立在社会化基础上发达的商品经济推动要素跨国流通，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流通中，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也从过去局部的、片段的、不连贯的、一国或几国的运动过程，变成了一个把世界各国都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市场。特别是二战以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纵深发展，出现了协调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方面的相互权利、义务的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GATT），1994 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取代关贸总协定。直至今日，WTO 及其规则依然是国际贸易规则与治理体系的核心。

E 国际贸易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革命、业态变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变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贸易形态的不断演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贸易流动呈现全新的跨国界、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链接状态，由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云计算和智能技术加快发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全面引发了经济社会综合性、渗透性、泛在性的革命。这种渐进式演化累积到一定时点，便引发了消费方式与传统业态的深刻变革，使国际贸易方式正在并即将产生颠覆性形态变化，形成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与下一代制造业业态共同发挥作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制造业的时空界限和地理界限日渐模糊，最终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实现通常不再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国际贸易一方面链接生产消费跨国分离，另一方面又通过全球价值链和 E 国际贸易平台重新链接。E 国际贸易将依托 E 国际贸易平台抑或新的载体和渠道，将全球范围内分离的生产过程和环节，将单一、分散的生产商、供应商、中间商和消费者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市场集成力量，包括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中间商集成和消费者集成，由此产生巨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流量，并不断改变着贸易方向，产生了更加便捷、快速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是以往任何时期的国际贸易方式都难以想象和达到的，这是国际贸易方式颠覆式演化或变革。

当前，虽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 WTO 为主导的多

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传统统计方法上的全球贸易低迷，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新型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发展，催生了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E 国际贸易反过来成为不可遏制的新型全球化的新载体。同时，中国开始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中国的 E 国际贸易正在以井喷之势发生、发展和发酵，已经并将继续创造 E 国际贸易发展的先发优势，将逐步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方式交互融合，有可能在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重塑贸易规则与治理体系，这对中国是重大战略机遇。因此，要适应这种变革和我国战略发展需要，必须明确界定 E 国际贸易方式的理论内涵及其演化规律，加快构建 E 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

二、E 国际贸易的理论内涵

（一）E 国际贸易的基本内涵

E 国际贸易，简而言之就是基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云服务、人工智能基础上所引发的新贸易形态，亦即国际贸易的 E 化，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网络化的线下线上一体化的贸易方式，是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综合表现形态。E 国际贸易是建立在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所形成大数据流量处理能力的基础上，依托 E 国际贸易平台的共享功能，以数据的流动带动全球消费者和生产者、供应商、中间商集成产生贸易流量，形成的一种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社会化、平台化和混沌化的全新贸易方式，是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

E 国际贸易是互联网革命引发的贸易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这种贸易方式不同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采购贸易，而是在这几种贸易方式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由于贸易方式的 E 化，这种新的贸易业态和贸易方式不断替代传统的贸易方式，是科技创新与贸易形态创新的交叉融合。E 国际贸易平台和渠道，将链接更多个性化需求和中小企业创业者的奇思妙想，降低其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使国际贸易不再垄断在跨国公司、大型企业主体或渠道商的手中，而是日益社会化、大众化、集群化、平台化、混沌化和社区化，将使国际市场进入消费者主权时代。随着 E 国际贸易的发展，传统贸易方式将逐渐被替代，并渐进演化成为适应形成时代发展需要，最终受到各国广泛认可的 E 国际贸易方式。

可以看出，互联网革命引发国际贸易领域的重大变革，为国际贸易注入了新的内涵：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跨境快速通关、各国无障碍流通、国际标准和认证认可体系通用的制度保障，智能芯片、射频识别、位置导航、

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的技术支撑，形成 E 国际贸易平台的巨大功能，为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消费者等传统贸易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平等参与国际贸易并成为国际贸易主体的机会。依托 E 国际贸易平台，可以使单一、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中间商和消费者获得或共享更多、更便捷的信息、资源和服务，并汇集成若干生产者、中间商和消费者选择的集成。这种由单体后新群体形成的贸易流动，将打破传统的地理行政疆界，打破传统贸易的不自由和不公平，使无形网络链接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联系的推进器，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推动传统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如 WTO 等的整体改造和提升，以继续推动下一代国际贸易朝着普惠、公平、自由、便利、共享的方向发展。

（二）E 国际贸易及相关概念辨析

在当前的理论与实践，有关 E 国际贸易的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更多情况下，E 国际贸易的内涵与跨境电子商务、马云所提出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和数字贸易等交叉使用，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 E 国际贸易的认识。

1. E 国际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

尽管当前对跨境电子商务也有不同的认识。王外连、王明宇、刘淑贞在 2013 年对跨境电子商务所下定义被引用较多，他们认为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我们认为，E 国际贸易是互联网革命引发国际贸易业态变革的产物，是下一代的主要贸易方式。而跨境电商是 E 国际贸易的现在进行时，并会逐渐转化为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其与 E 国际贸易的关系，就是现行贸易方式与未来贸易方式的关系。

2. E 国际贸易与 eWTP

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eWTP2017 年度报告》，eWTP 是一个私营部门引领、市场驱动、开放透明、多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公私合作平台，旨在探讨全球数字经济和电子贸易的发展趋势、面临问题和政策建议，分享商业实践和最佳范例，孵化和创新贸易新规则和新标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普惠和可持续发展。eWTP 是一个共创治理规则、交流最佳实践、建设未来设施、追梦普惠贸易的平台。可以看出，马云所提出的 eWTP 实际上是一个开展 E 国际贸易的公共平台，是 E 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新型贸易平台。而 E 国际贸易是下一代贸易方式，二者是下一代贸易方式与下一代贸易方式中基础设施的关系。

3. E 国际贸易与数字贸易

数字贸易是指依托互联网为基础，以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为供求双方提供交互动

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准的创新的商业模式，是关于数字品的贸易。与 E 国际贸易相比，我们认为，数字化是 E 国际贸易的特征之一，但 E 国际贸易不局限于此，它是互联网革命和大数据应用下的产物。E 国际贸易里面信息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通过大数据产生了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在内的流量经济，是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并将推动传统贸易向下一代贸易方式转变。是贸易方式的变革，是贸易业态的变革，二者是贸易方式与贸易内容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数字贸易的贸易品为服务贸易，而 E 国际贸易既包括数字贸易，也包括货物贸易。

三、构建 E 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

现实世界中的重大变化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之相适应，任何新的理论都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源于对不断发展的实践和经济现象的提炼和抽象，国际贸易理论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建立在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基础上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传统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无法圆满解释这一国际贸易方式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迫切需要创造一种基于成功实践和基于未来发展的新理论体系。

（一）E 国际贸易的外生理论：新型全球化理论，新型经济全球化催生 E 国际贸易，E 国际贸易加速了新型全球化发展，二者表现为互动发展的进程

E 国际贸易是不可遏制的新型全球化理论的新载体。E 国际贸易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由于 E 国际贸易发展，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自由，更加便利，E 国际贸易与新型全球化相通相容相互催化，反映出了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内在动力。其所体现出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大基本经济形态，万物互联的经济表征，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集成的经济链接，跨国公司、大数据系统、平台经济、消费者集成的新经济主体，E 国际贸易等下一代贸易方式正在引领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E 国际贸易体现出新型全球化中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是现代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性特征。E 国际贸易融合了制造业和服务业，通过平台集聚了全球的生产者、供应商、中间商和消费者，规避和跨越了传统国际贸易中那些被割断或阻隔的经济关系，并不断平衡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关系，使之逐步进入完全的、内生的“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世界里，传统意义上的诸多“边界”日渐模糊甚或消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并驾齐驱，互为表里、互相作用、互为溢出和转化的能量，导致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

禀赋共同进入流通，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日益融合，有形国界与无形国界日益交错。因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发展导致的现代经济演化，使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从沿着单向轨道前进转变为在双向轨道上加速前进，E 国际贸易既适应了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推动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平衡发展。

E 国际贸易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经济表征：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并形成网络体系，以大数据化、高度智能化、强融合化、移动化和泛在化，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E 国际贸易在全球新经济表征——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的链接中，可以使更多国家和地区进入越来越完善、越畅通、越有序的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领域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越密集、越完善、越顺畅，其产生的集成、集疏、集散、集约功能就越强，共享发展的机遇和程度就越高。这种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一旦被切割或呈碎片化，网络体系中的节点、环节或单体将失去其显在或潜在价值。E 国际贸易将提高全球的经济互联性，加快产业和要素跨国界流通的速度，成为直接驱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动力。在 E 国际贸易下，互联网与物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表征逐渐凸显，以云计算、大宽带、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全球范围内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普及为基础，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与管理为保障，以可扩展性、可移动性、泛在性、异构性、复合性、增值性为特征，进一步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E 国际贸易加快了构建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全球消费者的跨国需求拉动全球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本流通等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联通，推动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

E 国际贸易体现新全球化中的经济链接：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信用链和价值链等，这些虚拟链条较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大的粘性和融合度。E 国际贸易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增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E 国际贸易不仅通过提供新技术手段实现对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而且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协同互动发展，创造新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这些虚拟链条比传统的组织和经济关联更具有粘性，成为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链接方式。E 国际贸易进一步适应并推动供应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资金链的链接和价值链的链接，促使若干产业变成跨国界、跨区域、跨产业的链状链接或组合，既使市场呈现出潜在爆发力，也使信息加入流通产生巨大变量。E 国际贸易生成的大数据成为流通中要素禀赋甚至交易物，促进产业跨国界或跨区域实现更优组合。这种力量导致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优化调整。

E 国际贸易体现出新型全球化中新经济主体：跨国公司、若干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个人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方式或组织形式，具有更大的跨国界流通和配置资源的新动能。E 国际贸易为新经济、新业态、新经济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经济主体具有强大生命力，将成为跨国界流通和配置资源的主力军。跨国公司可以在 E 国际贸易中发挥更大的跨国经营能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跨国公司成为经济组织主导经济全球化主体的同时，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或更多中小微企业乃至自由创业的个人，这些迅速发展的新经济主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或催化剂，成为 E 国际贸易的新组织形式渠道。信息流通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变，成为“泛在互联网”，促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要素禀赋都能顺畅地快速流通，而大数据集成系统本质特征是泛在和跨界，这种新经济主体跨国界的能量，高于由人组织而成的传统企业组织。平台经济作为 E 国际贸易基础设施和组织形式，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主体，这种跨领域、跨行业、跨业态、跨国界的新经济的平台经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其规模越大，服务功能越强，平台经济成为跨国界的消费者集成、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市场集成的力量就越强。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选择，任何行政力量的限制或者理念的约束都阻止不了，只能被新型全球化条件下的下一代贸易洪流所覆盖。

（二）E 国际贸易的内生理论：国际化大流通理论，这是 E 国际贸易的本质特征，在中国引领下全球迎来了国际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混沌化的大流通时代

E 国际贸易作为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加速了全球范围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便利化、快捷化、共享化和顺畅化的内在要求。国际化大流通使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超越了自然和政治地理边界，E 国际贸易平台和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成为新型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和形态的内生动力，全球迎来了一个国际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混沌化的大流通时代。

E 国际贸易发挥的经济功能与现代流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相吻合。国际上大国之间的博弈越来越转向经济能力的博弈，经济能力博弈的核心在于现代流通能力的博弈，抢夺流通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焦点。E 国际贸易依托的 E 国际贸易平台实际上是一个基于新技术的现代流通中心，E 国际贸易的基础平台——E 国际贸易平台或现代流通平台并不只是以前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或者批发零售的概念，而是涵盖社会

再生产全过程的大流通，这个过程是以消费为起点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制造过程、买卖过程只不过是其中的中间环节。制造环节在整个流通过程中占比重越来越小，物流过程和物流成本成为现代流通的主体，信息成为流通领域中的最大变量，信息流成为最具有引领性的力量，随着信息向海量、即时传输、渗透性、泛在化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的业态，形成综合的、跨界的、智能现代流通能力。

E 国际贸易演绎了互联网革命下国际贸易和流通业态的深刻变化。当前，世界经济从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的信息文明时代，互联网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连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新实体经济。新实体经济给国际贸易和流通业态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即互联网通过改变信息获取、展示、连接的形式，推动国际贸易向下一代贸易和现代流通体系加速演化。由众多分散的消费者、生产者、供应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交易总量和金额巨大的平台，它带有准公共服务平台的性质，E 国际贸易平台经济成为流通市场各类资源、服务的网络集散门户和新型集聚形态，平台经济模式改善了传统流通模式在信用、融资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流通市场的极致细分化、专业化提升了流通体系的整体服务水平。E 国际贸易突出体现和演绎了新实体经济下国际贸易和流通业态的深刻变化，构建了一个实物展示与虚拟展示、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线下有形市场与线上无形市场相互交融、互促发展的新型全球贸易大平台。

E 国际贸易的发展诠释现代流通革命关于四流分离与聚合的理论内涵。现代流通理论提出，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后，流通过程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四流”进一步分离，形成各自独立的流通过程，只是在一个节点上相遇或者相重叠，最后完成商品交易的全过程，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传统单一的面对面的当面议价完成交易的商流过程正演化为多样化的电子商务交易商流过程，并形成了独立的商务流通规律，如 E 国际贸易和互联网商业规律等；信息成为流通中的变量可以完成独立流通的过程；传统现金当面结算的实物货币流通日益形成区块链技术支持的结算体系，以电子货币等形式表现的虚拟货币快速流通，形成独立资本流通过程；物流也和商流、信息流、资本流产生分离，形成物流规律，形成物流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社会化物流平台等。E 国际贸易作为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就是以“平台”为载体，以“信息”为灵魂，集聚“供、销、需”三者共享平台，延伸展现出“体验、认购、订单、采购、交易、结算”的现代流通四流分离与聚合的理论内涵。

E 国际贸易具有现代流通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流程化和混沌化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涵盖生产、交易和销售后全过程循环流通的先导性经济运行方式。现代流通理论认

为，现代流通是囊括有形与无形要素禀赋的全要素流通，且更多诸如无形商品、无形货币、无形资产等无形的、柔性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更高级的要素禀赋进入了流通，并迅速膨胀扩张，使得工业化初、中期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对独立的形态逐渐隐退，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呈现日益融合的态势。现代市场流通把几乎所有国家的分工和交易都纳入国际化大流通的轨道，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流程化的。生产是流通中的生产，更多的产品无法在一个国家、一个工厂、一条生产线或一个工序完成；分工是流通中的分工，现代流通把各个“部件”配置在所能发挥效用的地方；交易是流通中的交易，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禀赋，其交换价值的实现必然伴随着自身的流动；消费也是流通中的消费，是一种涵盖生产、交易和销售后全过程循环流通的先导性经济运行方式。E 国际贸易是互联网革命引发的贸易业态变革，其与下一代制造业业态融合发展将成为全开放条件下引领生产、引领消费和引领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带动制造业的流程再造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面向全球市场的 E 国际贸易及 E 国际贸易平台从市场流通需求的末端反馈，即从市场发出信号即订单开始向生产过程即制造业延伸，导致制造业从原来的矩阵结构、柔性生产线向全流程的信息先导模式转变，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而生产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反过来也会支撑和推动市场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带动市场流通和生产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机制。

（三）E 国际贸易的贸易演化理论：贸易形式是生产力水平、技术革命与业态变革在不同发展阶段相互作用形成的具体贸易形态，将推动全球贸易理论体系、评价体系和规则治理体系变革

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的形态和方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贸易方式，也不完全等同于当前的跨境电子商务、eWTP 和数字贸易等，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代表着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新型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形态。

国际贸易形式伴随着生产力水平、技术革命与业态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E 国际贸易是当今科技革命、业态变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变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贸易形态。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日益增强，国际分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生产的国际化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使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生产环节，各国参与国家分工不再以“产品”为界限，而是以要素为界限，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本土要素所独自创造，而是由多国以“要素优势”共同参与的结果。另一方面，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不同生产环节和流程按照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价值

链。要素分工与全球价值链融合发展使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和战略性网络来组织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垂直整合不同国家的贸易实现的，全球贸易主要表现为中间产品的贸易。与此同时，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成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E 国际贸易即为互联网引发的贸易业态变革的产物。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深刻发展变化基础上，国际贸易方式也在不断进行着创新和发展，尤其在国际贸易平台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大量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以后，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国际贸易向高度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网络化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方向发展，从而产生了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

E 国际贸易将成为体现普惠、智能、高效、便利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将渐次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采购贸易融合，成为新型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形式。E 国际贸易方式发展大大快于传统贸易方式，传统贸易方式或者升级，或者渐次被融合、替代，或者演化为下一代贸易方式。国际贸易方式中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正迅速被 E 化，向着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演进。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E 国际贸易将涵盖生产、流通、金融、投资各个领域，将囊括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各国可以从事能获得最大限度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更具粘性和融合度的各类企业，如跨国公司、平台企业、大数据集成系统和全球的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人，都可以依托 E 国际贸易平台创新贸易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E 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渗透的过程；既是在传统贸易方式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也是科技创新与贸易形态创新的交叉融合。随着 E 国际贸易的发展，传统贸易方式将逐渐被替代，并渐进演化成为适应形成时代发展需要，最终受到各国广泛认可的 E 国际贸易方式。

必须研究新型全球化下的 E 国际贸易及其发展规律，构建适应 E 国际贸易发展的理论、评价体系和贸易治理体系。E 国际贸易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全球性制度变迁和相关国家政策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一个全球贸易评价统计体系的重建过程，还是一个全球贸易规章与治理体系的重塑过程。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期，新旧贸易业态正在加速替代，新的贸易方式和贸易模式正在涌现，贸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以全新的视角研究 E 国际贸易和下一代贸易新方式，建立适应 E 国际

贸易发展的新理论，推动全球认识 E 国际贸易规律规则，重塑国际贸易理论、评价体系和治理体系。应抓紧建立全球崭新的贸易评价体系。E 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已经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性质、形态和方式，现有的贸易统计评价体系已不能准确地反映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与贸易现状，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贸易统计评价体系。应研究重塑新型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贸易规则与治理体系。面对 E 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现有 WTO 规则和治理体系已逐渐不能适应 E 国际贸易的变革性发展，要研究在新型全球化和 E 国际贸易条件下如何建立开放、高效、公平、共赢的国际贸易体制，依托 E 国际贸易平台，突破现有的国际贸易壁垒、障碍和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使所有参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国家、地区、企业、个人、消费者，都获得相对均衡的利益。

（四）E 国际贸易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扬弃

互联网革命推动人类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研究基础，动摇了传统经济学假设。“社会人”假设日益取代“理性人”假设，信息打破“资源稀缺假设”，丰富了传统生产要素理论，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催生出新的经济理论。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互联网经济与 E 国际贸易可以带来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增。互联网经济和 E 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决定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与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决定。在传统经济与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会越少；在互联网经济和 E 国际贸易条件下，出现了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剧增；而这种价格的剧增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用户的现象，从而产生了多重效益，这是互联网经济和 E 国际贸易的“外在性”。互联网经济和 E 国际贸易这种“外在性”，是 E 国际贸易新型贸易方式与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重大区别。互联网经济和 E 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以贸易平台为标志的信息现象对整个经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把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重心从货币现象转向了信息现象，使信息成为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核心的内生变量，从而宣告了整个下一代贸易方式的新旧交替。作为一种建立在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基础上的新型贸易方式，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其中部分适应性理论得以传承和丰富、发展。

E 国际贸易打破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前提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技术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而技术不变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重要前提。在 E 国际贸易背景下，现代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失效。另一方面，根据李嘉图的理论，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生产可

能性边界的曲线向外凸出。在 E 国际贸易下，许多产品如信息、服务等生产，由于其具有可复制性、无排他性等特点，其成本并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增的现象，边际效益递减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失效。

E 国际贸易深化了要素禀赋理论的内涵。随着现代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不断融入到国际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知识、信息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等动态的要素变化，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大大削弱了传统生产要素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比较优势利益也随之发生改变。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H－O）主要关注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等静态资源要素的结果禀赋，忽视技术进步和其他客观存在的要素，显然这种理论难以诠释下一代贸易方式。

E 国际贸易大大丰富了规模经济的概念，在 E 国际贸易和 eWTP 的国际贸易平台经济下，消费者流量和消费者评价等信息会随着商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集聚，而且这种随机游走的信息会使消费者个人行为聚合成一种贸易流量，并由此产生消费者集成形成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这就为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等内部规模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以有效协调规模经济与个性化需求的矛盾，实现生产与消费更具个性的经营，扩大了规模经济理论的作用范围。在 E 国际贸易发展中，大量虚拟企业、中小企业乃至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 and 平台共享信息、资源，进行生产经营合作，分散的贸易流量通过平台汇集成一个整体，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而在传统经济和国际贸易下，规模经济仅适用于单一的实体大型企业或行业，规模经济只与生产者有关。

E 国际贸易蕴含的自由贸易理念与实践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了冲击。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推动全球市场从原来的有形空间延伸到无形虚拟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地理限制，依托全球 E 化贸易平台，全球亿万消费者、中小企业可以真正实现全球连接、全球联动。特别是对于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 E 国际贸易，可以为这些国家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同时，在 E 国际贸易和 E 国际贸易平台经济条件下，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以满足单个消费需求为切入点的 E 国际贸易，将全球分散的消费需求变成一种市场集成，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其次，由于突破了传统地域空间的限制，E 国际贸易平台的在线交易会使得海关监管和征税的难度加大。此外，无纸化贸易成为未来贸易发展的趋势，对一国政府的外贸政策选择和实施简约有效监管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结语

目前,我国已经在杭州、天津、上海、郑州等 1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 E 国际贸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优势。本文有关 E 国际贸易的理论研究是作者在多年理论研究基础上,基于我国已经形成的发展 E 国际贸易的先发优势,从而提炼概括形成的支持 E 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当然,建立更加体系化、引领性的 E 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工程,有待经济理论界共同攻关,形成中国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与中国理论。本文是对 E 国际贸易理论的初步探索,以期使得中国的 E 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指导中国实践中独领风骚,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贸规则重塑,推动下一代国际贸易朝着普惠、公平、自由、便利、共享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文玲:《“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全球化伟大进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 4 期。
2. 陈文玲:《现代流通: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3. 陈文玲:《中国现代流通报告(上、中、下)》,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
4. 陈文玲:《现代流通基础理论原创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5. 陈文玲:《必须重建国际贸易理论和贸易评价体系》,《中国经济时报》2011 年 3 月 25 日。
6. 陈文玲、刘秉镰、刘维林:《新经济爆发性增长的内在动因——互联网革命与传统业态变革》,《全球化》2016 年第 6 期。
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著:《互联网革命与中国业态变革》,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
8. 阿里研究院:《贸易的未来:跨境电商连接世界》,《2016 年跨境电商发展报告》,2016 年 9 月。
9. 杨兆:《纵论国际贸易电子化——关于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行业中的理论 and 应用问题分析》,对外经贸大学学位论文,2000 年。
10. 史达:《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04 年。
11. 张夏恒:《跨境电商物流协同模型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长安大学学位论文,2016 年。
12. 王外连、王明宇、刘淑贞:《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现状分析及建议》,《电子商务》2013 年第 9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以自主创新不断增显 中国道路的内涵和特色^{*}

——我国科技改革开放 40 年的探索和实践

刘琦岩

摘要：我国科技改革开放是国家整体改革开放的先导。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科技发展战略、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举措相继推出，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显著提高了我国的科技实力以及创新能力与活力，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文化建设、科技管理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向未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正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供需矛盾持续、关键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的挑战。为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本文提出未来要把握正确指导思想、做好战略性布局、提升全球创新治理能力等三方面的建议思考。

关键词：自主创新 创新驱动 科技改革 中国道路

作者简介：刘琦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目前正步入新的发展周期。改革开放过去的 40 年，我国科技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大发展、大创新，并已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及治理框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勃勃生机。

^{*} 本文为“改革开放 40 年”征文。

一、改革开放将中国科技推入快速发展轨道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一个百年阶段，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一页；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让中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迈出了更大步伐，其中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事件、重大举措尤为醒目且意义深远。

（一）科技是先行开放的前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事业率先在国际合作中迈开步伐，并融入全球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抓住了冷战阶段后期的有利态势，以科技交流为先导，迅速扩大国际科技合作的领域和空间。1978 年 1 月，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这是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开启了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要和富有活力的新领域。科技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我国对外总体开放的先行者。同年，我国又相继与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国政府分别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79 年 1 月，中美签署了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由此，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全面展开。

（二）在解放思想和改革中拨正科技发展的指针

1978 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向全国发出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澄清了长期束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此后，中央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和发展部署，先后打开了文革中禁锢科技界的桎梏，共和国发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肇始阶段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此次会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针对当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实际，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并进一步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1983—1984 年，理论界展开了一次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的大讨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又一次有关现代化建设和科技思想的大解放。特别是其中关于我国与前两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失之交臂，我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李约瑟难题”等

问题的讨论，更让在近代史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失去了发展机会的国人深受启发。

1985 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简称“面向、依靠”方针），推出了改革科研院所的财政拨款制度，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探索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同行评议制、技术合同制，创建科技园区，开辟技术市场，鼓励技术入股以及科技人员创办或领办企业等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三）因应施策，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面向国计民生和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系列有针对性的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安排。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至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部署和贯彻《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科技金融及风险投资发展等系列改革发展举措。

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简称《规划纲要》），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提出了到 2020 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规划纲要》立足国情和远近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定了一批科技支撑发展的重点领域，瞄准国家战略目标筹措实施若干重大专项，从应对未来挑战出发超前部署了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同时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等方面也进行了总体部署。

2007 年，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2008 年，针对当时国际形势，国务院出台文件将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四大举措之一。2010 年，国务院决定立

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科技创新作为促进加快国民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性举措。

201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系统地谋划和部署了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同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发展，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科技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2015 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在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改革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推进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创建国家实验室、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及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打造区域性创新平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等方面作出了系列部署，提出了 143 项重大改革任务。

2016 年 8 月，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球代表大会，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纲要》，提出了面向未来建设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化部署、全力推动，规划了到 2030 年新一批重大科技专项，系统部署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各项任务，向着创新型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总体的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伴随着 40 年的科技事业快速发展。这 40 年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 10 年、中间 20 年和后 10 年。前 10 年是改革的启动部署阶段，也是改革的阵痛期；中间 20 年为改革深化推进阶段；后 10 年为国家新型创新体系建设探索阶段。前 30 年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推创新、求发展，并且从中努力实现了“从被动改到主动改、从被全球化到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转变。后 10 年则是在学习和摸索如何以创新促进改革并引领新的开放，这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探索期，以及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时期。尤其是根据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的新要求，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政策、改革等重大举措又进入一个密集调整期，以接近“摩尔定律”的周期对科技创新相关工作不断作出研判、调整和重新部署。这个阶段也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得的科技实力 and 创新能力进步较快的时期。

二、改革开放使科技与国民经济同步壮大

近 40 年来，我国科技实力明显增强，科技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文化进步提供了重要支撑，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深化并丰富了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目标，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科技实力步入世界前列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以要素总量、投入规模为标志。近 40 年来，我国研发人员队伍持续扩大，2016 年达 381 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提高，2016 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达 1.57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11%，已超世界平均水平。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使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形成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大型科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科技资源库、科学数据库文献库、行业技术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较完备的科研基础条件，一批世界瞩目的大科学工程，如黔南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合肥“人造太阳”核聚变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等相继投入使用，构筑起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基础。

（二）科技创新能力实现较大跨越

科技产出和创新成果是创新能力的基本标志。2000—2016 年，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从世界第 8 位提升到稳居第 2 位，被引用次数从第 19 位上升到第 2 位，材料领域列世界首位，还有 8 个重要领域国际科技论文引用率世界排名第 2 位。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 and 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算系统、国产大飞机、载人深潜器、新一代核能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新一代高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就举世瞩目。对纳米限域催化、等离子激光光学操控、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特高压电磁环境、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性研究，为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提供了科学支撑。近年来，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居世界第 1 位，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 3 位。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技术领域取得群体突破，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能运用前沿技术和引领产品创新的企业，如华为、腾讯、海尔、中车、国电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跨入世界 500 强行列。在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发布的 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已升至全球第 22 位，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三）科技创新创业活力持续迸发

创新主体的结构、市场交易量、活跃度等指标体现着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活力。目

前，我国全社会的研发支出份额中，78%约为企业的研发支出。2016 年全国技术市场合同超 30 万项，成交额 11407 亿元。政府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约有 780 家，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筹集资金达 1.5 万亿元（2015 年）。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双创”活动密布各领域，遍及全国各地，以创业促就业正成为经济转型发展期最重要的稳定器。至 2016 年，全国已发展各类众创空间达 4298 家，同已有的 3200 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400 多家加速器、17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 146 个国家高新区互动互补，互联互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较完整的创业服务链条和良好的创新生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力量。

（四）科技支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在科技创新实力、能力、活力量质齐升的同时，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大幅度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创新不断取得多方面突破，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基础工业、制造业、新兴产业、服务行业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重大产品、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开发能力以及系统成套水平明显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世博等重大工程建设和举国盛事。科技创新在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模式、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先导作用，以及在应对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应急救援、传染病防治等重大问题方面的支撑作用都得到有力体现。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测算，我国全社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增至 56.2%，科技创新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五）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展顺利

创新体系是国家或区域发展的动力总成。40 年的不断深化改革，已将传统的科技体制转变为基本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新体系构建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逐步增强，在研发投入、科技应用、成果转化、高新技术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已担当重任。高等院校在科学研究和知识转移转化方面，科研院所所在前沿探索、集成创新方面的骨干和引领作用都有系统性地增强。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军民融合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产业技术联盟、新型研发组织、科技中介组织、科技金融组织等规模日益壮大，功能持续完善，不断释放创新能量和活力，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源头引领和永续支持。区域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北京与上海作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省会城市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研发投入已超千亿级规模，成为建设创新型省份先行方阵。我国已有 61 个城市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目标，国家高新区、

创新型产业集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有效支撑和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六）国家科技创新的开放水平和影响力日益提高

我国已成为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在主动布局 and 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已与 15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一批标志性国际大科学工程。新近又启动实施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同美国、欧盟等主要创新型经济体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在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创新政策论坛、有影响的“双创”交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方面成功地主办了越来越多的重大平台性活动。我国的“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加强。

（七）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及文化环境不断优化

40 年来，我国的科技法规体系从无到有、由少及多，以《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科学普及法》《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为内容的科技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性的框架支撑。围绕战略规划部署、重大发展、重大改革开放等议题的科技政策和管理措施系统性、针对性不断增强，为科技创新实践在全社会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效规制。不断扩大的科学普及、日益深入人心的“双创”活动，已然让越来越多的创客、爱好者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到科技事业发展的大潮中来，科技创新不再像过去那样单是指科学家工程师、科技工作者这个群体的事情，正在成为整个社会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素养。

（八）政府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

40 年来，我国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经历了 1985 年、1995 年、2006 年、2014 年 4 次较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有些计划管理改革不是短期内能够调整完成的），经历了科技计划从无到有、从破到立，经历了从主要面向科研或研发管理到面向创新管理的较大转变，正在形成适合科技创新规律、体现国家意志的新型管理模式。国家先后改革并完善了科技奖励、项目管理、评价监督、人才评价、创新激励等制度，建立起科技决策咨询、部门协调、国家科技报告、全国创新调查等系列新制度，正在建设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推动完善国家科技信息共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开放共享等制度，使国家的创新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了空前的提高。

中国自主的科技创新原有初心，在 2006 年借中长期规划纲要的部署和实施开始发力，加大力度追赶并适时弯道超车，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都进入了快速跃升期。总体水平与

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出现了领先（跑）、并行（跑）、跟踪（跑）“三跑并存”的格局。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前有关中外技术竞争的比对研究，在信息、能源、环境、生物、农业、海洋、交通、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公共安全等 10 个领域 1149 项技术群体中，我国已有 17% 的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31% 的技术与国际先进基本同步，当然也有 52% 的技术与国际水平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跟踪、快速追赶”，到中期阶段努力“占有一席之地”，再到现在的“三跑并存”的局面，中国科技发展态势实现了本质性扭转。目前最能体现我国技术水平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套技术装备和系统性、平台性产品的出口，如超算系统、水稻杂交生产、青蒿素疟疾治疗、高铁系统、特高压输变电技术方案、水/火/核电系列设备、定位导航授时（PNT）服务技术体系等等，这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输出的创新贡献。

三、中国科技创新：40 年间做对了什么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建国之后就已开始摸索，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开始了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探索过程。中国科技事业 40 年取得如此进步和快速发展，主要靠什么？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中国特色等人所共知的因素外，以下的一些做法尤为值得记取。

（一）始终坚持用正确的指导思想为科技事业发展进行战略定位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领域核心的执行党，始终能够正确认识当代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及时总结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等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论断，以此来统一全党、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同时，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思想动力及社会基础。40 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全球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时刻，作为执政党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着眼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做出有利于科技发展以及科技生产力能力发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确保国家科技战略的贯彻落实和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

（二）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只有充分产业化、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效能的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而经济社会就是科技生产力实现其应有使命和价值的历史舞台。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科技工作迅速确定了服务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指导方针，并把解决国计民生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瓶颈问题、民生问题始终作为科技发展的优先任务。面向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共同目标，着力打造融科技经济资源于一体的新型纽带和载体（如高新区、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

着力构建科技和经济要素充分流动、充分结合的体制机制，不断扩大及深化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基本面，确保科技引擎作用和核心作用的发挥。

（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才为首要资源，化人口资源特色为人才优势

在理念上坚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崇尚“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把激励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才的创造力作为推动自主创新的政策前提。在方向上坚持科技为人所用、服务于人的基本要义，让巨大的发展需求成为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在方式上坚持依靠人民，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核心内容。在资源开发上坚持立德树人，始终把发现、培养、稳定和用好人才作为科技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性工程。

（四）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科技创新动力，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两个积极作用

一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坚持发挥好市场的基础或决定性作用，为科技创新营造根本性的体制环境，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形成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模式。二是加强政策引导和法规建设，改革和完善现代院所、政府拨款、创新创业、技术市场化、科技产业化、科技奖励、科技评价等制度，努力保障改革重建后的创新体系常态化运行。三是推进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局面，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四是注重发挥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要事。以“有所为，有所不为”来组织实施重大专项，充分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志，力求实现目标领域的技术突破，以重点跨越带动系统升级。

（五）注重遵循科技发展与创新规律，有效部署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

我国科技事业的决策者、管理者们坚持实事求是，深刻认识和切实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以及价值实现规律，既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又能将多种政策举措、计划安排有机衔接。国家统筹“人才—项目—基地”建设与发展，以持续提升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系统布局自由探索、国家目标导向、前沿技术引领、跨学科融合发展等各类别的研究，以有效促进国家的知识积累和应用；并行推进技术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资源链等建设和发展，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平台条件。

（六）注重发挥文化的根本作用，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软实力的总体体现，为本土创新意识的孕育、创新主体的培植、创新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科学文化、创新文化、

新科技文明放在文化总体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形成合力，动员科学、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投身到科学文化建设和科学技术普及中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普场馆、科普机构、科普服务都实现了长足进步，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尚得到根植性发展。同时，包容创新的文化环境日趋完善，人人崇尚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社会氛围正加速形成。

四、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态势和挑战

40年来，中国科技事业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和深层次的开放，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科技创新在发展中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深层次矛盾，有些是科技发展固有的矛盾，有些是在改革中不断积累的矛盾，还有些是新生成的矛盾。总之，我国的科技创新面临着新的局面和诸多挑战。

（一）一个持续的创新不平衡

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长期面临着多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区域间的不平衡。科技资源多集中于东部或南方省份，多集中于沿海地区，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或改革开放较为深入的城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六地的研发支出已占到全国的近60%；而以国际专利申请的数量来看，深圳一个城市就占到全国的40%之多。二是创新主体间的不平衡量。全社会研发支出结构中，企业的份额从2006年的71%上升到2016年的78%，已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位运行。三是企业间、行业间科技资源发展也不平衡。根据中国科技型企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543家科技型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78.3%，而其中前20名的投入已占到543家总规模的49.8%。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汽车、化工等7个行业的研发支出占全部企业研发支出比例超60%。但另一方面，全国的专利成果又为大量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所申请和持有，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创新创业也是由中小企业为主完成。

不平衡是任何创新体系都固有的一个特性或常态，全世界莫不如此。即便是在局部地区如一个规模较小的国家如瑞士、新加坡等，或者一个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其内部科技资源、创新活动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尤其是这类由科技创新带来的不平衡，又总是动态的、演进中的不平衡，即创新会持续产生新的不平衡，有的还是颠覆性创新。当然，创新的不平衡是把“双刃剑”，有些不平衡可以在进一步发展中消弥，但更多情况是科技或创新的不平衡正在被强化、放大，而且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对冲和平衡机制。

（二）两类瓶颈性的矛盾

一是不断发展的、对科技的总需求与尚且来不及形成必要的科技创新供给能力的矛盾。这种需求的矛盾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是经济的需求与创新体系的供给矛盾始终在持续；另一方面是在创新体系或创新链条上，原创性供给与成果转移转化、应用开发需求间也面临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矛盾。科技成果的供给侧——即我国的基础研究支出占全部研发支出的比例长期徘徊在 6% 左右，这就意味着 1 份原创性知识产出要对应着 15~20 份的成果转化需求。这部分是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一大瓶颈制约。二是不断提升的实力、壮大的资源、丰富的内容与尚处在调整提升中的管理、治理和监管能力之间的矛盾。区域间、部门间、企业间各创新主体的分隔、合作困境依然存在。过去有一些政府引导性计划，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没有用很多的投入，就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农村农业方面营造出了很好的创新局面。我们需要总结相应的经验，这其中最要紧的还不是投入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实现有效的资源整合与不断优化的顶层设计。

（三）三个系统性转型

一是科技创新自身发展动力模式的转型。过去基本上以科技工作者为核心的动力模式，正在转向以全社会的创新创业者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就是现在常说的“双创牵引、双轮驱动”。二是科技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型。过去的关系模式是以经济问题、目标、矛盾为核心，科技创新只是辅助性、边缘性、后台性事务；而今正在生成的模式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并且需要进一步推动全面的创新，实现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五大理念”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新目标。三是宏观科技创新管理或治理模式的转型。上述两个模式上的调整自然就带来管理或治理模式的调整需要，特别是在新的时期，科技创新要实现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就需要统筹好法律、规制、政策、信用、自律、传统等方方面面的治理工具，实现引领、包容及负责任的科技创新。

（四）四个逆势错位或缺失

一是关于知识生产以及创新创业主体的认识。第三次科技浪潮以来，经由硅谷历练而成就的新型知识生产观、新型创新体系正为各国各界所接受，而我国在创新制度和政策安排上仍拘泥或沿袭过去框架下那种科研主体已有的分工和角色。当今跨界、融合、共享、颠覆，以及创新创业与商业模式、产业生态一体化等新观念，要求人们重新认识实现创新驱动所必须的知识生产、分工与组织，给予适配其能的战略定位。二是关于强调创新要素还是注重环境生态。国际上的策略趋势是越来越强调创新生态整体的效能，

这其中包括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科研诚信、文化包容、法律规制等更为复杂的环境因素，而我们还在政策层面偏重于强调单个创新要素的作用与价值。比如关于人才要素，已有相当多的、不同层面的政策分头予以重视，但政策叠加并没有使人才资源开发、作用释放的环境得到足够改善。三是关于创新组织方式。国外企业、大学院所都已纷纷开始转型构建“开源、众包、社交化、并行式的”创新体系，而我们的大量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受历史发展阶段影响）正开始弥补创建中心化研发平台的课。有的企业想跟上趋势，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可由于没有经历过中心化平台阶段，难以整合及掌控来自外部的创新资源。四是关于创新模式与策略。科技资源丰富、创新创业较为先行的国家，已然在越来越多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展开群体的、策略化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而我们正在弥补面向机遇管理、应对变革管理、实施转型管理或组织再造等系列内容的短板。这些内容虽然不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案本身当中，但有这样的功力是有效实施颠覆性技术创新策略的前提。否则，早晚会像柯达公司那样，眼看着被自己开发的新技术给颠覆了。

（五）五个能力方面的不足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这影响着我国科技最终效果，特别是引领能力的发挥。二是抓科技创新的机遇意识和能力不足。主要是针对重大创新机遇以及颠覆性创新机遇，在识别机会、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与主动而为。应对挑战、抢抓机遇的意识和能力制约，有的反映在思想观念上，有的则受制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动辄得咎，对参与新规则和新赛场构建反应迟钝。三是知识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足。我们还有很多基础技术、面向转移转化的工程化能力和积累都不够，重大产品或产业链主动架构能力不足，协同创新效率不高，致使一些领域科技基础仍然薄弱，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是面向时代要求的科技创新管理能力不足。主要在于管理意识、战略规划、运作体系和方法手段总体上落后于时代需求，富有创新思想又兼备专业与管理素养的高层次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高管人才十分缺乏。五是科技创新服务能力不足。这一系统性缺失表现在：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定位不清，政策不配套，规模上不去；政府组织和提供的公共科技服务功能不全、共享不够、服务不深入；社会化的创新服务组织、第三方组织、非政府组织（NGO）、志愿者组织等受重视不够，发育迟缓。

在科技事业范围之外，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矛盾和挑战。既然科技现代化是最为关键的现代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那么解决好科技创新面临的矛盾，破解相关问题，就是首先需要进行战略谋划的重大议题。特别是在新科技和产业变革进行期内，这些不平衡、矛盾以及能力上的不足，就构成了我们前进

中的障碍。一系列矛盾、问题、困境与竞争、博弈、追赶、超越等因素相迭加、交织在一起，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艰巨而复杂。

五、以自主创新不断增显中国道路的内容和特色

未来一个时期，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收尾性的工作，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科技强国目标等很多起承转合的工作，都将在此阶段陆续展开。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在此阶段将凝聚更多的资源，形成更大的力量，向着既定目标延伸。未来中国的经济规模、社会结构、产业竞争力、科技发展等等都会在世界排名方面展示出应有的水准，配得上大国、强国的地位。但这些都只是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外在表现。中国特色是一个文化的创导过程，中国道路是一个战略意志的创导过程。这类创导性实践以人性的理念、科学的预期为导引，融合了历史积淀与传承，释放实事求是的努力和奋发有为的创造。那么，将来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在内容上除展示出党的领导、人民为本、协商民主、民族气派等制度和文化因素外，笔者深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容和价值源自我们与时俱进、与民共享的自主创新。因为自主创新是创造历史的实践中最为积极活跃的部分，涵及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用行动和结果来彰显自力主张的创新、自觉主动的创新、自强主导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积极地实践自主创新，才能不断地增显中国道路的内容和特色。

面向未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及《“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众多有关科技创新的战略文献已发布实施。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已然明确，战略举措正在展开，针对要解决问题的政策已发布，一些必要的改革已行动起来。在贯彻落实当中，全社会需要重点把握好三方面关键性要点。

第一，知行合一，在自主创新中不断升级理论武装、开辟中国道路。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需要正确的理论思想为指针。40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颠覆性创新群集到来的挑战，我们要大胆解放思想，升级与时代和形势相适应的科技观、创新观、发展观，在把握好党对科技事业的政治领导的同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旗帜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进一步激发广大建设者、创新创业者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升华创新创业境界。围绕新理念、新体系、新布局、新要求，积极探索并构建基于中国创新实践的新思想理论体系，并与科技创新发展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定地把自主创新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巩固到位，不断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实践能力。

第二，远近结合，强化面向科技强国目标的战略布局。解决不平衡等诸多矛盾的关键，是着眼于战略和全局考量超前布局。我国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应按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总体要求，从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体现“三个面向”等方面考量，统筹各创新主体规划目标，统合架构和资源，突出问题和目标导向，围绕增强国家先发优势及引领能力、推动“双创”格局展开、提升原始性创新能力和科技供给保障水平、拓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空间、完善科技创新管理和服务体系、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和文化氛围等六大主题，加快形成六个层面的战略部署，着力破解影响国家和区域科技发展的重大体制及政策问题、瓶颈或短板问题，凝聚并开发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要素和资源，让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筑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第三，内外兼修，加快提升基于现代科技的全球治理能力。后小康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离不开中国与全球的同步发展。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更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广为应用、深度运用。国家在提升科技创新实力、能力、活力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提升科技创新对全球全社会的引导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战略管理者应把科技的引导力、辐射力和影响力视为科技实力及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研究并充分利用科技的渗透作用、倍增器作用，以及现代技术在经济社会事务中赋权、赋能和赋值方面的主导作用，着眼于全球治理、创新治理议程中的重大课题，有效地探索相应方案和路径。

40年来，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较高发展水平的变迁，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和深远影响的事件。40年的改革开放，与我们用科技、抓创新始终相生相伴，在未来它们还将相伴甚或融合在一起，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永续动力。

参考文献：

1. 万钢主编：《中国科技改革开放30年》，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郑新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不平衡现状需转变》，中国经济网，2014年5月15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1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 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编写组：《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201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5. 李政、杨思莹：《十年创新型国家建设：成就、经验与问题》，《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李蕊

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关键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王晓红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和严峻挑战，指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和结构性矛盾突出是其主要制约瓶颈，提出了重塑制造业新优势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首位，推动创新战略由跟踪模仿向引领跨越转变，推动创新设计引领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营造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生态环境。

关键词：制造业 自主创新 转型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也是强国之基；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也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2016 年我国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214214 亿元，同比增长 6.7%，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 28.8%，规模以上制造业吸纳就业 8221.1 万人，约占我国就业人口的 10.6%。因此，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重塑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我国是世界制造业规模第一大国，但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始终是制约制造业竞争力的主要瓶颈，尤其是新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引发的全球制造业变革时代已经到来，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日益严峻。这迫切要求我们以创新驱动战略为引领，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切实提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转型升级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实现价值链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既是当前

我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防风险、惠民生工作大局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制造 2025》战略，迈向制造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础。

一、当前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

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制造竞争的双重挑战日益加剧。

（一）发达国家以先发优势、创新优势和高端优势继续主导新一轮制造业革命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发达国家纷纷把振兴制造业作为振兴实体经济、提高就业水平、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工业 4.0 战略、工业互联网战略等重振制造业雄风，企图在新产业革命竞争中继续占据制高点。当前，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为引领的制造业革命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焦点。机器人、智能设备、智能工厂、可穿戴设备等智能化高端产品和装备正迅速占领全球市场；人工智能、3D 打印、云制造、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VR/AR/MR）、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迅速发展，正在形成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制造范式；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支撑的众创平台、共享平台、定制化设计等新业态和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大幅度提升了全球生产和创新效率。而这些引领未来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主要由发达国家所主导。不仅如此，苹果、微软、英特尔、谷歌、波音、罗尔斯·罗伊斯等一批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国公司正在引领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据美国品牌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公布的 2016 年度全球创新企业排行榜前 10 位中，苹果 2016 财年的研发投入达到 100 亿美元，已连续 11 年列第一位，其余分别为谷歌、特斯拉、微软、亚马逊、奈飞、三星、丰田、脸书、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拜耳。

（二）发达国家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大幅降低了本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发达国家为实现制造业回归战略，大都出台了关于土地、财税、水电、基础设施、人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支持制造业创新和发展。2014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拨款 10 亿美元组建国际创新制造网络，形成美国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和资源共享平台。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新政后又提出将制造业税率从 35% 降到 15% 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有效吸引了跨国公司回流和全球制造业投资，使美国经济得到重构，制造业竞争力得到增强。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根据有关研究测算显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 5 倍，但我国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 9 倍、物流

成本是美国的 2 倍、电价是美国的 2 倍、税收成本比美国高 35%，融资、营商环境等成本也均高于美国。因此，从综合要素成本来看，我们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三）国内要素成本全面上升导致跨国公司制造业转移速度加快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0—2016 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总量比重由 43.2% 下降到 26.5%。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且人力、土地、税收、能源等成本普遍上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加快将工厂向低成本国家迁移的步伐。如，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缅甸、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及中东欧地区，都成为跨国公司制造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跨国公司在转移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与之相配套的物流供应链和其他服务企业也随之转移，这一连锁反应对于跨国公司在华形成全产业链发展布局将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也将直接影响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结构和综合效益提升。从对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调研情况来看，我国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成本竞争优势明显下降，困难也明显增多。

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和结构性矛盾突出仍是主要制约瓶颈

（一）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是导致制造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短板

由于我国多数企业长期从事加工制造，自主研发设计动力不足、投入不够，缺乏技术积累和核心技术，且生产工艺落后，导致制造业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缺少自主品牌，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困境。

缺乏核心技术无疑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让我们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制造业 90% 的芯片依赖进口，发动机、液压元件、传动和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我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三位，但高端医疗器械 70%~80% 依赖进口；2016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达 2802.8 万辆，居世界第一位，但高性能发动机、芯片及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基本依赖进口；我国制造装备生产规模居世界首位，机床产量占全球 38% 左右，但数控机床的高档系统、关键零部件 90% 以上依赖进口。在机器人行业中，我国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 70% 以上依赖进口，进口成本占总成本的 40% 以上；高端机器人严重依赖进口，汽车、电子等产业的机器人应用几乎被国际品牌所垄断；国产机器人市场份额仅占 30% 左右，且主要处于行业低端。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企业使用“机器换人”，大多使用从德国、日本进口的机器人。

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导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据商务部核算，我国每 1000 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为 621 美元，而美国为 850 美元、欧盟为 700~800 美元。据测算，我国企业加工组装苹果手机所获取利润仅占整体

利润的 1.8%，苹果平板电脑仅占 1.6%。笔者曾调研过浙江一家为跨国公司贴牌的加工贸易企业，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市场大幅萎缩，这家企业试图建立自主品牌和自主渠道，但同样一件 T 恤衫，贴上跨国公司品牌的零售价达到 700 元左右，不贴牌的零售价在 80 元左右，这是十分残酷的现实。

（二）供求结构性矛盾是影响企业经营效益和抑制市场需求的关键因素

当前“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任务，实际上综合反映出制造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我国在家电、手机、电脑、水泥、钢铁、工程机械、造船、汽车、摩托车、服装制鞋、玩具、建筑陶瓷等诸多行业产能居世界首位，但普遍存在先进产能供给不足、落后淘汰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低端产品过剩，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剩的矛盾。

首先，产能过剩导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偏低、资源闲置浪费、生产成本提高和环境压力加大，同时也带来市场恶性竞争。目前，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2%、73.7%、71.9%、73.1%和 75%，均低于国际通常水平。2017 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 76.4%，虽比上年同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但是仍低于 80%~82%的正常产能利用率。2016 年中国制造业 500 强企业共实现净利润 5691.03 亿元，比上年下降了 88.6 亿元。产能过剩对制造业投资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2016 年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 31.5%，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同比回落 3.9 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增速低 3.9 个百分点。由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所带来的雾霾天气和环境、水质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最大的痛点。

其次，由于产品供求结构失衡带来的境外购物和海淘产品规模与日俱增，严重抑制了国内市场需求。我国奢侈品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但基本被国外品牌所垄断。近年来，国人境外购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2015 年我国境外消费 1.5 万亿元，其中 7000 亿~8000 亿元用于购物。我们到法国买香水、化妆品、奢侈品牌包；到德国买锅、小电器、指甲刀；到日本买电饭煲、马桶盖、婴儿尿不湿；到意大利买服装、箱包、皮鞋等。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许多商城和专卖店里都配有汉语导购，无论是高档商城、专卖店还是大卖场，都有成群结队的国人前去“扫货”。

三、重塑制造业新优势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首位

转方式、调结构、补短板既是我国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远战略，也是当务之急。应牢固树立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以创新引领的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

应该看到，通过推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认真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产能合作不断深化，我国制造业正在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新动能正在加速积累。尤其是以数字经济、网络经济为主导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推动我国制造业总体上呈现出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效益回升、价值链逐步向中高端跃升的态势，正在朝着健康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国制造业整体效益和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一是经济效益和投资增速明显提高。2017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比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额 86809 亿元，增长 5.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1.5%。二是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2017 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1%，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6.2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12.2%。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医药、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增长 15.5%、11.6%和 11.7%，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9 个百分点。新产品的产量增速远超传统产品。2017 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太阳能电池、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的产量同比增长分别达 52.3%、40.5%、23.8%、21.6%、19.7%。三是高端制造业出口能力明显提升。2016 年我国机电产品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 57.7%和 20.8%。2017 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14.6%，占出口总额的 57.2%，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其中，汽车、船舶、计算机及零部件分别增长 32.5%、25.1%和 18.3%，均高于整体出口增速水平。四是专利密集型产业比重明显提高。2015 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12.4%，专利质押融资额达 436 亿元，各类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首期募集资金 42.8 亿元。知识产权贯标企业达到 1.8 万家，涌现出一大批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这些变化反映出创新驱动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产业创新能力增强，制造业结构正在由传统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演进的趋势。

（二）提高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思路

1. 推动创新战略由跟踪模仿向引领跨越转变

应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重点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由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向以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转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底子薄、

基础差、资金短缺，加工贸易为我们完成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的创新战略主要是跟踪模仿创新。而目前我们的国情国力和发展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综合国力、资金投入、技术积累、产业基础、开放水平、创新环境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实施赶超战略的条件。

近 40 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已经大幅跃升。2016 年 GDP 达到 744127 亿元，列世界第二位，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12%；全社会研发投入 15440 亿元，占 GDP 比重 2.1%。我国专利数量多年位居世界前列。2015 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 100 万件，同比增长 18.7%；2016 年我国三项专利申请受理量 346.5 万件，同比增长 23.8%，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 133.9 万件，同比增长 21.5%，连续 6 年位居世界首位；2016 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0.4 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30.2 万件，同比增长 14.5%。尤其是企业作为知识产权创造主体的地位不断提升，2016 年企业占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比例均达到 60% 以上。跻身专利申请量前 10 位的企业主要是制造企业，其中华为、中兴通讯、京东方、格力电器分别达到 4906 件、3941 件、3569 件和 3299 件。我国在高铁、航空航天、海洋探测、高端装备、核电、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涌现出北斗导航、神舟系列飞船、嫦娥探月工程、长征运载火箭、蛟龙号潜海、天河超级计算机等一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涌现出华为、百度、联想、美的、海尔、格力、中核、大疆、比亚迪等一批创新型国际化企业。这些都标志着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进行原始创新，集中国力在重大关键共性技术上攻关取得突破，实现弯道超车。

2. 推动创新设计引领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创新设计是推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创新源于设计，创新贵在设计。设计是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源头，是将新的技术、知识、创意、信息等转化为产品、工艺、装备和服务的先导，决定着制造和服务的品质和价值。设计以用户需求为创新导向，通过集成新知识、新技术、新材料、新业态、新模式等不断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端化需求，同时引导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据 2013 年美国设计管理协会发布，福特、微软、耐克等以设计主导创新的企业 10 年股市价值高于标准普尔指数 228%。设计对于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作用尤为显著。芬兰绝大部分传统产业使用工业设计，其中纺织服装和皮革、家具、玻璃、制陶行业等传统产业有 80% 以上使用设计师，金属制造、机械制造、电子设备、计算机相关产业及电器零部件、橡胶和塑料制造、汽车制造、健康、食品、建筑、木材等产业有 50% 以上使用设计师。据调查，近年来广东省在使用工业设计的企业中有 90% 改善了企业形象，80% 开拓了新的市场，70% 降低了产品成本，企业利润的 40% 来自设计。

3. 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广泛应用，使创新模式由单位主体、资源独占的封闭式向开放融合、共创分享的网络化、平台化和社会化发展，使众创、众包成为未来的主要创新模式。要积极营造兼容、包容、宽容的创新环境，加强众创平台、创客空间等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在税收减免、房租、设备开放、创业辅导等方面加大政策优惠和支持力度。鼓励高校设立创业学院，让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鼓励大院大所、高校、龙头企业的科研设备仪器向社会开放，提高资源共享水平；发挥风险投资、互联网金融、公私合作（PPP）、众筹等融资方式的作用，降低“双创”成本和风险，让草根创业生生不息。

4. 营造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正确处理好新产业与传统产业、新业态与传统业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加快形成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格局，对于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应深化“放管服”体制改革、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方式、推动政府管理创新，通过破除垄断、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放宽准入、金融创新等措施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要加快电子政务等政府信息化建设，注重通过互联网、微信平台、大数据等提高信息服务能力和资源共享水平；加快复制推广“负面清单”“网上办理”“多证合一”“单一窗口”“多评一表”“一站式服务”等新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加快构建企业信用体系，提高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其次，加速推动服务业态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服务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已经成为提高制造业效率及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应积极推动“互联网+制造”、设计、物流、营销服务，促进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服务外包等互联网新业态与传统制造企业互动融合，加速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提升制造业价值链水平和价值增值空间。

参考文献：

1. 路甬祥：《创新设计与中国创造》，《全球化》2015 年第 4 期。
2. 许宪春：《2016 年中国经济运行的若干特点》，《全球化》2017 年第 3 期。
3. 许宪春：《2017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简析》，《全球化》2017 年第 9 期。
4. 王晓红：《推动创新设计实现新产业革命下跨越发展》，《全球化》2016 年第 9 期。
5. 王晓红：《推动创新设计迈向制造强国》，《全球化》2017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李蕊

中国银行业如何走向成熟？

黄志凌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然而，长大了，地位变高了，并不意味着成熟。回顾中国银行业“长大”的过程，充满着曲折和坚定探索，应该正确认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外金融机构的教训更值得我们认真汲取。惟有如此，中国银行业才能顺利走向成熟。

关键词：银行业发展 商业银行战略 金融危机 信用风险

作者简介：黄志凌，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持续探索和发展，中国的银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3000 多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2016 年末的 232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已从高峰时的 30% 左右下降到 2016 年底的 1.74%。2017 年年初以来各种媒体分析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 2005 年的不足 5%，提高到 2016 年底的 8.4%，已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这一比值的历史高位分别在 7.7% 和 8.5%）。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比重达到 57%（其中银行业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比重达 46%），而在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美国这一比重为 45%。作为银行经济学家，看见中国银行业不断“长大”，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我们也同时感到“长大”并不等于“成熟”，中国银行业如何走向成熟是银行家面临的更大挑战。

一、中国银行业“长大”的过程充满着曲折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银行业规模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的金融需求。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为新中国银行业带来了第一次发展机遇。根据对外经济开放、对内经济搞活的政策，中央政府开始对银行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在 1979 年 10 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①之后，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工农中建”四行相继恢复（分立）和成立。1979 年，为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恢复；为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需要，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②也从财政部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银行，后来由中央批准为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的国家专业银行；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经营，从而形成了中央银行加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银行业格局。

在银行业不断分设的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开始进行恢复建立，积极探索并发挥自身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1979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0 年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恢复停办了 20 年的国内保险业务；此外，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城市信用社，国内金融机构多样化局面初步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范围的扩大和步伐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也受到了高度重视。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在价格改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1986 年 1 月 7 日，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对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的职能分别作了规定，自此中国银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87 年，交通银行重新恢复，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等一批新型股份制银行相继设立，一些外国银行被允许在指定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上述举措给银行业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经营能力的提高。但此时的银行业还未摸索出一套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约束机制和管理制度，国有银行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束缚，行政化色彩浓厚。为此，对国有专业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的探索也已开始启动。

经过几年实践，简单的“企业化”改革思路不仅使银行业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①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1996 年 3 月 26 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也导致银行业自身问题丛生。于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政策性银行，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为分离专业银行所承担的政策性业务，1994年国家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部金融法律，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商业银行法》的实施，为国有银行从过去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确立了法律框架，为国有银行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商业化模式转变奠定了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我们主动思考一系列银行改革的深层次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虽然中国并未受到此次危机直接冲击，但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促使决策层下决心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巨大潜在风险。当时，由于外部监管缺失和银行信贷约束软化、市场财务纪律松弛、违规拆借资金难以回收，加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日趋恶化。与此同时，银行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对“银行企业化或商业化”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大量自办实体，经营混乱，导致主要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沉重，虚盈实亏，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衡量，四大银行都濒临“技术破产”。中国银行家最先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心一意办银行”^①的口号正是在那个时候首次被响亮提出的。1997年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曾就建设银行改革与发展问题以“五论”的形式撰写了系列文章，依次为《为什么要“死里逃生”》《怎样提出的“双大”战略》《关于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辨析个性，推进改革》和《一心一意办银行》，主要针对当时国内金融环境因多种因素出现了恶性竞争、高息揽储、违规经营、不良大增的恶劣情形，提出“两个在所不惜”“死里逃生”等重要战略思想。

1997年11月17—19日，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风险问题。1998年开始，通过成立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等手段，对银行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之后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近10个百分点。

外科手术式的资产重组还必须与内在体制机制重组相结合，银行改革发展逐渐找到了方向。简单地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划转“坏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不能保证“好银行”就能够诞生。事实上，传统银行剥离了不良资产后并不能自然转变为“好银

^①王岐山：《一心一意办银行——关于建设银行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五》，《建设银行报》1997年8月20日。

行”，新的不良资产又迅速产生。因此，怎样打造“好银行”就成为一个紧迫而深远的战略问题。2002 年，第二次全国金融会议召开，做出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新一轮商业银行改革的帷幕。2003 年底国家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 450 亿美元，随后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改革试点的总体目标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一行一策”的原则，2005—2006 年中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2005 年 10 月 27 日建设银行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2006 年 6 月 1 日中国银行 H 股在港交所挂牌交易，2006 年 10 月 27 日工商银行以“A+H”的模式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公开上市。在 2007 年初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则进一步明确了农业银行的改革总体思路，2010 年 7 月 15 日和 16 日农业银行正式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可以说通过重组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以及配套的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经受住了境外资本市场的严格检验，并由此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和飞跃，实现了质的提升。

二、对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的提高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是有惊无险，而且实现了“弯道超车”，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发布的 2016 年全球 1000 家大银行榜单，共有 119 家中资银行入围，其中 17 家中资银行跻身前 100 名，前 10 名中共有 4 家中资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分列第 1、第 2、第 4 和第 5 名。随着中国银行业排名的上升，有些人开始盲目乐观和自信起来，认为中国银行业已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我们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也有人主张利用这个时机去海外并购，快速做大做强，抓住现在难得的“抄底”机会，加快建成真正国际化的大银行。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银行业自身的改革、转型也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机构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客观上相对抬升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地位。当时，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几乎全军覆没，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国际大型银行损失惨重，股价剧烈下跌，市值严重缩水。与此同时，由

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有限，加之中央政府为应对危机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银行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一反一正，国际金融版图发生巨变，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一直稳居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前两名。

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地位提升是一件好事，迈向国际化大银行既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满足客户的需求。金融危机之后，大型银行服务的很多国内大型优质企业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业务扩展到全球各地，相应大型银行的服务就需要跟进。应该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银行业实力抬升，的确是大型银行国际化的一个很好时机。但我们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更不能持“抄底”的心态去并购、去买“便宜货”，尤其是银行家，更不能有投机的心态。况且交易价格只是并购交易中的一个环节，对于大部分交易而言，最具挑战的部分是在整合环节，整合工作的顺利与否，决定着整个交易的成败。笔者理解，现阶段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战略，还是要立足于以客户为中心。简单地说，就是客户走到哪里，银行的金融服务跟到哪里，“跑马圈地”抢市场不应成为大型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选择。

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必须基于自身独特的战略定位。银行在确定自身发展战略时，应重新审视经营活动的价值链，分析自身在哪些领域、哪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并强化这些环节。对于那些对价值创造贡献不大，甚至侵蚀价值创造的领域和环节，必须“壮士断腕”，集中有限资源用于创造价值、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例如，美国银行在发现自身的海外业务不具备比较优势时，逐渐将发展战略重点回归本土。虽然多数海外业务都有较好的当期盈利能力，但美国银行果断地将这些业务出售或者收缩，集中资源做好本土业务。因此，一个银行的战略必须建立在自身禀赋、资源、能力以及内外部环境相匹配的基础上，要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不盲目跟风，这样才能摆脱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实现内涵式可持续发展。

还应该看到，指标领先不必然等于银行成熟，中国大型银行面临的挑战难以回避。虽然近年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各项财务指标都已看齐甚至优于国外同业，但国际一流银行的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财务指标上，更多还体现在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认真对照分析，特别是对照国际先进银行的经营管理实践以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相关标准和要求，目前国内大型银行还存在不小差距。

首先是战略趋同，导致银行个体缺乏核心竞争力，银行业体系系统性风险放大。战略趋同，这不仅影响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也不利于整个银行业全方位金融服务功能的发挥。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制定发展战略，采取何种商业模式，培养哪些关键能力来保持增长成为各机构最为关注的问题。面对危机后

的新局面，国际先进银行纷纷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战略，制定转型方案，推动业务全面转型和商业模式变革。如花旗银行在危机后及时调整战略，改变原有的全覆盖战略，集中资源在优势业务领域，聚焦在全球交易、投资银行和消费银行等核心业务，果断削减并逐渐退出资产管理等非核心领域业务，同时积极巩固富裕客户群体，拓展新兴市场份额；摩根大通银行则制定了业务协同战略，通过将商业银行、公司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及个人和社区银行业务版块协调发展，注重内部协调和交叉销售，同时着力发展轻资本业务，提升综合定价能力，推动转型增长，效果显著；富国银行通过立足本土，聚焦社区银行服务，树立严格的风险管理与谨慎的管理理念，对国际化和综合化道路保持谨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则聚焦数字化战略，通过建设一体化的数字化平台和直销银行业务，打造全渠道服务，改善客户体验，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成效显著。而目前中国许多银行在发展目标选择上普遍缺乏缜密的研究，忽视对自身禀赋、能力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和论证，随大流、全面开花，缺乏自身特色，难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银行间业务雷同，没有自己的特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业务结构趋同，导致金融服务“过剩与短缺”并存，同业间低层次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银行业战略趋同，导致一些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长期难以改变，甚至在一些局部因“抽水机效应”还有所恶化。例如，对农村、县域的金融支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等，迟迟难以扭转金融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的局面，甚至现在一些农村金融机构改制成银行以后，也追随大银行的战略，抢着在城里布点拓展中高端客户群体，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

更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战略趋同容易导致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叠加放大。如前几年银行业在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大宗商品贸易等领域集体激进经营所带来的集中风险暴露，近年来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影子银行业务的近似同步的大幅上升，使得银行体系内的关联度迅速增加，很容易集聚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是基础管理仍较薄弱，精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在基础管理方面虽然进步很大，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譬如政策制度一刀切，很多政策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市场的变化和地区差异。再譬如技术工具相对落后。对于现代商业银行来说，技术工具是衡量其管理水平最直观的标尺，其中量化管理技术工具是最主要的标志。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使用的管理工具以定性为主，在不少业务与管理领域主要依赖个人的经验判断，粗放经营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应的是信息数据基础薄弱问题。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支持。例如，

在营销环节，西方很多先进银行通过强大的数据库和数据挖掘技术，采取数据库营销方式，对客户生命周期进行数据化管理，提升交叉销售能力，成效非常明显。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在创设之初就提出要通过金融信息的分析处理来开发适合客户的金融产品，并率先制定信息驱动的数字化战略，借助丰富的客户数据积累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完成产品制定、客户选择和风险控制等工作，将数据思维融入在企业文化中，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迅速跻身全美前 10 大银行。过去国内大型银行对于信息数据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数据分散、缺失、标准不统一、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比较普遍。近年来，国内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在信息数据管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不少银行正在探索建立个人客户数据多维分析平台，对个人客户的分层和细分，加大对关键事件的建模分析，逐步实现分层服务、分类管理和精准营销，但对数据的挖掘利用程度还有待提高，信息资源的优势还未能全面发挥出来。银行业需要打造全面的数据生态系统，以客户数据为基础进行科学决策，培养数字化的营销能力，构建数字化流程，精简成本，提高效率。

再次是对经济周期等系统性风险不敏感。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的波动性是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在每一次经济剧烈波动或发生经济危机时，银行往往都是首当其冲。中国大型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加背后均有经济波动的原因，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轨迹十分吻合。传导模式都是固定资产投资扩大——货币信贷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增加——价格上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滞销——企业资金链断裂——形成不良贷款。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经济衰退阶段收缩、经济复苏阶段犹豫、经济过热阶段扩张”的亲周期性特征表现非常突出。^①

经济危机后国外先进银行纷纷加大投入，研究压力测试工具，提升风险预警管理能力。虽然“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发生，带来的影响和范围也有所增加，但已经有国外先进银行对此深入研究，针对各类风险设计出一系列压力测试，模拟黑天鹅事件等极端情况预估对银行的影响，并提前做出部署安排和应急措施。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还缺乏对经济周期和系统性风险的敏感性研究，总体来看重视程度还不够，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对具体客户和项目的风险管控上，还未形成应对经济周期的分析能力，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未建立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动的响应机制。特别是对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经济波动情况下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相关性、恶劣条件下的压

^①海曼·明斯基对金融风险“周期性”现象进行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所谓“代际遗忘”的规律，即今天的银行（贷款人）往往忘记了过去痛苦经历，上次的金融灾难过去了一段时间后，人们的贪欲又战胜了恐惧，因此又开始重复过去的错误。

力测试等，银行还缺少前瞻性研究，缺乏相应的风险识别、评估工具，缺少分散、缓释、转移等主动应对管理的手段。

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出资人还是监管者，对大型商业银行还缺乏一套科学统一的业绩评价标准。对于大型商业银行的考核，我们过去侧重于存贷款业务增长、账面利润增长等，后来逐渐完善，更加重视贷款质量、资本充足率、拨备后盈利等。应该说，依据上述指标都可以从某个侧面评价银行的经营业绩，但难以真实、全面评价银行整体的经营业绩，尤其是这些指标普遍存在滞后性。

评价标准实际也是一个“指挥棒”，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不仅容易产生监管套利，诱发逆向选择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中国货币信贷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传导。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收入必须覆盖相应的风险敞口。同样是赚 1 个亿的钱，承担 1 个亿的风险敞口与承担 10 个亿的风险敞口，其业绩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仅仅看账面的数据是不充分的，甚至还容易误导判断，要将账面数据背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敞口真实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有一个科学、客观的共同基点，否则根本没有可比性。

三、国外金融机构的教训更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在业界，一些人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甚至一些银行倒闭事件，抱着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这对于银行业走向成熟是极其不利的。银行就是银行，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与基本规律，只有善于从金融危机和别人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真正把握银行规律，才能最终不断走向成熟。

银行业具有鲜明的脆弱性特征，自身杠杆率较高，且时刻面临着信用层面、市场层面、操作层面以及政策层面等多方面风险的冲击，而且伴随金融的全球化、综合化、网络化，银行业天生的脆弱性将会越来越突出。另外，银行业的外部性特征显著。商业银行承担着整个社会的信用中介、支付中介等职能，涉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银行自身经营成功，可以有力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支持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银行经营失败乃至倒闭，则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储户、交易对手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带来损害，具有很大的传染和辐射效应，非常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危机蔓延，对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环境，容易掩盖银行内在的结构性缺陷。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在二战后几十年间经济实现腾飞，日本银行也迅速地赶超英美。1986 年《银行家》排出的世界 1000 家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中，日本大型银行在前 10 名中就占了 7 席（而且囊括了前 5 名）；同时，日本银行在海外大规模并购扩张。在享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

时，日本银行不同程度上忽视了自身存在的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等方面的缺陷，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等到经济形势出现逆转，银行体系风险迅速暴露，不仅自身大伤元气，长时间一蹶不振，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拖累了日本经济。殷鉴不远，日本银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汲取。当然，更值得认真吸取的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带给世界主要银行的教训：

第一，银行业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基础。从这次金融危机首先需要汲取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发展要回归本源。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发生时，仅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市场规模就超过 60 万亿美元，达到美国 GDP 的 4~5 倍，这显然是非理性的。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不断改革，金融不断深化，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良性循环。但同时需要看到，部分机构在盈利冲动下，通过资金层层嵌套、期限错配和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赚取超额利差，导致资金空转，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倾向。

第二，金融杠杆不能超越自身可承受范围。高杠杆比率是金融机构的固有特点，也是风险管控的重点和难点。提高杠杆比率意味着以同样的资本做更多业务、承担更大的风险敞口，是一把“双刃剑”。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来看，投资银行之所以首当其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杠杆带来的风险失控，超过了自身管理能力和资本可承受限度。^① 目前，国内很多银行在一些领域也存在过度放大杠杆、快速扩张的倾向。例如部分银行在息差收窄的背景下，追求资产规模扩张，通过同业业务、表外业务加杠杆，高风险经营，追逐利润。以同业存单发行为例，2015 年发行量为 5.3 万亿元，2016 年则达到 13 万亿元；截至 2017 年 4 月，同业存单的托管量达到 8 万亿元。

第三，创新不能游离于风险管控之外。不少人将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视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这些衍生产品本身，而在于管理者认识偏差和风险管控缺失。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很多金融机构对于债务担保证券（CDO）、CDS 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内在风险缺乏深刻理解和必要重视，有的则将其视同普通交易业务交由市场部门自行管理；有的虽然意识到这些业务可能存在较大风险，但并没有投入必要的资源进行独立、尽职的风险识别、计量、评估，而是简单地沿用外部评

^①2003—2007 年，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就从 20 倍左右上升到 30 多倍，如果算上结构投资载体（SIV）等结构性投资工具，事实上杠杆比率还要更高。雷曼兄弟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利益驱动，雷曼兄弟在危机前大量介入高杠杆自营业务，特别是与次级按揭相关的业务。2002—2007 年，充裕的流动性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场节节攀升的背景下，雷曼兄弟由此获得巨额收益，盈利水平远远超越同行，但是在 2007 年以后随着市场环境急剧变化，高杠杆也逐渐转化为高损失。

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和风险评估报告。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也存在类似的苗头。

第四，关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之间的相互伴生、耦合和转化。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初根源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次级按揭贷款大面积违约，属于信用风险范畴，但由此引起的大面积市场震荡，迅速引爆市场风险，二者互相耦合放大。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共同作用，引起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破产，随后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放大。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银行对各类风险的管理虽都有一定的研究和管理手段，但对各个风险类型之间的伴生、耦合和转化还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研究，这方面是一个重大缺陷。

第五，关注表外风险和表内风险的相互转化。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金融机构原先通过结构投资载体（SIV）、协议控制模式（VIE）等转移到表外的风险又重新回到表内。美国五大投资银行 2007 年底的表外负债总额达到 17.8 万亿美元，表外杠杆率达到 88.8 倍。长期以来，银行业主要关注表内风险（而且主要集中于贷款风险），对于表外风险重视不够，管控非常薄弱。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迅猛发展，一些表外产品创新（包括一些信托型理财产品）非常活跃。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2016 年 6 月中国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余额达到 26.68 万亿元，大量理财资金进行了委外管理，非银机构利用委外资金进一步加杠杆、加久期，大量的资金涌向债券市场和权益市场。这些银行表外业务因杠杆率较高，对利率较为敏感，一旦遇到市场剧烈波动将面临较大风险，会导致表外业务风险向表内转化，潜在隐患很大。

第六，正确认识现代计量技术和模型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现代金融离不开先进的计量技术和模型，但是一味依赖或迷信计量技术和模型也是很危险的。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基于精细的数理模型设计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其科学性最终没有经受住市场突变的考验。因此，借助模型但不要迷信模型，充分了解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局限性，做到专家经验和计量模型的有机统一，这是值得国内银行业认真汲取的一个教训。

观察中国银行业的变化，很多专家喜欢用是否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标准来衡量，并用“形似”和“神似”两个词来判断。“形似”相对要容易一些，譬如某些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资产规模、业务结构或收入结构向对标银行看齐；但是做到“神似”却不容易，需要深刻理解、艰苦努力和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以为，“神似”的核心主要集中在那些“看得见摸不着”的银行经营“灵魂”上，具体体现在银行经营理念、意识和文化方面。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我们期待其在经营意识和文化理念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

责任编辑：沈家文

完善战略储备功能 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何晓伟 别震烁 郭红 韦小迷

摘要：针对我国国家金融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本文分析了传统货币财政政策不足及商品储备制度建设情况，阐述了战略储备与国家金融安全的关系和作用，尝试提出建立企业联合库存机制，建立储备和生产能力协同保障机制，完善战略储备功能等防范金融风险的可行性举措，探讨了科学运用储备资产防范金融风险的方式与途径。提出了完善战略储备功能、构建大储备、储备资产流通，保障金融安全等政策建议，以期有利于促进战略储备工作和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关键词：战略储备 储备功能 金融安全 大储备

作者简介：何晓伟，国家物资储备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高级物流师；
别震烁，北京工商大学讲师；
郭红，国家物资储备局研究所经济师；
韦小迷，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

近两年，我国金融市场存在较大的风险，股票市场、汇率市场以及信贷市场都出现了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此，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把防控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与 2013 年公报提出的“着力防控债务风险”、2014 年公报提出的“建立健全防范各类风险机制”以及 2015 年公报提出的“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的提法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说明中央决策层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了更高的要求，从防范区域性风险、行业性风险等具体风险转为防范系统性风险。¹

当前形势下，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叙利亚、朝鲜半岛等局部军事冲突风险升级，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和灾难频发，人民币贬值预期升温，金融危机外溢性风险突显等。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局部风险可控，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大，迫切需要加大金融风险防范力度。战略储备是国家财政资金的实物形态，作为“积极财政 + 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重要工具之一，完善和发挥战略储备功能，是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我国国家金融安全面临严峻形势

（一）金融安全形势严峻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金融安全是指国家保障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防止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受到来自内外部的冲击，从而引发动荡、导致国民财富大量损失。2015 年 6 月，国内股票市场巨幅波动；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利率市场化，而美国不断利用美元储备地位回笼资金间接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穆迪、标普等国际主要评估机构利用信用评级影响预期，也客观反映出维持我国经济增长和保障金融安全的艰巨性。而我国仅有的 1842 吨黄金储备及尚未公开的石油、矿产等资源储备如何与美国占全球黄金储备总数的 25% 的 8133 吨黄金、3 个月用量以上的石油储备以及重要资源的全球获取能力相比较，如何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立足，如何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加大金融市场风险。英国脱欧之后，国际评级机构均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虽然短期对英国和欧盟经济的负面影响低于预期，但中长期看来，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而特朗普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等举措可以说是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信号，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对全球贸易的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会增加金融风险系数。

（二）传统财政货币政策存在不足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市场经济的理想境界。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缺陷，在价格机制极端情况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会削弱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功能。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避免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和个人的顺周期理性行为往往导致“合成谬误”，加剧周期的波动。

传统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财政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缺乏整体平衡能力。由于政策时滞，还可能出现逆调节。

二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递减。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加大，储蓄防范风险的意识增强，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无法显现。三是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不显著。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未因财政投资的增加而明显地改善，激励民间投资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四是国债发行规模过大蕴含较大的财政风险。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债务依存度大幅提高，2018年的财政赤字率预计还将增大，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使国债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率越来越低。国债政策还会产生挤出效应、李嘉图等价效应等。五是国家储备作为财政政策手段效用未完全发挥，粮食、石油等多类储备造成财政成本沉淀，累计资金沉淀规模尚未完全统计，预计超过万亿规模，功能效用有待评估。

货币政策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公开市场业务，由中央银行通过有目的地在金融市场上抛售或收购公债等有偿证券，达到调节市场货币供给量的作用。二是改变再贴现率，以促进或抑制票据贴现，从而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量。三是改变法定准备金率，调节市场货币供给量。公开市场业务因需要公众的配合作用有限；利率不能根本改变资金供求关系，还可能遭遇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时滞、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效应时滞的存在可能使政策意图与实际结果相脱节。

（三）银行体系抗拒风险的能力有待重新评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不仅关系经济自身发展，关系金融改革成败，更是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安全观”的核心命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一直以来，我国多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又是金融业的核心，抓住银行业这个“牛鼻子”，有效评估银行业、“影子银行”及其他衍生品规模和风险，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金融风险仍主要集中于银行业。具体表现在：国际竞争力不足，创新力不强，核心业务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表外资产运营被清理，利润主要来自息差。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水平一般在40%~50%，渣打、汇丰、花旗等国际知名银行甚至高达70%以上，与资产、负债业务一道，构成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三大支柱。而据2016年年报，我国工、农、建、中四大银行的息差收入占其总收入都在80%以上，其他股份制银行也都超过70%，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高，业务的集约水平和服务档次不高。尽管我国没有经历金融风险的集中和大规模爆发，但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经营危机乃至跑路事件时有发生，直接威胁到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加之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压力较大，银行体系自身结构问题与经济周期问题双重因素叠加，金融数据安全风险也在积聚，抗拒金融风险能力有待评估。

（四）世界范围内商品储备通货制度没有建立

“储备”一词最早见于《太公六韬·武韬》。我国古代就有常平仓制度和青苗制度。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金融学家格林厄姆基于我国古代常平仓制度创立了现代常平仓制度，二战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商品储备通货”制度（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认为选择 25~30 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作为世界常平仓，储存基本商品，同时发行等量商品储备券，通过商品和商品储备券相向流出或流入常平仓实现价格稳定，取代以往靠黄金储备决定货币供应的机制，保证货币供给和真实购买力挂钩，稳定世界各国间的汇率和市场价格。20 世纪 60 年代，卡尔多等也建议以商品储备为基础，发行国际商品储备通货。认为这样对出口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有利，并能制止萧条时期基本商品价格跌落和有效需求减少，保障世界范围内基础部门的投资。遗憾的是，美元国际储备地位至今依然无法撼动，世界范围的商品储备通货制度也尚未建立起来。我国稀缺关键资源进口受制于人的状况亦没有根本改观，境外资源来源地相对集中，运输通道单一，潜在风险大，定价权旁落。如据安泰科研究分析，2016 年全球精炼钴消费量为 10.38 万吨，同比增加 4.3%。2016 年我国钴消费占全球总消费量 45%。我国钴资源绝大部分从刚果进口，从产量口径来看，对外依存度是 97.4%；从消费量口径来看，对外依存度是 96.4%。2016 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为 5.56 亿吨，同比增长 2.8%；与此同时，我国原油产量跌破 2 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 65%。

二、战略储备保障金融安全的国际经验及途径分析

储备是有目的的储存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行为。战略储备资产，包括存储物资及相关设备设施，是国家财政资金的实物形态。储备资产的科学运营一直以来是储备体系建设的重点，需通过科学高效的运营模式来达到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在利用储备资产防范金融、产业安全方面，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诸多尝试与实践，只是操作时采用的说法与国内有所差别。如美国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二，2008 年次贷危机期间，为避免产业受损和优质资源廉价开采，美国封存本国最大的稀土矿，转而从我国大量进口，并协商企业形成矿产地储备，缓解稀土产业危机，间接维护金融安全；经合组织（OECD）国家联合建立的不少于 90 天消费量的石油库存，根据价格调整库存预期，避免因特定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石油危机及诱发进一步金融风险；日本通过立法设立专门预算支持天然铀、稀有金属等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并保证资产轮换及时，合资设立国家石油储备公司，低息贷款支持储备基地建设和日常维护，打通金融与

实物资产界限，有效维护能源及经济安全。

新形势下，储备作为一种公共物品被提供，在具备安全性的同时更要具备经济性，通过建立企业联合库存机制，健全储备和生产能力协同保障机制，完善储备功能实现方式，不单纯追求储备规模的无限扩大，来达到国家资产的优化配置，有效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

（一）建立企业联合库存机制，防范金融风险

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是金融风险的触发原点，而战略储备作为经济健康发展的“蓄水池”，实现形式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企业储备由于储备规模较小无法形成合力，并存在失控风险，采取国家储备主导的模式亦被国家政策采纳，而单纯依靠国家投资的储备模式效率也较低。受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以及生产资料中断风险的影响，准时制生产方式（JIT）和精益生产等零库存模式一直没能完全被企业接受。供应稳健性要求和物流、资金流的效率始终是二律背反。通过开展国家监管并掌握合理规模的物资，采用灵活的所有权和资金结算方式，将国家储备的物资保有量需求和企业的库存控制结合起来，是国家“保证公共服务被提供”的一种尝试，也是平衡资产配置、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有效方式之一。

根据储备物资持有是常态，动用为非常态的情况，战略储备管理部门可以与企业或企业联盟建立储备物资与库存控制机制，签订储量和轮换一揽子协议。以提供仓库和设备为企业周转场所和运输能力为条件，换取物资合理轮换期间内的所有权，根据不同物资种类和不同地区评估的结果，确定企业支付租金或者国家支付轮换期间内的占用费用。到达合同期后，企业重新获得货物所有权，从而避免物资轮换大进大出带来的资金运作困难和国家资金的沉积占用。如果需要动用，则根据市场价格给予适当补偿。企业通过协议合作，可以降低库存占用资金和库存成本，减少库存持有风险。采取分地区规模变动控制和总量控制相结合的方式，企业可以通过抵押物资进行融资，打通物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渠道。并通过市场价格的调节和合作制度的设计，实现物价稳定，维护金融总体安全。

（二）建立储备和生产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防范金融风险

建立科学的储备品种目录，将紧急事件分级，如 i 级紧急事件 ($i = 1, 2, 3 \dots$)，确定某项物资对应的需求。将能力储备地区按照可达性分级 ($j = 1, 2, 3 \dots y$, y 为最远地点；当 $j = 0$ 时，即为不动用储备能力，全部使用储备物资)。例如，可建立如下线性

规划模型：

1. 储备物资量 Q_c ，单位时间持有成本 H_c ，储备物资调运时间 T_c
2. j 级生产供应地区：单位生产量 M_j ，能力储备成本 H_j ，运输成本 C_j ，生产准备及整合时间 Ts_j ，运输时间 T_j
3. 可行的分批运输时间间隔 T_d ，每次固定成本 C_o
4. 物资缺乏最大忍耐时间 T_n
5. i 级紧急事件的需求量 Q_i
6. 恢复正常供应所需时间 T

$$Min:Q_c \cdot H_c + \sum_{j=1}^y M_j \cdot H_j + \sum_{j=1}^y M_j \cdot C_j + T/T_d \cdot C_o$$

s. t.

$$T_n > T_c + T_y + Ts_y$$

$$\sum_{j=1}^y M_j > Qi$$

$$Q_c > Qi \cdot T_d$$

确定类似地区分级应急能力储备供应保障数量模型，配置战略储备仓库和必要物资种类，完善物资动用触发机制和数量临界点，防范区域金融风险演化为系统性危机，危及金融安全。

（三）完善战略储备功能，防范金融风险

传统意义的物资储备是指为满足战争或战时急需而进行的物资积累和储存。现代意义的战略储备在保留传统内容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对战略物资进行蓄积和控制的行为，是中央政府出资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主要用于保障战时急需，预防重大能源资源风险和其他风险，提升在资源相关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缓解经济运行过程中供求剧烈波动——调节供求、稳定价格、防范风险等。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大背景下，优化战略储备，完善储备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将战略储备提升到维护国家安全通盘考虑的高度，深入研究战略储备物资的大宗商品属性，建立战略储备动态调整机制，适时调整国家战略储备种类和结构。国家储备与民间储备相结合，推行多元化的战略储备体系；运用财政、金融、企业信用评价手段，对承担储备义务企业给予优惠的贷款、贷款担保和税收政策，以及其他融资便利条件，鼓励企业参与战略储备，加强资源整合，努力扶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拥有稀缺性储备物资股权、期权或生产能力，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

三、存在的问题

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他还强调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

（一）金融危机外溢性风险突显

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外溢性风险主要是指：未来美联储进入连续加息模式后日益紧缩的货币政策。现在美联储持续加息和缩表，以及特朗普政府刚刚公布的大减税政策，造成世界范围的美元回流、资本外逃，这也对人民币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自2008年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从1%下调至0%~0.25%区间后，先后展开了3次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数亿万美元的流动性从美国流向世界各个角落。当前，美联储进入了加息通道，未来加息的步伐将会越来越快，直至进入每45天加息一次的“连续加息模式”。连续加息模式会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极端紧缩”，这就意味着超发的货币将被回收至美联储，从而让全球极度缺乏流动性支付能力，这将诱发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支付危机，最终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近年美中贸易平均每年美方逆差达6000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然受到持续的压力。

（二）对风险隐患研判不足

进入21世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此后希腊等国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我国是目前为止唯一没有经历过重大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经济大国。防范风险，不在于风险的大小，更在于风险出现的方式出人意料。当前，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面临各种风险的几率不断增加，防控风险首先要发现风险，找准风险发生的原因和衍变形式。在风险监测预警，排查风险隐患方面，国内监管部门的动作往往滞后于市场发展的步伐，常常在金融过度创新的负面影响暴露后才介入监管，凸显风险研判能力不足。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当前，资产质量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表外业务风险隐患依然存在，民间融资及非法集资风险有所抬头。在资本市场上，双向开放不断深化，部分上市公司经营压力有所增大，受多种因素影响，股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保险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保费收入快速增加，资金运用收益大幅增长，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但保险资金运用面临挑战，部分中小公司流动性风险值得关注。新常态下增长战略面临资产泡沫严重挑战，资产价格下跌导致抵押物价值下降，影响再融资，增加违约，尤其是历次金融危机中通常都有房地产泡沫的因素。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建设，强化对跨行业、跨市场风险及风险传染的分析研判，落实监管责任，防止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持续做好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工作，进一步完善金融安全网。强化底线思维，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机构合力有待发挥

我国现行的监管法律框架是分业监管。当前，金融混业、跨业经营已经事实上形成了分业监管不能触及和覆盖的领域，存在监管真空和漏洞。近年来发生的股灾、“伞形信托”等金融风险事件，都要求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全覆盖、全链接的协同金融监管体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严监管和自下而上的机构自律，还需要各级地方严格遵守市场规律，守好金融发展的底线，维护好本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从而使维护金融安全工作上下合力，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深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等，聚集各类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合力，并策略性分级，强化金融监管机构、金融从业机构、地方政府及储备资产管理部门间合力，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四）储备资产防风险效用未完全释放

我国的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295万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出现回升。从对外资产的结构来看，截至2016年末，外汇储备占我国对外资产的近一半（47.9%）。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较大，积聚了汇率风险，同时，储备资产防风险效用未完全释放。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为确保资产的可获得性，对冲价格波动风险，我国应在外汇储备池中加入商品资产，提高在国际商品市场中的配置规模，加大战略物资储备力度，获得资产分散化收益，同时获得与股票类似的风险溢价。国家进行商品资产配置，不仅要考虑商品的商品属性，还要考虑商品的金融属性，结合国际期货市场等反映出的金融属性，考虑基于风险收益的配置。这不仅为我国巨额外汇储备提供了投资方向，结合重要商品资产的金融属性，很好地对冲了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等风险，为我国充分利用外汇储备提升产业竞争力，确保经济安全，节约国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四、政策建议

20世纪80—90年代，德国社会科学家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后工业社会的巨大变迁。以上仅是看得见的“风险”，而仅仅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失败等事件让世界大跌眼镜、猝不及防，人们惊奇地发现，根据以往的知识或经验所进行的分析预测似乎正在失效。2017年国际政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特朗普将如何执政，欧洲多国大选何去何从，针对“伊斯兰国”（ISIS）的反恐战争能否胜利，朝核问题是否会继续发酵？过去一年也是数据盗窃、网络攻击和黑客活动频发的一年，而人工智能中潜在的负面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究其原因，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停留在过往的逻辑，并且想当然。探讨运用战略储备防范金融风险，就是突破常规逻辑，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可选方案。构建战略储备融入金融风险防范、协调联动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是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维护金融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可用政策工具之一；完善战略储备功能，促进战略储备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应当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重点可选工具之一，对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重要决策选项，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

（一）“大储备”纳入金融安全体系，保障金融安全

实物储备调控是各国公认的唯一能够实现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较好结合的宏观调控工具，只是前置成本各国不一。当国家处于市场之外时，储备是政府的一种间接的价值调控手段，发挥需求管理职能以实现总量平衡，具有计划性和宏观性；当国家处于市场之内时，储备物资是政府的一种直接的实物交易行为，发挥供给管理职能以实现结构优化，具有市场性和微观性。市场内的政府是为市场外的政府能够更好弥补市场失灵服务的。

表 1 储备调控目的和政策选择

储备调控目的	政策选择		
	采购	持有	处置
阻止或抵制卡特尔或单边政治行动	在供应稳定期主要从国外采购	无限期持有，阻止各种行动	在发生或即将发生供应限制和价格上涨时销售
缓解非政治性进口中断的影响	从国内外采购	持有至紧急事件发生	销售以克服暂时短缺情况，用于当前应用或增加行业库存
支持国际商品市场的稳定	在世界需求低迷时向国外厂商采购	需求正常时持有	在世界需求高涨时出口
减少当前消费，保护稀有物资	提高价格，抑制当前消费	持有至适宜时期	到技术进步，价值增值或替代品出现
缓解暂时过剩或短缺	国内需求低下时向国内企业采购	需求正常时持有	国内需求短缺时供应国内企业
平衡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顺差时采购	贸易平衡时持有	需求高涨时供应国内外用户

我国目前把外汇资产主要配置到国外的金融资产上，这样面临着外汇资产巨幅波动与永久亏损的风险。为了更好防范外汇储备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建议将商品资产加入到外汇资产配置池中。整合我国现有的战略物资储备、粮食储备、石油储备等 17 种物资储备，通盘考虑，形成“大储备”体系，增强储备实力，通过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进行协同运作，提高储备调控的综合效益。同时，对外汇储备、社保基金、财政储备基金和国家各类物资储备等后备性资金和物资进行统筹资产化管理。按管理与经营分开的原则，分别成立垂直管理的粮食、棉花、粮、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中央储备经营管理公司，执行储备决策。加快建立完善市场监测系统，掌握国内和全球生产消费量、进出口量、全球库存量以及期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完善决策咨询机构，提供核算管

理国家各类储备物资的库存品种、数量、市场价值、物资来源、收储价格、入库时间、品质等级、轮换期限、储运成本、储备库容使用情况等信息，进行成本收益考核，服务决策支持。

（二）促进战略储备资产合理流动，保障金融安全

随着国家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粮食、棉花、储备物资等品种的储备仓库作为战略、应急和宏观调控储备的功能日益增强，对引进高水平企业有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契合企业对高端物流服务的需求和地方产业升级战略需要。建议以区域储备联盟为基点，主动融合智慧物流发展，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特别是对各地区工业特色，发展优势和资源禀赋的深度挖掘，建立长效的联合运作模式。通过新建、资产置换、异地改建等方式，将储备仓库的布局与省市级重点物流园区规划相结合，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促进储备资产合理流动与利用。在已经形成规模的物流企业集聚地区，通过融合发展的方式，合作建立更加高水平的产业物流园区和基地，共同打造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组建整合共享的一体化信息平台，积累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效果数据。通过不断累积经验，进而实现全国范围的战略储备和现代物流体系整合升级，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战略储备作用，保障金融安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政府干预，降低过剩产能，去库存及创新供给；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发挥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的调控作用。可将战略储备纳入到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中来，用实物储备的方式替代部分金融资产，化解外汇储备巨幅波动造成的金融风险。盘活储备资产，充分利用战略储备的商品属性，建立风险对冲机制。完备商品期货市场的融资、套期保值功能，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发挥供给侧改革中资本的关键要素，以储备资产资本化、储备负债证券化化解金融风险。

（四）科学运营战略储备资产，保障金融安全

科学运营储备资产，适当选定并配置铂金、铜、锡、钨、锆等国内稀缺而流动性较强的品种作为投资对象，一方面可为国家对供给端产业调整政策提供缓冲，保障重点企业资金接续，维护金融安全，也能够下一经济周期获得收益或保值，避免产能再度极速扩张，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优化了储备资产结构，平衡品种间配置比

例，兼顾应急性与流动性，确保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对稀贵金属的储备（硬资产属性），可成为黄金储备的有效替代，当黄金储备不易获得时，加大稀贵金属的储备，可有效防范国际市场变化特别是汇率变动带来的金融风险。

（五）理顺储备与市场关系，保障金融安全

深入系统研究战略储备运作对市场主体、市场规律的中长期影响。储备运作是一把双刃剑，或许能影响市场短期的供需关系和价格水平，但不能改变市场长期规律。宏观调控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行业经济的分析预测能力，将重点放在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法规上，鼓励企业增加商业储备，让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慎用国家储备对价格进行调节，对需要收储和轮换的物资，应根据种植的季节性、供需淡旺季、储存时限要求等制定收储和轮库规划，定期发布储备库存信息，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尽量减轻对市场的冲击和产业自身发展的影响，保障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1. 李铁山等：国家物资储备改革发展问题研究论文集，2015（12）。
2. 何晓伟等：《国家物资储备局软科学课题研究报告汇编》，2015 年。
3. 于川信：《军民融合战备发展论》，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4. 陈建青、王擎、许韶辉：《金融行业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 年第 9 期。
5. 李灵舒：《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时代金融》2017 年第 3 期。
6.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
7. 苏立维：《中国金融安全的风险影响因素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8. 郑俊峰：《开放经济下国家物资储备调控机制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
9. 张红力：《金融安全与国家利益》，《金融论坛》2015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农村产权治理机制创新 释放改革发展新动能

李红娟 刘现伟

摘要：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是激活农村资产价值的基础和前提，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农村产权制度是农村治理的基础和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机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法律制度，建立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创新集体产权治理机制，建立健全权利和责任对称、执行运作程序规范的农村产权体制机制，将极大释放农村发展改革新动能，对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关键词：农村产权 土地制度 改革创新 产权治理

作者简介：李红娟，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刘现伟，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改革开放近 40 年，我国创造了无数个奇迹，其中最为瞩目的莫过于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路径就是一场从农村到城市再到农村的发展动能转变过程。它以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为起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创新，为社会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始终围绕着两种关系展开：其一是土地产权关系，即通过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满足以土地为载体的权利主体的利益需求，进行权益的分配和规范，调动各主体

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其二是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土地财产关系，通过激活集体土地要素，提高农民财产性收益，促使现有土地制度更好地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制度改革的实质是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农村产权关系调整满足制度改革的核心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面临严峻挑战，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缺乏有效动能。而与此同时，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累了大量的“沉睡”资产，尚未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价值和效益。为此，需要构建以村集体成员权和集体资产为纽带，兼顾公平和效率、兼顾各主体利益分配均衡格局的一种新型产权治理结构，充分释放农村发展新动能。

一、农村产权治理理论基础

（一）农村产权及产权治理

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率，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产权制度的演化过程，指出产权演化的最终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科斯（1937）认为市场是不完善的，市场运行存在交易成本，包括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费用以及衡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威廉姆森（1985）将市场运行及其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归结为交易自由度的大小和交易成本的高低两大因素，认为交易之所以发生是源于交易的特殊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交易成本理论是分析产权制度是否有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方法，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农村产权制度或者政策的产生、调整，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协调集体经济组织行为，促使农村产权结构方式和治理机制走向公正、效率、秩序和安全。

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及演变必然会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没有永远合理、完美的制度。在我国学术界和实践中，关于农地产权的研究往往是将“产权”“物权”和“所有权”的概念混淆使用。吴易风（2010）将产权理解为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亦即所有权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涉及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等一系列权利的统一与分离。魏文杰（2013）对未来 10 年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判断是，我国社会与经济稳定的基础是保护产权。产权本质上是一系列财产权利，主要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农村产权是以农村土地为财产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和，土地财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抵押权、继承权、地役权等。关于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以及产权结构的优化，也是当前就农地产权改革创新不断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西方学术界曾长期将“Governance”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宪法议题或法律执行活动”。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综合发展与作用的结果。世界银行 1989 年在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将治理的概念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格里·斯托克（1998）指出，治理意味着社会和经济问题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村产权主体模糊不清、产权内容界定不明、权责不分，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劳动生产力水平都较为低下，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程度不高，集体产权制度对农民个人财产权利重视不够。这些需要对现有农村产权制度和规则、农村产权结构和治理方式进行改革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村资产运营效率。

按照交易成本经济理论，交易商品或资产具有专属性，而不同专属性的资产决定了不同的治理结构。相比其他产权而言，农村集体产权专属性弱，保护力度不强，只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治理结构，方能更好实现其所有权人的财产性权利。农村集体产权的合理界定和产权治理结构的完善，可以更加有效地激励集体成员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农村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要素进入市场以寻求更高的收益，这就需要强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构建有效的产权制度和治理机制，以解决农村经济结构性问题和发展中的矛盾，进而激发农村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

（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演进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启动以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在完整继承并保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农地产权改革来推动农地利用绩效的不断优化。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第一轮具有实质意义的重大改革，在此轮改革过程中，农民以法律授权的方式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亦即使用权。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和发展，对农地产权改革提出了新的现实需求和目标，第二轮农村产权改革随之展开。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放开

和有限制的流转赋予农村产权更多权能，进而确立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资产其他派生权利，以保障农民带着资本参与城市化进程，分享改革红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和政府治理的需要等原因，我国的制度安排逐渐演变成了城乡二元分置的状态，农村的产权逐渐与国有产权存在身份性的差异，权能出现残缺，限制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影响了集体产权动能的释放。

近些年，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产权扩权赋能，要求“同地、同权、同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产权不平等、受歧视的现状，实现其财产权属上的处分权能。调整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利益分配格局，是农村产权改革的新任务。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之后，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又提出，加快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这对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大意义。

（三）农村产权的基本类别

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农民的土地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产权改革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村集体资产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资源性资产；二是用于经营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工具器具、农业基础设施、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以及其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资产份额、无形资产等经营性资产；三是用于公共服务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非经营性资产。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等法律规定，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既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土地、山林、水面、草原、滩涂等自然资源的产权，也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纳入会计账内核算的资产产权。现代产权理论认为，明晰的产权关系有利于形成资产的有效利用和社会化使用财产的约束。农村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已经成为权利主体矛盾冲突的交点，需要国家通过法律等途径明确界定权利关系中人们对土地资源的权利边界及其使用规则，以此促使土地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促进农村治理现代化。

二、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着农村经济的诸多层面，农村土地制度存在很多短板。一方面，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的迫切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农民的持续性增

收受到诸多制度约束，遇到了现实困境。例如，农村土地制度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农村土地要素的流动和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另外，在实践中，农民发展经济的有效抵押物严重不足，融资难、土地资产利用率较低等成为农村产权治理的短板。补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短板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农村产权制度供给不足，集体产权保护不力

我国法律对于农村产权的认知较为模糊，农村产权权能残缺，进入市场交易受到限制，不能实现其应有的经济价值，农村的土地权益保护处于混沌状态和弱势地位。

1. 农村集体产权主体缺位。农村产权所有权主体错位、客体模糊、所有权虚化，土地集体所有实质上成了少数人所有。现有的农村产权制度主体不明，产权所有人不确定和“空洞化”，政府对农村集体产权干预较多，对农民权益保护力度较弱，侵害农民土地权益问题较为突出，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平等的产权交易关系的形成。

2. 农村集体产权关系错综复杂。我国农地的使用权流转缺乏权威的法律依据，土地流转规则混乱，农民和农村集体产权关系界定不明确，产权侵权事件屡见不鲜。因为征地性质不明确、“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导致地方征地宽泛化，有些地方为发展经济和追求政绩，进行农村集体土地的乱征强拆，农民采取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捍卫土地产权，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反应，影响和谐与稳定。

3. 农村集体产权法律制度滞后。我国法律制度对产权改革创新设置了诸多的限制和约束。例如，《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物权法》等对农村集体土地抵押权进行了限制性设置，使得改革过程中产权的创新途径和运行机制受到一定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制后，以股份公司或合作社的经济形式进行运作，而现行《公司法》《劳动法》《税法》等对其正常运作发展匹配了较重的义务。

（二）农村产权权属意识淡薄，缺乏产权保护长效机制

改革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产权的所有权人，具有客观上的财产法人的资格，在农村经济活动中，承担着集体法人的权责。然而，由于产权权属意识的淡薄和传统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方式，集体经济组织并未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法人组织结构，缺乏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改革的活力和动力明显不足。

1. “政企不分”现象还普遍存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关系复杂，村委会代行集体资产经营权进行产权改革存在制度性风险。实践中，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农村集体经济，其管理和运营人大多数仍旧是由村委会担任，部分公司的董事长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村主任。这样容易出现集体产权委托—代理问题，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降低了集体产

权的运营效率。

2. 集体资产法人治理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渐建立和实现了村级账面净资产折股量化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但由于现行法律制度约束、配套政策供给不足等原因，各地在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法人治理结构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瓶颈。如对持股人员界定、股权结构、增资扩股以及新增股份量化问题，都亟须解决。

3. 缺乏农村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在农村产权改革实践中，有些地方由于对改革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往往造成产权改革的既定目标难以很好实现，或者改革进程受阻。农村产权改革制度设计的时候注重眼前的利益和成绩，对于长期性、均衡性和系统性往往考虑欠缺，导致无法形成农村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

（三）农村产权改革协调机制尚未形成，缺乏成本分担机制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推不动、理还乱”“事事有人管（有好处的），事事无人管（有麻烦的）”的现象，农村产权流转体系不健全，产权改革专业人员匮乏，改革经费无保障，改革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

1. 部门分块管理，条式分割。由于农村产权问题比较复杂，矛盾多、协调难度大，部分地区在推进农村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部门“各自为政”“单独作战”的现象，部门之间协调性差，影响改革整体推进的效率和后期成果的整合。

2. 横向对接不畅，缺乏共享机制。对于农村产权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各地标准不同、做法不一。例如，集体成员权资格认定的标准、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确认、农地确权颁证的办法等，国家尚未有统一办法和适用标准。各改革部门对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形成的成果，缺乏横向和纵向的共享渠道及磋商反馈机制。

3. 改革配套措施不足，缺乏成本分担机制。国家在授权机制、配套措施、风险防控、监督考核、成果评价、经费保障等方面，没有相应财政保障，造成地方农村产权改革创新成本高、责任重、压力大。例如，在对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改制过程中，集体经济组织处于“有法律地位，无法人地位”的尴尬局面，而对于改制后的村集体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税费标准按照公司法人标准执行，集体经济税负较重，不利于农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三、产权治理创新释放农村发展新动能

我国农村产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实质上是国家、农村集体和村民三者之间的权益确认和分配格局再调整过程。农民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安排中所享有的法律地位，

直接决定了其享有产权收益的水平。农村产权治理的目标归根结底是清产核资、明晰产权，通过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治理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合法权益，公平享受集体资产在保值增值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成果。

（一）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提供农民进城资本

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逐步弱化，资产功能属性在不断增强。资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流通是保值增值的必然之路。一直以来，农村土地产权不清、保护不严、流通不畅，使得农民即使撂荒也无法将其变现，进而改变其经济状况，农村土地作为农民核心财产，大多处于“沉睡”状态。如何更好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让农民享受更多的财产性权利，是摆在农村问题治理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加强农村生产要素流动制度供给，通过创新现代农村产权治理，唤醒沉睡的农村资本，将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提供农民进城所必须的发展资本。

（二）激活资源要素潜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确权来保障原有权利人的基本权利，是实现“几块地”可交易、可流通、可转让、资本化的基础，也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基础，确保农民在农村资产流动交易后能够享受应有权利。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明晰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为农民实现土地收益分配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不仅有助于保证集体经济组织和组织内成员个体的相对自主和独立，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经分离”，消除政府对农村产权交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进而明晰国家、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权利界限。产权改革有助于农村各种资源要素更为顺畅地进入交易市场，加快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激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潜能，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三）拓展集体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壮大农村经济

农村产权治理创新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新途径，集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传统集体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的社区经济，局限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有资金、资产、资源的配置，经营内容以资源发包、资产租赁等为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后，得益于产权清晰化和“准公司制”创新，封闭的集体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跃升。以产业园区为代表的一类经济模式成为新型的集体经济产权治理方式，极大提高了农地产权运作的经济效益。政府整体租赁村集体土地、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主动征地合作开发、不同村集体的部分地块置换，以及统筹规划，打破不同村集体资产界限，将极大提高核心区土地容积率和开发价值。

（四）探索集体建设城市新模式，带动新的城镇化发展

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产权制度和治理机制创新，带动新的城镇化发展。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消解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障碍，推动了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同共进。赋予农民更加清晰的集体资产股份或股权，消除了产权的身份性差别待遇，促进了人、财、物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均衡配置。创新农村产权治理机制，建立一套规范的政策框架，农村建设用地可上市交易，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通过租赁、作价出资（入股）、转让等有偿方式交易，不仅可以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为城市发展的要素资源，还能充分激发城市化的动力和潜能。

（五）加快农村治理民主化和专业化，保障农民民主权利

现代农村产权治理机制的产权制度设计、成员资格认定、产权股份量化和股份化改造，始终贯穿了村集体内部成员意愿，尊重集体成员诉求，通过参与式方法因地制宜、多样化地重构了股份合作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公司等新形态的集体经济组织。创新农村产权治理机制，建立和完善集体经济法人治理结构，将有力促使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产权为载体，实行股权量化和固化，建立股东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结构，有利于推进农村产权治理的民主化和专业化，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农民的参与权及话语权。

四、农村产权治理机制创新典型案例

以“产权治理”为核心推进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建立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的最有效途径。新型现代农村产权治理机制将成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的主流模式和未来趋势。

（一）江苏农村集体产权股份量化模式

江苏苏州通过改革股份合作制，将集体所属的经营性净资产量化到村集体组织内部成员，改变集体经济组织主体虚化而产生的产权落空状况。具体做法为：一是人人有股份、年年有分红。2001 年，苏州吴中区木渎镇金星村组建江苏省第一个社区股份合作社，把村集体经济组织 4295 万元的资产量化给 513 名村民，形成全村农民持股，采取股份分红的产权治理模式。二是物业出租、收益持久。苏南农村新集体经济的普遍做法是兴建标准化厂房、打工楼、商业用房等物业用于出租，经营风险小，收益持久而稳定。在苏州，以财产性、物业性收入为主的稳定性收入已占到村级集体总收入的 3/4。三是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市场，促进土地流转。在江苏有 40 多个县（市、区）已经成立农村产权

交易流转市场，其中东海县是全国第一个建立产权交易市场的县。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开展经营性资产的股份量化改革，促进农村产权流转，实现农村经营性资产的保值增值，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二）佛山南海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固化模式

佛山南海推动农村产权股份固化，改变以身份权来分配集体资产的制度安排。南海桂城平东村推行股份固化的做法是，进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产权改革政策动员，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民主决策，让所有集体内部成员通过投票等方式充分表达意见，达成集体决策。股权固化是指将原村级集体资产，按一定标准将股权份额量化给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后，股权量化到人、固化到户，以户为单位“生不增、死不减”，不再因家庭成员户籍、人口发生变化而调整股权。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推行农村产权股份固化，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权益分配方式，股份分配不以成员权为条件。南海的农村产权改革和治理机制创新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开展的，先将农地的收益权转变成股权，收取红利，股份分红偏向于福利，而不是投资。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将原来属于农户的土地再组织化的过程。

（三）浙江农村集体产权“三分三改”治理模式

浙江温州积极推行农村产权“三分三改”，确保权利二次分配的公平。所谓“三分”：一是政经分开，即把村“两委”组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开，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农村经济合作社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掌握村集体资产中的非土地资产，并经过股改成为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企业形式出现，其收益属于村民成员所有。甚至还可以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划分多个股份合作社。这些经合社将由社员股东依股权、股份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二是资地分开，即把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分开，使得非土地资产能够正常自由流动。实际上，就是把村集体土地资产和非土地资产的管理组织分开。在“资地分开”改革中，保持土地资产的集体性质不变，并经过地改后，由新成立的土地合作社代表村民进行掌握、流转、处置。而剥离后的非土地资产，则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代表社员股东进行掌握、处置，从而实现自由流动。三是户产分开，即把户口与产权关系分开，使农民在农村所享有的各项权益不因户口转换而改变。

所谓“三改”：一是股改，即对村级集体经济中的非土地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革。^① 通过股改，村民不仅能成为村集体经济中非土地资产的股东，而且将享有所持股份自由处置权。也就是说，村民拿到量化的股权后，既可以选择持有以获得分红，也可以将其转让。同时，量化到户、到人的股份还可以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流转。二是地改，即农用地“三不变”流转、宅基地助农民进城、建设用地同国有土地入市。“地改”就是在权属关系不变、用途范围不变、数量品质不变这“三不变”的前提下，推动农用地的入市流转。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可助其进镇入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则进入市场获得经济收益。^② 三是户改，即户籍制度改革，户口以实有人口、实有住所为依据，按居住地登记，剥离依附在户口制度上的身份、职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附属功能，还原户口本来的社会管理功能。浙江温州通过农村产权治理改革创新，使农村居民同等享有城镇居民的待遇，农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

五、完善农村产权治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尽管农村集体产权不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物权，但其治理机制与现代公司治理有内在的一致性。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农村产权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农村改革协调机制，加快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治理机制。

（一）健全农村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政策

1. 健全农村产权流转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补充和完善农地产权保护的条款，并对农地流转具体操作规则进行上位法的明确规定与授权。规定农村集体个人股权可以在集体内部成员之间流转，并逐步实现市场自由流转。完善《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明确农村产权流转的方式、途径、权益分配机制等，并对地方具体的操作规则进行明确授权。

2. 完善农村产权集体法人地位。抓紧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建立现代农村集体产权治理结

^①值得注意的是，股改仅限于村级集体经济中的非土地资产，耕地、林地等土地资源不得作为改革内容。同时，量化资产股权直接设置到户，原则上不设集体股，但应提取一定比例的村集体净资产作为改制风险金。而新成立的村级股份制经济合作社，须经上级审批组建，并向社员股东出具股权证书。合作社按照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可以选择承包、租赁、招标、拍卖集体资产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其收益按成员拥有股份进行分配。

^②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温委〔2011〕1号），2011年1月1日。

构，确立集体法人地位，理顺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鉴于立法周期较长，可考虑先在前述文件中对集体经济组织及内部成员资格认定做出原则性、方向性规定。对前期产权改革探索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政策、制度等，通过一定程序或合理的方式从国家层面予以认可，或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更进一步的政策保护，甚至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在巩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后续改革。

3. 创新农村产权融资制度机制。创新开展农地产权抵押融资和服务，对农地抵押贷款融资等条件进行具体设定，促进农地产权保护。同时，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公司、产业园、股份公司等新型农村经济组织，从赋税、人才引进、公司注册资本等方面予以分类处理和优惠。完善农村产权资产评估机制，依托现有农经资源和信息服务平台等，建立农村产权信息服务系统和综合服务平台，将农村各类资产资源逐步纳入产权交易范围，提供产权交易、法律咨询、资产评估、融资抵押等服务项目。

（二）建立农村产权改革部门协调机制，加强改革效果跟踪和反馈

1. 加强农村制度改革部门间对接协调。建立农村产权改革协调机制，由高一层级的政府部门，组织协调农村产权改革涉及到的职能管理部门和农村集体经济基层组织，进行业务对接和问题沟通反馈工作，形成信息匹配对称机制，及时发现总结产权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难点、焦点问题，充分讨论和协商，寻求有效便捷的解决途径，提升改革效率，减少改革阻力，增强地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 建立有效的改革跟踪和反馈机制。农村产权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成果。从区域上看，南方发达地区产权治理机制更为成熟，改革推进力度相对更大，改革的措施和路径更加灵活。不同区域的农村产权治理机制创新存在诸多共性和差异性，以及形式各异的解决路径。这些本身就是改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区、各部门应建立广泛的经验交流和反馈机制，及时总结、跟踪和反馈改革成效，形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共识和合力。

（三）创新农村现代产权改革模式，完善集体产权法人治理结构

1.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新。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很大，农村产权情况复杂，推进农村产权治理模式创新必须进行周密设计和精心组织，在坚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特征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分类改革设计，避免“一刀切”式改革以及简单模仿和粗糙复制式创新。

2. 完善现代集体法人产权治理结构。按照“归属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设计农村产权改革模式，明确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

济组织之间的权责范围，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集体经济组织设立运作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主要负责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和股权分红，将原先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交给村委会承担。村党委负责组织建设和廉政监督工作。

参考文献：

1. [美] R·科斯：《财产权与制度变迁》，胡庄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 林岗、张宇：《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3.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4. [美] 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5.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6. 吴易风、关雪凌等：《产权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7. 吴晓燕：《农村产权制度变革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
8. 刘守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实施》，《法商研究》2014 年第 2 期。
9. 魏杰、施成杰：《核心是有效保护产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统一效率与公平》，《社会科学研究》2014 年第 4 期。
10. 黄砾、谭荣：《中国农地产权是有意的制度模糊吗？》，《中国农村观察》2014 年第 6 期。
11. 朱新法：《江苏农村改革明晰集体产权 农村治理“政经分离”》，《新华日报》2015 年 11 月 5 日。
12. 刘德浩：《“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与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基于成都市农村产权改革的调查》，《管理学刊》2016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十三五”时期我国城镇化 发展趋势、难点及建议^{*}

易 信

摘要：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将呈现重心从劳动力城镇化为
主向消费者城镇化为转变、动力从产业驱动为主向产业与消费双轮驱动转变、模式从粗放型
向集约型转变、人口向大城市加快集中以及形态从大城市主导向城市群主导转变等五大趋势特
征。同时，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城镇综合承载力较弱、发展理念有偏误、城乡二元
管理体制和传统城市管理体制有不足之处等突出问题和难点。“十三五”时期，应顺应城镇化发
展趋势，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创新城镇化发展模式，走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布局合理、绿色低碳和
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趋势 城镇化难点 新型城镇化

作者简介：易信，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城镇化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显
著成效，对于释放有效需求、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减少贫困和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影响人类发展的一件大事。然而，随着我国城镇

^{*} 该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和战略思路研究》（项目
编号：14ZDA022）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过去一个时期以数量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道路已越来越难以持续。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绘制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蓝图。创新城镇化发展模式，着力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走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布局合理、绿色低碳和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前瞻性地研判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分析我国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难点，对于更好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界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和难点的判断

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判断离不开对城镇化发展现状的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伴随我国户籍制度从城乡隔离到开放本地有效的蓝印户口，再到中小城市的落户准入条件的放开，政府对户籍的管制程度越来越宽松，显著改善了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流动的制度和条件，促进了人口加快向城镇集聚的城镇化进程（王一鸣等，2013）。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从 1978 年的 17.9% 上升到 2016 年的 57.4%；城镇体系不断健全，城市数量从 193 个增加到 656 个，建制镇数量由 2173 个增加到 20515 个；城市布局不断优化，从沿海化、非均衡发展向内陆化、均衡发展演变，初步形成“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镇镶嵌体系，以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中原、中三角（武汉—长沙—南昌）、成渝、关中—天水等覆盖沿海内陆的城市群。不过，该时期的城镇化还只是劳动力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的第一阶段，因为大量进城的农业转移人口虽已纳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范畴，但难以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转变，没有被完全市民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形态也存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错配问题，东部一些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而中西部资源承载能力较强地区的城镇化潜力还有待挖掘，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也不高（王一鸣，2014；宋立，2014）。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处在 30%~70% 区间，仍处于城镇化较快发展阶段，到 2020 年，预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大约达到 60%（王一鸣，2014；郑新立，2013；李京文、杨正东，2015；高春亮、魏后凯，2013）。对于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部分学者基于对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要求判断，我国城市发展将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由功能型城市向特色型城市转变、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由单体向网络型发展转变（陈文玲，2013），城镇化将呈现中西部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化、

城市群化以及就地就近城镇化等新特点（马庆斌、王萌萌，2015）。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三大都市群、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次级区域性城市群、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市化等三种模式同步推进、相互协调则是我国未来城市化的主要特色（郑新立，2013）。也有部分学者基于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判断，我国城镇化将呈现发展理念人本化、发展方式集约化、发展形态集群化、城镇体系合理化、发展模式多元化、发展道路生态化等趋势（杨兰桥，2013；王一鸣，2014）。还有部分学者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判断，城市群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而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则是新世纪初（2030年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三个重点区域（徐匡迪，2015）。

学界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难点的判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李京文、杨正东，2015；杨亮、陈波平，2016；徐匡迪，2015；王一鸣，2014）；二是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土地高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外延式城镇化发展方式制约了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陈文玲，2013）；三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还不能和城镇居民平等享受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也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王一鸣，2014；李京文、杨正东，2015；马庆斌、王萌萌，2015）；四是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协调，城市群协调机制不健全等，也制约着我国城镇化优化发展（王一鸣，2014；徐匡迪，2015；马庆斌、王萌萌，2015）。2014年，尤其是我国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逐渐改善，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城市群对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但城镇化进程中多年累积的产城不融合、人地矛盾、城乡就业分化、征地拆迁与城中村改造等矛盾与问题仍没有根本改变（李娣，2017）。

综合来看，学界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判断虽有共识但仍存在一些分歧，对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其原因主要是各研究的判断标准及关注的重点问题有差异。笔者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既离不开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也离不开我国特定发展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我国经济大转型背景下，判断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难点，既需要借鉴国际发展经验，也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发展阶段变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发展条件转变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判断

“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土地资源稀缺性不断突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土地

扩张为导向的粗放城镇化、以人口红利支撑的低成本劳动力城镇化、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主导的城镇化难以为继，将倒逼我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城镇化发展模式，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一）城镇化重心从劳动力城镇化为主向消费者城镇化为主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先行发达国家城镇化略有不同的是，我国走的是先劳动力城镇化后消费者城镇化的两阶段“分步走”城镇化道路。目前仍有高达 2.7 亿已实现劳动力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而不能完全被市民化，使得作为劳动者的生产过程和作为消费者的消费过程存在城乡分裂。“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尤其是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的落实，各地倾向于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进程将会加快，再加上目前发展阶段的消费升级加快，我们将从过去的劳动力城镇化阶段进入到消费者城镇化阶段。为量化分析这一趋势特征，笔者构建广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采用的虫口（Logistic）曲线模型，预测未来我国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率变化趋势。其中，生活方式城镇化率指以户籍人口和农村举家转移人口为基础测算的城镇化率，反映了我国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是反映我国消费者城镇化水平的较好指标。Logistic 曲线模型如下：

$$U_t = \frac{A}{1 + \alpha e^{-\beta t}}$$

其中，U 为各口径城镇化率，A 为城镇化率极限值（ $A \leq 1$ ）， α 、 β 为待估参数，t 为年度表示的时间。基于 1978—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数据，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方法估计模型。在模型估计过程中，我们将年度时间 t 进行了减 1978（基点年份）处理。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一是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 Logistic 曲线拟合方程：

$$U_t = \frac{1}{1 + 4.919952e^{-0.0487324t}}$$

二是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 Logistic 曲线拟合方程：

$$U_t = \frac{1}{1 + 5.471159e^{-0.032952t}}$$

三是我国生活方式城镇化率的 Logistic 曲线拟合方程：

$$U_t = \frac{1}{1 + 5.071482e^{-0.0341044t}}$$

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生活方式城镇化率上升幅度略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大幅高

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说明消费者城镇化将不断深化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的重心所在。“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活方式城镇化率将从 2015 年的 40.1% 提高到 2020 年的 45.2%，共上升 5.1 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从 39.9% 提高到 42.2%，共上升 2.3 个百分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从 56.1% 提高到 61.1%，共上升 5.0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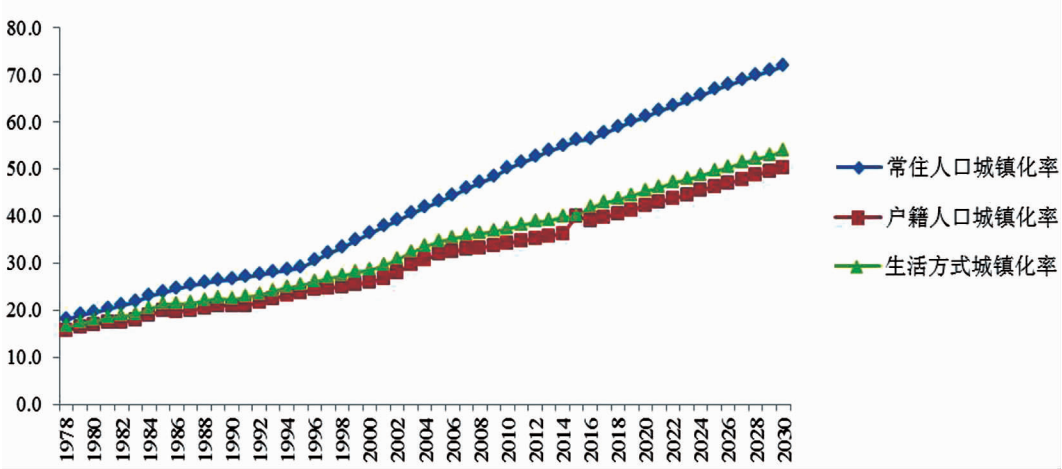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30 年我国城镇化率变化趋势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而得

（二）城镇化动力从产业驱动为主向产业与消费双轮驱动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两大方面，相应地形成了劳动力城镇化和消费者城镇化两种城镇化驱动模式。与发达国家略有不同的是，我国过去的城镇化还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劳动力城镇化，也即城镇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以劳动者身份进入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持续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年来二者差距有所缩小，并主要是农民工增长速度加快放缓所致。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农民工年均增长速度达 15%，21 世纪前 10 年大概是 6% 左右，“十二五”时期约下降到 2.8%，2016 年进一步下降到 1.5%。“十三五”时期，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尤其是农民工增长速度的持续放缓，甚至出现零增长，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空间日趋缩小，劳动力城镇化将逐渐过渡到消费者城镇化；另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现代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在城乡的普及将促进消费者城镇化加快发展，同时农村居民向城镇消费靠拢步伐加快，也将推动部分农村人口作为消费者向城市集中的趋势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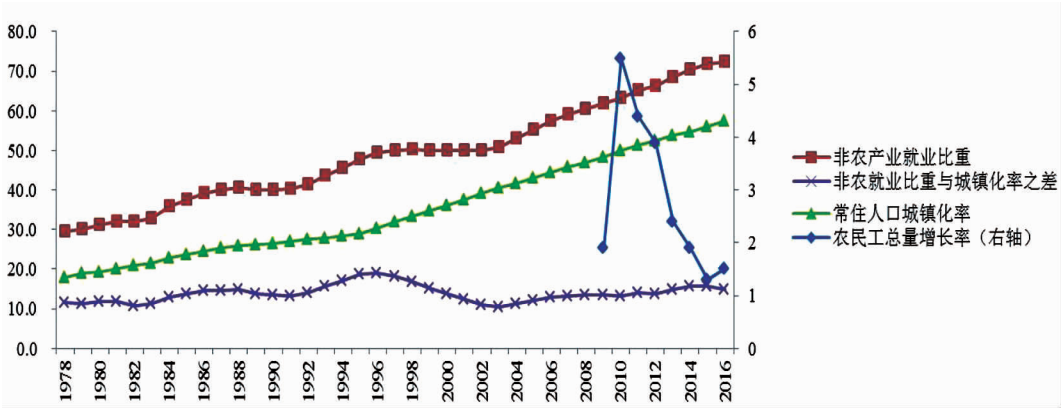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16 年我国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及其缺口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三）城镇化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许多先行发达国家在早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支撑乏力、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社会矛盾频发等问题，城镇化的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逐渐开始重视提升城市内涵和品质，努力建设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和包容型城市，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日本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城镇化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土地、环境等资源和环境要素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也日益趋紧，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发，社会各界迫切要求建设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和包容型城市，如北京市民对“APEC 蓝”的期待等。再加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在经济社会建设领域的贯彻落实，粗放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加快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型势在必行。

（四）城镇人口向大城市加快集中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由于大城市能更好地发挥积极的积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能促进更多的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发展更完善的服务业，同时还能提高生产效率、拥有更先进的文化和更时尚的生活，城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全球来看，2010 年城镇人口居住在 50 万人以下城市的比重为 60.9%，1000 万人以上城市的比重为 10.3%；预计到 2020 年，城镇人口居住在 50 万人以下城市的比重将下降到 57.3%，而 1000 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将上升到 13.6%。从我国来看，随着从劳动力城镇化转向消费者城镇化为主，尤其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向服务

型经济的加快转型，城镇的积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还可能更加突出，^① 在目前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2010 年城镇人口居住在 50 万人以下城市的比重为 47.3%，1000 万人以上城市的比重为 8.6%；预计到 2020 年，城镇人口居住在 50 万人以下城市的比重将下降到 40.3%，而 1000 万人以上城市人口的比重将加快提高到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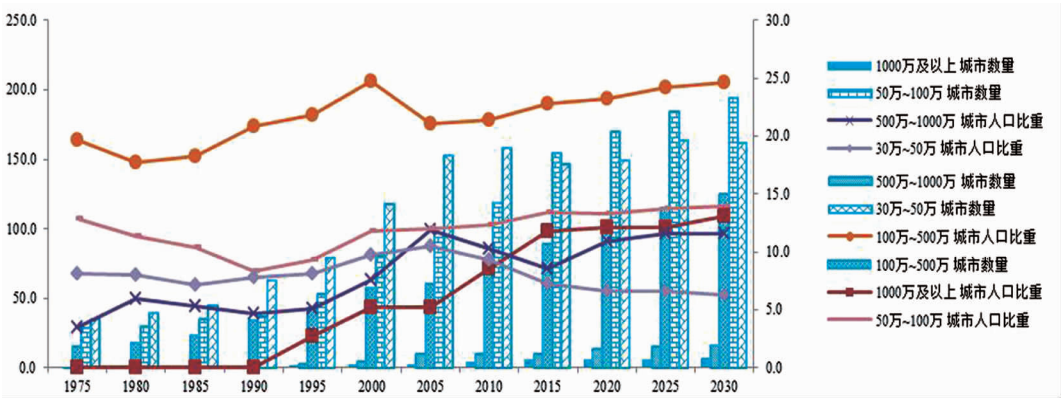


图 3 1975—2030 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数量及其城镇人口比重（右轴）（个、%）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城市展望（2014）》

（五）城镇化形态由大城市主导向城市群主导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城市群由于能较好地发挥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既能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城市病”，又可避免分散型城市化带来的土地浪费和物流成本上升，并能在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之间形成功能互补关系，实现城市功能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城市运行的整体效率，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并成为创业就业和人口居住的城镇密集区以及支撑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如美国的东北部城市群和五大湖城市群、英国的伦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的东海道城市群等。城市群是集约型城镇化道路的有效形式和集中体现，单个大城市“摊大饼”式平面扩张的城镇化模式已逐步被摒弃。过去 50 年全球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即是从发展多功能的单一特大城市转向网络式专业分工明确、交通快速便捷的城市群。对于我国而言，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发展阶段，实施城市群主导的城市化有利于集约节约利用资源，防止“城市病”爆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渐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中原、中三角、成渝、关中—天水等覆盖沿海内陆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正

^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2014）的资料显示，我国城市规模每扩大一倍，其生产率将提高 10%。

逐渐主导着我国各区域的城市发展。例如，2014 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 2.1%的国土面积，集聚了我国 12.4%的城镇人口、25%的经济总量，并成为了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城市群已构成未来我国城镇化布局和区域发展的主体空间形态，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十三五”时期，我国还将继续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建设。

表 1 世界六大城市群发展概况 单位:%

城市群	中心城市	国土面积占比	人口集聚度	经济集聚度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	纽约	1.5	18	24
美国五大湖城市群	芝加哥	2.2	16	18
英国伦敦城市群	伦敦	18.4	65	80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巴黎	20.2	35	44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	东京	26.5	69	74
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14 年）	上海	2.1	12.4	25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4）》及其他公开资料



图 4 “十三五”时期我国主要城市群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难点

我国目前的城镇化还存在城镇空间资源错配、规模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部分问题可能会随发展阶段提高而趋向化解，但战略、体制和政策等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则仍将持续存在并制约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其中，城镇综合承载力较弱、城镇发展理念有偏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传统城市管理制度等是突出问题和难点。

（一）城镇综合承载力较弱，制约城镇化率提高

我国的城镇化是在资源、环境严重制约下的城镇化。我国目前的城镇人口规模占世界城镇人口总规模的比重超过 19%，而人均可利用土地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多，人均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的 28%，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约 50%的重点城镇水资源不符合饮用标准；再加上我国城镇形态与布局不集中、土地利用较为粗放以及水资源地域季节分布不均衡、城市过度开采地下水等，城镇化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城镇化率上升空间受到限制。据统计，全国 650 多个城市中的 300 多个城市，属于联合国人居环境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导致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压低公共服务成本推动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

（二）城镇化发展理念有偏误，制约城镇化质量提高

我国城镇化模式长期存在“重物轻人”倾向，导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化质量不高。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同步推进的过程，城市空间扩张的同时人口也不断向城镇集聚，耕地转变为非农用地的同时农业人口也转变为城市人口。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已出现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倾向，尤其是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在地区激烈的标尺竞争和土地财政双轮驱动下，各地以发展城镇化为名，大量征地开发；再加上“县改区”“县改市”“乡改镇”等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市镇设置标准的放宽，出现了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过快扩张，并陷入集聚土地资源、大搞工业园区而忽视劳动力就地城市化的困局。1996 年以来，我国城镇土地面积从 1.3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 2015 年的 9.2 万平方公里，增长了 6.1 倍；而同期的城镇人口从 37304 万人增加到 77116 万人，仅增长了 1.1 倍；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达到 3.4，远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合理阈值 1.1。空间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承载数量不足，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用地效率低，以及大量失地农民游离在城镇均等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边缘。

（三）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制约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现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一是城乡二元户籍体制阻碍人口城镇化进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大量进城 6 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虽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但无法完全取得城乡均等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目前各地虽已按照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精神，推进了“积分入户”、大中小城市分类改革、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居住证等改革，但大量农民工仍难以完全取得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市民化仍存在较高的制度门槛。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削弱了农民进城落户的能力。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农民只享有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以及流转权利。而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晰、农民土地财产权虚置等问题，限制了土地资源资本化、金融化；农村土地流转局限于村集体内部，并缺乏有效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且出租、转让、入股等土地流转新形式尚不健全，进城农民工难以通过市场化途径合理变现土地财产权益；国家统一征用是农村土地进入城市土地交易市场的主要方式，然而在现行《土地管理法》下，各地土地补偿标准不一、农民表达机制不畅，难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合理补偿。

（四）传统城市管理制度，制约城镇空间优化

我国现存财税体制及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目前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改革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城镇空间格局，制约了城镇空间布局和形态优化。一是现行财税体制不利于人口城镇化。我国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征税环节以生产而非以消费为主，在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吸引企业入驻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收入，而对本地城镇居民之外的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积极性不高。并且，在地区 GDP 标尺竞争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二是等级化城镇管理模式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我国在省级、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建制镇）等五级城镇行政层级基础之上形成的等级化城镇管理模式，形成了城市资源自上而下地分配与自下而上地上缴的流动机制，导致资源更多地集中在中心城市。各级中心城市通过行政资源实现行政区域内的垄断式自我扩张，而低行政级别的中小城市与小城镇难以获取充足的公共资源，造成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滞后。三是跨行政区的城市群合作协调机制不畅，不利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地区标尺竞争格局下形成的行政分割，使得各城市之间存在激烈的非合作博弈，导致城市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关系不畅，生产要素难以在城市

间自由流动，分工难以在城市之间形成，不利于城市群内部城市协调发展和发育壮大。

四、“十三五”时期促进我国城镇化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应结合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难点，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创新城镇化发展模式，走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布局合理、绿色低碳和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以人为本，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属性，要求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人口城镇化进程，着力提高城镇人口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人口城镇化包括了农民职业身份转变的劳动力城镇化过程，以及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整体转变的消费者城镇化进程。在我国已基本实现劳动力城镇化背景下，为推动以人为核心的人口城镇化，需要突破限制消费者城镇化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财权事权不匹配的分税制财税体制，重点推进户籍、住房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就业服务、义务教育、基本养老等制度改革创新，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公平、机会公平和发展公平。为此，“十三五”时期，应根据我国城镇化所处发展阶段，率先统筹推进举家转移、稳定就业和农村先富人口有序落户城镇。对于暂时还不能在城镇顺利落户的其他农业转移人口，应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建立低成本保障性住房制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还应在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支出责任基础上，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多方的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引进社会资本、设立城镇发展基金等构建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不断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持续推进机制。

（二）优化布局，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

优化布局是新型城镇化的鲜明特征，要求根据土地、水资源、大气环流特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城镇化宏观布局、城镇规模结构和微观空间治理优化，重点提升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和生态环保的联防联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一体化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为此，“十三五”时期，一方面，应把城市群作为城镇人口布局的主要载体和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促进城市群和城市发展带的形成和壮大。应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安排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基础，着力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并建立城市群发展协

调机制，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另一方面，还应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应加强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根据区域资源承载能力差异，科学划定各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开发边界，增强中小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分工协作。

（三）产城融合，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产城融合既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实现路径。要求产业和城市功能融合、空间整合和价值融合，做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人融合”，努力形成就业、居住、服务一体化的城镇化进程。为此，“十三五”时期，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化特点，实施差异化产城融合策略。一方面，对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应加快城镇工商产业的培育和集聚，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提高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对于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应加快为有条件举家迁入的农民工家庭提供低成本的住房和基本公共服务，引导农民工家庭居住生活整体迁入，完成市民化进程，提高城市的人口市民化能力。另一方面，对于中小城市，应加快城市工商产业的培育和集聚，促进主城区空间扩容和经济密度提升，扩大城市规模和增强内源性增长动力；对于较大规模的中心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和都市区，应加快纾解城区或中心城市产业功能，促进城市功能的转型。

（四）城乡统筹，推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统筹城乡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趋势，要求合理处理城镇建设和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重点在农村；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为此，“十三五”时期，一是应尊重城乡发展差异性，突出农村的功能和特色，尤其是不能以城乡同样化发展理念促进城乡一体化，注重农村的乡情乡土，保护好乡村美景和风貌。二是应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的深度。应加快推进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特定人群，还需重点加强农村教育、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和社会救助制度。三是应用好现代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门槛，有序引进包括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等在内的社会资本改造传统农业；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加快培育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农村、农业发展活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有效、包容与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民、农村

与农业现代化。

（五）完善治理，推进城市管理创新

完善城市治理是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要求城市建设过程中秉持绿色生态和传承文化的理念，破除等级化城市管理模式弊端，切实增强城市宜居性，大幅提升城市文化底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城镇建设和管理水平。为此，“十三五”时期，一方面，应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并更加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还应充分考虑各地的人文和风俗的差异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尤其是不能以瓦解农村文明、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推进新型城镇化。此外，还应在切实保障各级城市发展权相对公平的前提下，将行政力量转变为市场化手段的一种补充，实现由“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传统城镇化发展路径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转变。

参考文献：

1. 陈文玲：《创新城市发展方式 推进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全球化》2013 年第 4 期。
2. 高春良、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趋势预测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3 年第 4 期。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2014 年。
4. 李京文、杨正东：《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应对之道》，《全球化》2015 年第 2 期。
5. 李娣：《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展望》，《全球化》2017 年第 6 期。
6. 马庆斌、王萌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与政策建议》，《全球化》2015 年第 2 期。
7. 宋立：《劳动力与消费者“分离式”城镇化——劳动过剩经济体的全球化现象还是中国特色问题？》，《经济学动态》2014 年第 5 期。
8. 王一鸣等：《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9. 王一鸣：《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球化》2014 年第 12 期。
10. 徐匡迪：《新时期中国城镇化研究》，《全球化》2015 年第 9 期。
11. 杨兰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探讨》，《区域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12. 杨亮、陈波平：《建设循环城市，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全球化》2016 年第 12 期。
13. 郑新立：《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球化》2013 年第 12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 国际经济 ·

美元指数运行态势及中国对策选择

徐长春

摘要：美元流动机制是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运作的基础。在该机制作用下，美元指数呈现长度约为 10 年的贬值周期和长度约为 6 年的升值周期交替的现象。当前，美元加息周期已经启动，但美元指数走势却出现了“应然”与“实然”的悖论。这是因为本轮美元指数不存在持续上行基础。综合判断，未来一年美元指数在不超过 115 上限的箱体震荡的可能性更大，短期下行压力较大。为规避美元加息风险，中国应加快推进中美自贸区（FTA）建设，通过市场融合实现互利共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营造良好稳定发展环境；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合理多元化配置外汇储备；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灵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 美元流动机制 美元指数 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徐长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当前，美国货币政策逆转，国际金融体系又进入关键变化敏感期，准确把握美元加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对外围经济体至关重要。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指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这形象地描绘了资本跨境流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之大。资本跨境流动事关经济安全，外围经济体准确把握本轮美元加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至关重要。

一、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美元流动机制

要准确把握本轮美元加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正确应对，外围经济体就要正确

认识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正确认识其功能得以发挥的内在运作机制——美元流动机制。

（一）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运作的基础是美元独大

第一，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给美元霸权以巨大冲击。二战之后，国际体系重建过程中，“美元币值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币值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生，确立了以黄金为“定值之锚”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霸权地位也同时确立。但是，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难题”缺陷很快暴露，美国储备的黄金不断减少，面临被兑换一空的窘境，美元危机不断爆发。1971年8月，美国不得不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以35美元1盎司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同年12月，《史密森协定》签订，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美元霸权受到严重威胁。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签订《牙买加协议》，对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实际浮动汇率制加以确认，废除黄金的货币属性。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以浮动汇率制为标志的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正式形成。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由黄金定值体系向国家信用体系转变，各国货币摆脱了黄金定值的束缚。随着欧洲各国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巨大冲击，国际市场份额减少。

第二，美国和欧佩克石油输出组织（OPEC）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的霸权地位。1973年，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崩溃之后两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OPEC以沙特货币结算的石油价格暴涨，并触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借助战争的压力，美国以向沙特提供军火支持为条件换取了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结算的承诺。此后，OPEC国家都采用以美元结算的方式进行交易，延续了40多年。石油是各国都离不开的大宗商品，交易规模巨大。美元结算石油极大地提升了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大幅抵消了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元霸权地位带来的冲击。美元结算石油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份额不降反升，保持了绝对优势地位。这使得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成为美元独大的国际金融体系。

总之，借助美元结算石油，美元维持了独大地位，奠定了其对当今世界金融市场巨大影响力的基础。

（二）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运作的基础是美元流动机制

在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下，在美元结算石油的支撑下，美元逐步形成了以美国国内

金融市场为支撑的虚拟经济结构，即美元流动机制。第一，美国国内逐步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证券市场。在长期的宏观调控过程中，美国逐步构建了包括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在内的全球最大证券市场，每天有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交易完成。第二，美元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由于美元绑架石油交易，各国争相持有美元以保障能源供应、贸易结算所需。各国多持有的美元在伦敦、法兰克福、海湾国家、新加坡等地形成美国本土之外的美元资金交易市场，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在美国之外的美元投融资提供支撑。第三，无论是国际金融市场还是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美元都是市场定价货币和市场结算货币。这就构建了以美国证券市场、美元全球金融市场为载体的美元循环流转渠道。

美元利率变化与美元循环流转渠道相结合就构成了美元的流动机制。依托这个美元流转渠道，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通过美元指数的变化首先传导给国内市场，推动美元在美国国内金融市场与伦敦、新加坡等美元离岸市场以及外围经济体市场之间流动，引发外围经济体市场与美国国内市场资金供给截然相反的表现。美元流动机制是建立在美元流动实体结构基础上的资本跨境流动机制，是牙买加国际金融体系运作的内在机制基础。

（三）美元流动机制的市场表现

当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时，美元流动机制就被启动。美元在任何经济体的进出都会引起其内部市场资金供给的变化，从而搅动该经济体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第一，当美联储进入货币升值周期即加息周期时，美元指数进入上升轨道，外围市场进入衰退期，美国市场进入繁荣期。这个美元指数上升周期中，美元加息吸引外围市场资金追逐息差而纷纷回流美国证券市场，金融市场繁荣并流向美国相关产业，推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与此相反，外围市场因资金规模萎缩而进入资产价格的下跌期，金融市场衰退，相关产业融资困难，甚至导致部分产业的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危机，出现衰退局面。

第二，当美联储进入货币贬值周期即降息周期时，美元指数进入下降轨道，美国市场进入衰退期，外围市场进入繁荣期。在美元指数的下降周期，美元的降息驱赶资金向外围市场寻求高回报资产进行投资，纷纷逃离美国市场，流向外围市场购买地板价资产，金融市场衰退，退出相关产业并拉低美国资产价格，导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与此相反，外围市场因资金规模暴增而进入资产价格的上升期，金融市场繁荣，相关产业资金充裕，出现投资景气局面。

客观地讲，外围市场和美国市场图景的直接描绘者是国际金融市场主体。利用这种规律，有实力的国际市场主体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的变化而变换投资场所，在价格

洼地买入，在价值高地抛出，在获得高收益的同时也通过资本跨境流动创造出美国市场与外围市场截然相反的图景。

二、本轮美元回流阶段的判断：现象与现实

当前，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进程，外围市场经济体货币紊乱现象也已经十分明显，但美元指数却十分疲弱，没有出现与加息相适应的上扬态势。

（一）外围市场已出现货币紊乱现象

美元加息预期启动之后，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消息不断增多。受加息预期的影响，美联储首次加息决议宣布前，2015年内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已暴跌46%。^①同年8月20日，哈萨克斯坦宣布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当日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大幅贬值约30%，在汇率自由浮动后的3个月内，坚戈总体贬值近40%。^②墨西哥比索汇率于2015年大跌14%，2016年又大跌10.5%，给墨西哥经济带来沉重打击。^③2016年3—10月，埃及镑贬值超40%。^④脱欧使英镑从1.5018的高点于2016年10月7日跌至31年新低1.1841，跌幅达到21.2%。^⑤

2015年12月美元首次加息之后，世界各地不断传来经济体货币崩溃的消息。美联储宣布加息当日，阿根廷比索跌幅超过30%，^⑥这迫使阿根廷政府取消维持了4年的资本管制。12月21日，阿塞拜疆放弃本币挂钩美元的政策，其货币马纳特狂泻近50%。^⑦2016年，蒙古国货币图格里克曾连续22日下挫，全年图格里克兑美元下跌20%。^⑧

时隔一年后的2016年12月15日美元再次加息，世界外围经济体货币崩溃的消息不时传来。截至2017年1月11日，土耳其的法定货币新土耳其里拉已对美元贬值11%，^⑨几近崩溃边缘。2017年2月5日，蒙古国央行紧急加息450个基点至15%的高位，才暂时稳住了本币兑美元的崩跌势头。^⑩

①佚名：《巴西雷亚尔今年已下跌46%新兴货币中贬值幅度最大》，金融界网站，2015年12月2日。

②谢亚宏：《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大幅贬值》，《人民日报》2015年8月21日，第22版。

③唐道银：《“黑天鹅”风暴狂飙突进：你还在裸泳？》，财富动力网，2016年11月2日。

④小星：《英镑、埃及镑：2016年的难兄难弟》，中金网，2016年10月27日。

⑤小星：《英镑似已堕入贬值深渊 未来走势长期看衰》，白银投资网，2017年9月5日。

⑥米末：《美联储加息阿根廷第一个倒下比索暴跌超30%》，第一财经，2015年12月18日。

⑦米末：《政府放弃挂钩美元政策，阿塞拜疆马纳特大跌》，汇通网，2015年12月22日。

⑧张军：《又有一国货币崩盘，民众砸锅卖铁还债！》，Wind资讯，2017年2月5日。

⑨刘晓博：《新土耳其里拉崩溃浅析土耳其衰弱的原因》，第一黄金网，2017年1月13日。

⑩张军：《又有一国货币崩盘，民众砸锅卖铁还债！》，Wind资讯，2017年2月5日。

总体来看，在美元加息预期的推动下，世界各国货币习惯性普遍贬值，国家货币崩盘现象时有发生，国际金融体系紊乱程度加大。这凸显出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力。

（二）本轮美元指数走势现“应然”与“实然”悖论

2017 年 3 月 16 日，美联储第三次加息。但是，美元指数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出现大幅下降，一度击穿 99 点关口，美元指数走势出现了“应然”与“实然”的悖论。这意味着本轮美元回流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新特点。

第一，依据大周期规律的判断，美元指数应处于上升期。美元指数是反映美元汇率综合变化的指标，表征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是美元利率变化的晴雨表，与美元流向相对应。美元指数上升，对应着美元回流美国，指数下降对应着美元流出美国。截至目前，如图 1 所示，美元指数已大致经历了 5 个阶段的升贬周期，即总体表现为长度约 10 年的贬值周期和长度约 6 年的升值周期交替。自 2011 年以来，美元指数应该进入了新一轮升值周期。考虑到美国救市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在美元 2015 年启动加息之后，美元指数上行即使延迟也应启动上行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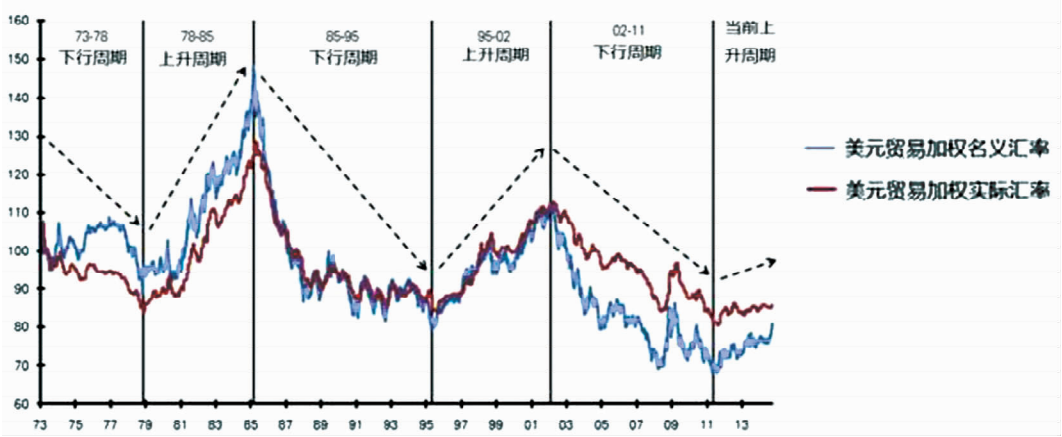


图 1 1973 年至今美元指数周期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德意志银行

第二，加息之后，美元指数实际表现却是底部箱体震荡，而不是上扬。如图 2 所示，2015 年 12 月美元首次加息之后，在特朗普景气的带动下，美元指数短期有个上行表现，但很快就转为下行。2016 年 12 月 15 日，美国宣布联邦基金基准利率自 2010 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幅度为 0.25 个基点。之后，在非农数据连续报喜的推动下，美元指数进入了新一轮快速攀升，一度在 2017 年 1 月冲高至 103 点多的本轮最高点。随后，美元指数震

荡下跌，曾于2月初击破100点大关。然后，再次冲破102点的高位，接着又出现大幅下行态势。2017年3月16日，美联储第三次加息。但这并未能阻止美元指数下行的趋势，美元指数不断创出新低。可见，本轮美元加息启动回流进程后，美元指数呈现横盘箱体震荡的态势，而不是上行。美元指数走势出现了“应然”与“实然”的悖论。



图2 2015年5月—2017年5月美元指数月k线走势图

资料来源：黄金网

总之，从外围市场出现货币紊乱现象来看，在思维惯性引导的预期带动下，脆弱性较强的经济体资金出现了逃离现象；从美元指数“应然”与“实然”的悖论看，美元回流的力度并不大，无法支撑美元指数持续上行。现象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三）本轮美元指数横盘的原因分析

本轮美元指数上升周期起源于2011年，是被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的升值周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美元指数横盘而不是上行，既有微观原因，也有宏观原因。

第一，从微观看，美元“流动性陷阱”状态尚未打破，流入资金额度难以抵消高位套现资金额度，资金量难以支撑美元指数上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连续多年以“货币宽松”的方式“注水”，全球美元金融市场几乎陷入“流动性陷阱”。在这种情况下，流入流出资金几近抵消，甚至流出大于流入，美元指数只能横盘震荡，不排除破位持续下行的可能。

第二，从宏观看，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支持本轮美元指数持续上行。与前几轮美元指数上升不同，无论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实力对比，还是各国际行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行为能力，或是美国经济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能支持美元持续回流。

一是国际经济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难以支撑本轮美元指数持续上升。世界各国经济

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独大格局下的体制机制基础被均等化腐蚀。从总量上看，美国经济已经失去世界第一的桂冠。如图 3 所示，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标准，世界银行认为，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已经稳居世界首位，增长 7.97%；美国 GDP 规模则相当于中国的 92%，仅增长 3.45%。^① 从占比上看，虽然美国经济有所回升，但美元指数攀升并不具备国内经济基础。2011 年，世界经济前五强占全球 GDP 规模的比重分别为美国 21.57%、中国 10.43%、日本 8.39%、德国 5.10%、法国 3.96%。到了 2015 年，世界经济前五强占全球 GDP 规模的比重分别为美国 24.32%、中国 14.84%、日本 5.91%、德国 4.54%、英国 3.854%；法国占 3.26%，被英国超越，位居第六。^② 所以，总体来看，GDP 的世界分布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各国经济实力日益均等化。这意味着各经济体为资本提供盈利机会的版图已经变化，美国独大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更多经济体能为国际资本提供盈利机会的条件下，里根时代的美元大规模回流条件已经不存在，资本逐利本性导致其有了更多的投资场所选择，不必回流美国。这已经并将继续削弱本轮美元指数上升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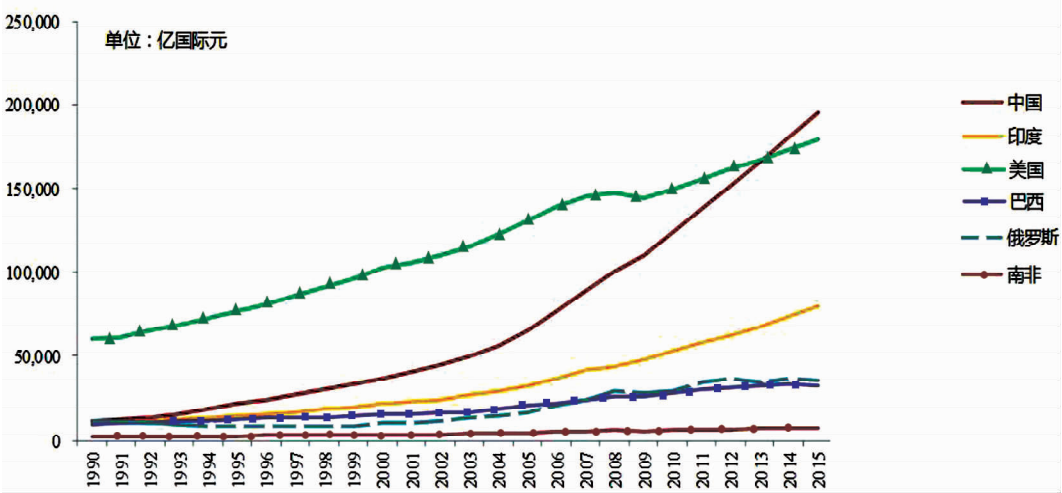


图 3 1990—2015 年金砖国家和美国 GDP 规模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二是美国基于经济实力的市场吸引力也在减弱。如图 4 所示，虽然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当前的人均购买力与美国在拉大，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再次启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美国与金砖国家的人均购买力的差距就会不断缩小。这意味着，国际市场的吸

①数据来源：wind 资讯。

②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引力格局也在快速改变。总之，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世界经济运行模式正由欧美依靠金融加杠杆消费、东亚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能源资源的大三角模式，向欧盟、北美和东亚三足鼎立的模式转化。世界各国经济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扁平化趋势在进一步发展，世界上能为资本提供更高利润回报的提供者增多，对回流美国的资金起到分流作用。这些都侵蚀着美元指数拉升的基础。

三是美国产业结构的“软化”限制了本轮美元指数攀升的高度。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三、二、一”经济结构，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尤为发达。美国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 80%，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约占 GDP 的 1%，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约占 GDP 总值的 20%。与此相适应，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超过 70%，居民社会消费总额占 GDP 总值的 80%，社会财富积累率较低。在世界经济运行的原有大三角模式下，美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软化”。如果世界经济运行的原有大三角模式无法延续，美国产业结构就面临向第二产业“硬化”的转型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因去杠杆金融服务业无法提供巨大投资利润回报，以扩散性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成果不会被美国所垄断，美国当前无法为资本提供较高回报的经济项目，对资本的吸引力大幅下降。可见，在本轮美元升值周期中，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动力已经大幅下降，难以支撑美元指数持续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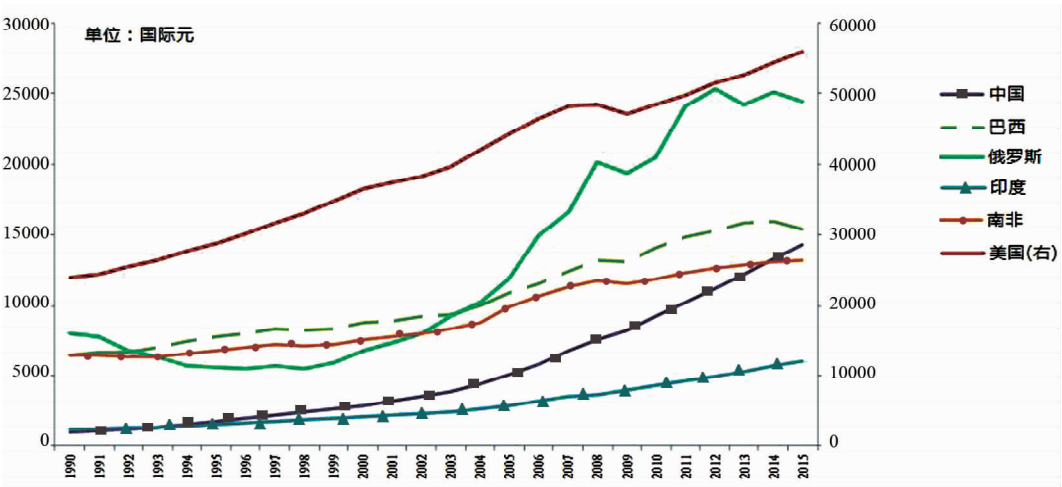


图 4 1990—2015 年金砖国家与美国人均购买力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第三，外围市场可回流资金规模的限制，制约了美元指数的爬升高度。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提出“美国第一”的发展理念，致力于美国经济再次崛起。美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要求丰富的流动性滋润市场主体。而国际金融危机治理过程中，中南美洲、欧盟、英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经济体货币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数次崩塌，国际游资已经被驱赶出本经济体。所以，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资金外围来源等于已经几近枯竭，只能更多依靠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来提供。而且，美国接近 20 万亿美元的债务也不支持过紧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国货币政策过紧，就会引发企业经营困难，税收吃紧将导致美国政府关门等债务危机，甚至连带引发全面危机。若再考虑到特朗普的强军计划对流动性的消耗，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的态势就更加没有市场基础。

第四，世界各国对美元升值的“免疫力”限制了美元指数的高度。经过五轮的美元周期性变化，外围市场经济体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十分敏感，已经积累了应对美元升值的经验。特别是一些大型经济体经过多年的累积，已经具备了应对国际市场急剧变化的实力，市场主体普遍将其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避风港，难以大规模从这种市场“抽血”。比如，外围经济体普遍实行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本次美元加息之前，各国货币普遍主动贬值，提前进行了价格“卧倒”，避免美联储加息可能带来的冲击。目前，外围经济体普遍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跟随美元加息，稳定与美国的利差，使资本外逃动力大减，也为减缓资本外流提供了政策基础。另外，针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变化，外围经济体普遍临时启动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使其在当前特殊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有效规避了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

总之，当前美元指数上升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意味着当前的美元指数变动也必然体现出新的特点，呈现新的态势，难以再现前几轮上升的局面，只能勉强横盘。

三、从美元指数变动趋势看未来美元回流态势

面向未来，中期美元指数不具备大幅上行的条件。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主体对美元信心的进一步弱化，短期内美元指数还存在较大下行压力。美元继续回流的动力不大。

第一，从大周期的角度判断，中期美元指数不具备大幅上行的条件，总体应表现为基于现有水平的箱体震荡。如图 1 所示，上一轮美元指数上升周期的高点在 110 点上下，原则上本轮美元指数的上行高点不应超过 110，当前美元指数已经上探过 103 点。如果考虑到美元升值的冲动较高，美元指数上行的空间也不应过 115 点左右。这种上行不足以引发外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目标是美国实体经济复苏，基本可以判定，未来一年内美元指数以箱体震荡为主，不具备连续拉升基础。

第二，短期看，美元指数还存在破位下行的可能。如图 5 所示，美元指数已大幅下

行。如果考虑到美国国内博弈的烈度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在冲突，国际金融市场主体对美元信心的弱化，美元指数短期内存在较大下行压力，甚至还可能加速破位下行，即资本加速流出。



图 5 美元指数近期走势图

数据来源：黄金网

可见，美国经济前景已经远没了前五轮美元周期中对国际游资的吸引力，国际金融市场主体对美元指数走高信心严重不足，普遍采用了阶段性获利了结的投机对策。毫无疑问，美元将来还会加息，但美元指数冲高将受到市场信心的巨大限制。面向未来，美元主权货币的属性与世界货币属性分离的趋势将更加明显，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弱化。可见，美元指数呈现箱体震荡的概率较大，美元继续回流的动力不大。

四、中国应对美元加息的对策选择

截至目前，脆弱型经济体可回流的资本实际已经流出到极致。虽然美国货币政策吸引资本回流的能力已明显力不从心，但利用货币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冲动依然不减，美元加息依然是外围经济体最大风险因素。中国要有底线思维，以合作共赢为原则，创造条件消解美元加息引发资本流出的基础，防范金融风险，维护世界经济环境稳定，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一）推进中美自贸区（FTA）建设，通过市场融合实现互利共赢

智库存在的意义在于提供把“蛋糕”做大的方案，使参与各方都能从中受益。历史

经验表明，中美合则两利，不合则两损，且会殃及世界各国。中美市场互补性巨大，多年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就提出中美 FTA 的倡议。当前，美国新政府提出以双边贸易合作机制参与国际经贸合作。中国应抓住机会，推进中美通过 FTA 建设为中美共赢发展创造条件，跨越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体制机制门槛，推进世界共赢。

中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市场互补性巨大。从产业结构上来讲，美国第三产业发达，中国第二产业规模占优；从第二产业内部来讲，美国高端制造业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一般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从第一产业来讲，美国农业生产要素优势极为明显，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劣势突出。而且，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正在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中国则正在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通过改革释放红利。中美双方通过 FTA 建设能够深化合作，把中国巨大的市场同美国领先的技术结合起来，激发经济增长动能，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世界各国。当前，美国新政府正在摆脱多边贸易合作的包袱，力图更多地获取国际市场份额。中美 FTA 不仅能够增加美国商品的市场容量，还能为中国经济深入发展带来契机，为世界经济发展开拓广阔空间。中国应抓住机会推进中美 FTA 建设，消除“安全困境”产生的条件，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人类社会进一步从无政府状态向世界大同社会过渡，实现全人类共赢。

（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破解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的瓶颈，也能奠定中国长远发展的市场基础，奠定经济发展后劲基础，还能够拓展世界经济发展空间。消化产能的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增大中国自身市场对产能的需求，增加消费量，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破解有销量无盈利魔咒。因此，中国要实施扩大消费的措施。但是，中国市场容量毕竟有限，需要高瞻远瞩开拓新的市场，即第二条途径。二是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市场合作，在消化中国产能的同时造福于沿线国家人民。当前中国面临的过剩产能多是基础设施领域相关产品的产能。而“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经济体基础设施落后，需要加大建设力度。因此，中国要携手沿线经济体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国产能的消化。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意识到加强与中国产能合作的重大意义，纷纷提出了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似的国家发展战略。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光明之路”计划，俄罗斯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计划，蒙古国提出了“草原之路”计划，印度提出了“季风行动”计划，欧盟提出了“莱茵河计划”，法国同德国提出了“法德联合投资计划”，韩国提出了“欧亚倡议”等等。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出的计划都与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都致力于通过互连互通建设扩大本国生产要素组合的范围，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国家发展。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计划、“欧亚倡议”更是站在欧亚全局的角度提出欧亚大市场的构想，旨在通过促进交流与合作，建立统一的欧亚大市场。这类战略旨在沟通国际产业链下游市场，通过建设一方面拉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增加对世界各国过剩产能的消化；另一方面推进生产要素向国际产业链下游市场的转移，启动这些经济体的市场，增加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相关产能消化能力。所以，“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相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有利于扩大中国海外市场，推进中国产能消化，也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利于形成强大经济发展动力，避免资本大规模进出，创造世界经济稳定的稳定环境。因此，中国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加对国际产业链下游市场的投资，造福世界。

（三）营造经济发展良好稳定的环境

第一，要以本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培育新引擎为核心。经济实力及其相关的科技实力是国家一切能力之源，只有保证自身经济实力，不断开拓自身的经济和科技增长的源泉，中国才能保证参与国际竞争综合国力的可持续性和积累性，才能保证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要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国就要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经济增长引擎建设，以确保自己在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资格，并为在大国竞争中胜出创造条件。保证本国经济增长引擎动力十足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第一要务。

第二，把防范各种潜在风险放在优先位置。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深化，中国原有的地方债务风险、局部或系统金融风险等会不断深化；由于收入普遍减少导致社会内部张力不断加大，各种社会矛盾会不断加大；政治风险也会因社会注意力内聚而加大；随着美元回流，美国经济预期的升温，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敞口风险也为国际上人民币的做空力量提供了契机。因此，要动用国家资源强化社会保障的保底作用，强化监管部门的会风险压制作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尽可能良好的稳定环境。

（四）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

中国要以国家安全和权益维护为底线配置国家资源。美国新政府虽然不再提“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却实质性地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力图打破亚太的战略平衡，扰动地区安全局势，实质性地恶化中国安全环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要以本国安全为底线，加强本国安全建设，加大现阶段的国家安全投入，争取在国际安全结构中不断增加自身安全保障，维护亚太战略平衡局面。一旦国家安全没有保障，资本不可能

长期留在战乱的中心，国家损失就不仅仅是资本外流的问题了。因此，中国当前要紧盯美国军事部署对亚太安全结构的影响，夯实国家安全的根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五）合理多元化配置外汇储备

面对美元指数有可能下行的局面，中国要对原有外汇储备投资策略进行调整，顺势力导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防范经济利益流失，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

第一，以更加商业化运作方式为原则，提高外汇储备资金使用效率。所有的商业投资都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效益与风险最佳组合原则。任何投资资金都追求“风险一定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收益最大化；或收益一定的前提下，风险最小化”，实现效益与风险的最佳组合。二是任何投资都遵循“证券的多样化，建立科学的有效证券组合”，即遵循分散投资的原则。三是理智投资原则，即任何投资都要在分析、比较后审慎投资，追逐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中国要逐步改变过去偏重考虑防风险的思维习惯，强化对投资回报率追求，增大外汇储备资金使用效率。

第二，紧跟世界经济运行模式调整的步伐，以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为指导，适当增加“一带一路”沿线战略投资，适当减少对美国国债投资规模，逐步实现外汇储备国际投资的多元化配置。“一带一路”倡议是适应新时期国际环境的国家战略，一方面应尽力规避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因市场竞争矛盾激化而可能导致的摩擦和冲突，贡献于世界和平；另一方面为中国加强与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找到了新的互利共赢合作模式，是新时期国家对外交往的总纲。要把外汇储备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工具，加强沿线投资和经济合作，特别是提升国内基础设施水平，利用金融杠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执行，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在此基础上，逐步把国家外汇储备配置到有更高回报的地区和项目上。同时，中国又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精髓——致力于扩大经济剩余净额，在加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致力于加强中美大市场的融合。可以考虑把部分对美国国债投资资金就地转化为对美国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对美国高收益行业的股票等投资，在自己发展的同时也为美国发展创造机会，实现中美之间的互利双赢合作。

（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灵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美元持续加息的大背景下，国际游资回流美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为了规避国际做空力量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央行采取了一定的限制资金跨境流动的措施。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了一定回潮。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第5大支付货币、第6大外汇交易货币。当前,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出现了小幅波动。SWIFT公布的最新《人民币追踪系统》(《RMB Tracker》)显示,2016年6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中的份额为1.72%,连续3个月维持第6大支付货币地位。^①与此同时,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的地位。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9月之前的3年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增长1倍,至4%,交易量在全球货币中排名第8,并已成为交易最活跃的新兴市场货币。^②但是,这种回潮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佳造成的,而是市场主体基于对历次美元加息预期的惯性反应的结果。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最亮丽的风景线,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相对持续贬值。人民币国际化短期回潮之后,还要继续,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人民币世界第2大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难以撼动。因此,现阶段在国际金融市场紊乱迹象初显的背景下,中国要进一步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实体经济,为人民币持续国际化提供支撑,视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灵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经济持续全球化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美] 安迪森·维金:《美元的坠落》,刘寅龙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 [美] 希夫、[美] 唐斯:《美元大崩溃》,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3. [美] 维金、刘寅龙:《美元的衰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4. 纪硕鸣、周东华:《终结美元》,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5. 严行方:《美元陷阱》,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责任编辑:李蕊

^①廖淑萍:《人民币维持第六大支付货币地位长期仍利好》,中国金融信息网,2016年7月21日。

^②陈周阳:《过去三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占比增长1倍 成第八大货币》,中国金融信息网,2016年9月2日。

国际湾区发展比较分析与经验借鉴

田 栋 王福强

摘要：国际著名湾区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配置能力、便捷的交通系统、超强的创新能力、宜居的生活环境、包容的文化氛围、强大的集聚功能、广泛的外溢效应等特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借鉴这些特点，科学划定湾区地理范围，制定湾区地域发展的层次性规划，引导规避产业同质竞争，打造湾区优质生活圈，并创新合作发展机制和模式。

关键词：东京湾区 旧金山湾区 湾区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

作者简介：田 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王福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副研究员。

15 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航海技术进步，带动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海洋贸易成为支撑工业文明扩张的主要方式。近四个世纪以来，以海洋贸易为主要方式的海洋经济是推动一轮又一轮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作为海洋贸易支柱的港口经济，也成为衡量地区与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指标。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出现，电气化时代的来临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并未削弱港口经济在海洋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但港口经济开始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形态转变。港口经济逐渐演变为湾区经济，其内涵不仅包括传统的港口货物贸易，也包括以知识、技能、资本集聚为特征的现代产业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集聚和交通网络体系的快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来，追求发展的全球共识进一步强化了湾区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主体地位，

全球逐渐形成若干重要的港湾经济区，较为著名的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伦敦湾区和纽约湾区。

一、国际湾区经济的主要特征

（一）湾区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

如东京湾区，按照一般理解的东京湾区范围即首都圈（表 1），居住人口 4300 万，地区生产总值（GRP）约 1.8 万亿美元，湾区人口数量和 GRP 占日本全国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均为 1/3 左右。东京都汇聚了日本全境 52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中的 39 家，是日本重要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中心。

表 1 1990－2010 年日本首都圈各圈层 GRP 占全国经济比重 单位：%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东京	17.16	16.23	16.72	17.74	18.39
神奈川、埼玉、千叶	13.17	13.85	13.74	13.88	13.90
山梨、群马、栃木、茨城	5.98	5.98	5.94	5.83	5.96
首都圈	37.11	36.06	36.40	37.44	38.25

资料来源：杨东亮、王弈钦，《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式收敛表现》，《现代日本经济》2016 年第 3 期

表 2 2012 年东京都产业状况数据表

产业名称	企业数量	附加值总额 (亿日元)	附加值构成 比 (%)	从业者人数 (千人)	从业者构成 比 (%)	劳动生产率 (万日元/人)
农林业	342	85	0	2.7	0	316.1
渔业	10	7	0	0.1	0	573.1
矿业、采石业	40	78	0	0.4	0	2136
建筑业	33815	26204	4.70	415	5.60	631.5
制造业	41352	39762	7.10	614.3	8.30	647.3
水电气、下水道后勤业	358	7453	1.30	29	0.40	2566.7
通信资讯业	16998	70846	12.70	730.4	9.90	969.9
邮政运输业	13742	25963	4.70	406.6	5.50	638.5
个体经销业	124769	125729	22.60	1691.9	22.90	743.1
金融保险业	9414	62789	11.30	385	5.20	1630.8
房地产业	44932	29500	5.30	289.3	3.90	1019.7

续表 2

产业名称	企业数量	附加值总额 (亿日元)	附加值构成 比 (%)	从业者人数 (千人)	从业者构成 比 (%)	劳动生产率 (万日元/人)
学术研究、专业技术服务业	31122	42390	7.60	362.7	4.90	1168.8
餐饮住宿业	60476	13603	2.40	635.9	8.60	213.9
生活娱乐服务业	34219	11022	2.00	276.3	3.70	399
教育培训业	12613	13732	2.50	285.8	3.90	480.5
医疗福祉业	30708	50898	9.10	554	7.50	918.8
综合服务业	1730	916	0.20	19.7	0.30	465.4
其他服务业	29073	35404	6.40	702.8	9.50	503.7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东京都地域经济分析》，2012 年

表 3 2012 年日本产业状况数据表

产业名称	企业数量	附加值总额 (亿日元)	附加值构成 比 (%)	从业者人数 (千人)	从业者构成 比 (%)	劳动生产率 (万日元/人)
农林业	22909	7095	0.30	273.4	0.60	259.5
渔业	3032	1560	0.10	36.9	0.10	422.7
矿业、采石业	2023	2013	0.10	19.7	0	1023.2
建筑业	451628	156861	6.40	3494	7	448.9
制造业	433955	485929	19.90	8801.1	17.80	552.1
水电气、下水道后勤业	3687	27588	1.10	194.5	0.40	1418.3
通信资讯业	55616	131366	5.40	1523.1	3.10	862.5
邮政运输业	117030	140974	5.80	3016.4	6.10	467.4
个体经销业	1206823	513002	21	10470.3	21.10	490
金融保险业	80866	188048	7.70	1543.9	3.10	1218
房地产业	316855	82818	3.40	1263.3	2.50	655.6
学术研究、专业技术服务业	185900	111201	4.50	1509.8	3	736.5
餐饮住宿业	546270	79385	3.20	4302	8.70	184.5
生活娱乐服务业	398776	65084	2.70	2078.2	4.20	313.2
教育培训业	135359	57320	2.30	1530.7	3.10	374.5
医疗福祉业	307297	254938	10.40	5555	11.20	458.9
综合服务业	32734	15258	0.60	337.2	0.70	452.5
其他服务业	295283	125898	5.10	3617.4	7.30	348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东京都地域经济分析》，2012 年

湾区的规模效应还体现在核心城市的产业竞争力方面。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报告（表2、表3），作为东京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东京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信息通讯、金融、保险、学术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竞争力较强；且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东京都各产业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全国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

（二）湾区是引领区域经济增长的增长极，代表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

旧金山湾区人口约 760 万，2013 年 GRP 近 6400 亿美元。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2013 年旧金山湾区人均 GRP 为 84220 美元，在全美 10 个大都市圈统计区域内位列第一。其中，汇聚高科技企业最多的硅谷地区人均 GRP 高达 102535 美元。旧金山湾区是美国最早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复苏的区域之一，聚集着谷歌、雅虎、甲骨文等领先行业的著名企业。以硅谷创新科技企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一直被视为判断湾区经济乃至美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主要指标。按照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颁布的《湾区规划》，2010—2040 年湾区将新增 112 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以知识能力为基础的专业技术服务、健康教育两大就业部门将提供 63 万个就业岗位，占比为 56%（图 1），显示旧金山湾区以高科技产业和生物制药产业支撑的产业结构仍将持续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将持续向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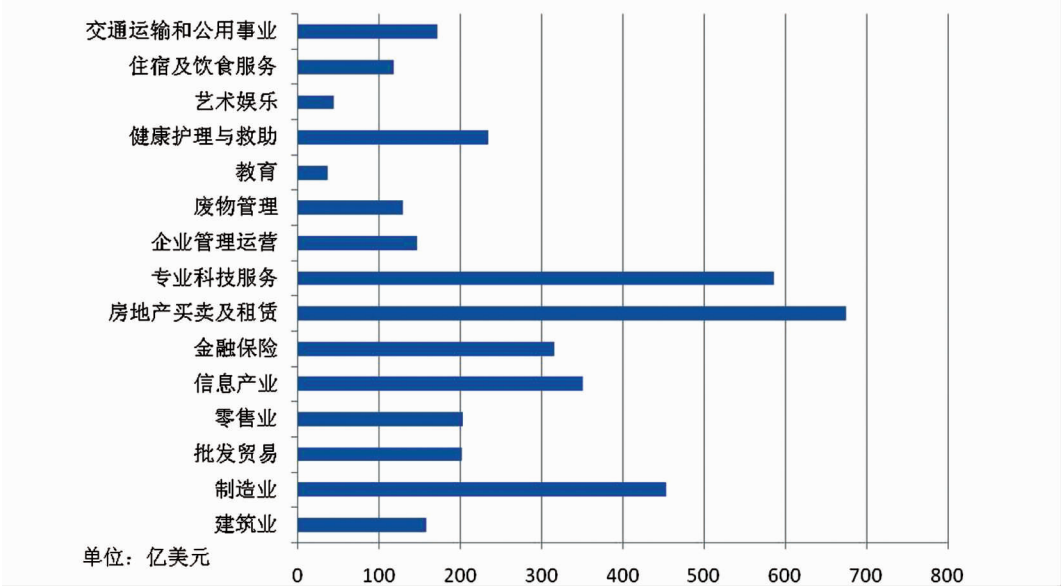


图 1 2015 年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都会统计区各产业产值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 2015 年区域统计数据整理而得

（三）湾区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湾区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连续数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全球需求疲软，

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普遍通过推动湾区经济发展来增强国际竞争力。如日本政府为应对日渐激烈的海外港口竞争，重新强化本国港口发展地位，冀图以整合国内港口资源来降低运输成本，吸引长期因运输成本而在海外进行组装的制造业企业回流，于 2010 年 8 月选定东日本的东京港、川崎港、横滨港组成“京滨港”，作为东日本地区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支撑。

二、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发展的主要经验

（一）东京湾区发展的主要经验

东京湾区最早是由围绕东京湾水面所形成的港口群，是日本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域。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东京都以制造业为重心的工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开始向东京都集聚，东京都成为日本城市中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最大的城市。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随着东京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东京都的制造业包括化工、钢铁、造船等行业开始向周边地区迁移，千叶县、神奈川县和埼玉县的工业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东京都为核心的“一都三县”都市圈开始形成。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东京都市圈结构继续强化。东京都着重发展以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服务经济，周边三县在承载东京都产业转移的同时，与东京都市圈外围城市群马县、栃木县、山梨县和茨城县的联系开始紧密。在这一时期，人口继续向东京都集聚，轨道交通体系开始向外围四县延伸，部分产业向外围迁移，逐渐将东京都市圈结构由“一都三县”扩展为首都圈“一都七县”。东京湾区涵盖首都圈“一都七县”范围，形成以东京都为核心，以千叶县、埼玉县、神奈川县三县为中间层，以群马县、茨城县、栃木县、山梨县四县为外层的“核心—中间—外围”三圈层地理空间结构。回顾东京湾区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如下经验：

一是都市圈结构中城市功能分配较为合理。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的 40 多年间，以东京都产业升级为契机，周边城市不断发展。产业逐步外迁的同时，城市定位愈发明确，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如东京都定位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形态，着重发展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横滨市承担东京湾湾区贸易中心功能，横滨港成为湾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千叶县重点发展空港经济、国际物流和临空产业；埼玉县承接行政、居住、商务职能；茨城县则重点发展信息产业，集聚大学和科研机构（图 2）。

二是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对于提高要素流动效率作用重大。东京都与周边城市主要依靠轨道交通网络的不断延伸来形成地区经济一体化目标。在日本城镇化高速发展期，日本政府通过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一体化，在不断扩张轨道交通体系的同时，在东京都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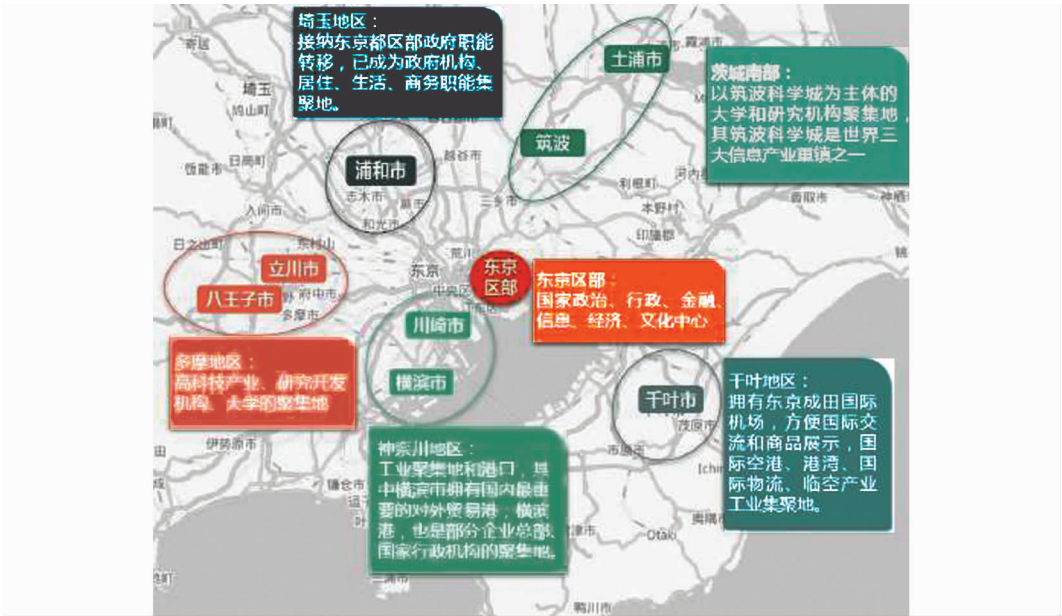


图2 东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功能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部课题组，2016

边 30 公里半径和 50~80 公里半径内规划建设新城。新城建设和交通网络的发展促进了东京都人口向周边城市分散，同时也围绕东京都为核心形成更为合理高效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

三是交通网络发展与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并行。东京都市圈在交通规划方面不仅重视通过城市干线、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多种途径提升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效率，同时为避免城市人口集聚对交通产生的巨大压力，在新城建设时期重点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出行模式（TOD 模式），并注重将交通网络建设与城市土地空间开发相协调，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开发立体式多面向，以工业、商业、居住、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型步行化城区。交通与居住—工作空间的紧密连接大大增加了居民公共交通出行频次，降低了人口大规模集聚的副作用。

四是以港口空间开发与再利用推进港城和谐。湾区经济的基本形态是港口经济，在工业化加速阶段，沿海岸线进行制造业布局是常见的发展形态。港口贸易和沿海制造业的扩张不仅造成严重污染，而且降低了港湾区域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1985 年日本政府推出“面向 21 世纪的港湾政策”，提出综合性港口概念，在滨水区构建物流、工业与生活和谐发展模式。1990 年日本政府推出“建立富饶魅力滨水区”政策目标，强调在通过填海建立人工岛后，以人工岛外沿区域作为港口泊位，在人工岛内部区域规划建设居住和商业空间；在对港口进行改造时，强调对旧有港口空间的再利用，目的是推进港城一体、

和谐发展，增强城市居民对港口区域的亲近感，营造宜居港湾环境。

（二）旧金山湾区发展主要经验

旧金山湾区在地理范围上包括加州 9 个郡以及在 9 郡范围内的 101 个市镇。根据美国公共管理与预算委员会的统计，旧金山湾区除去固有的 9 郡范围外，还包括与本地区联系紧密的周边 3 郡，共计 12 个郡（图 3）。



图 3 旧金山湾区 9 郡地理范围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旧金山湾区分为南湾、北湾和东湾，有三大全美知名城市——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其中，圣何塞所在的硅谷地区集聚了大量全球著名的高科技企业，也因其科技创新能力享誉全球，被誉为科技创新和未来经济的引擎与风向标。旧金山湾区形成规模时间较晚，湾区城市多数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美国国内中产阶级和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到此生活，是加州唯一来自全美其他城市人口流入大于本地区人口流出的地区。旧金山湾区人力资本较为充足且质量很高。据统计，湾区 2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中超过 40% 拥有学士或更高层次学位（图 4）。湾区还拥有数量众多的著名大学，如加州大学及加州理工，持续不断为湾区发展提供优秀人才。旧金山湾区发展的经验主要如下。

一是宜居环境对人才的吸引是湾区能够持续引领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湾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批具有较高知识技能水平的人才到此地生活创业，科技人才在硅谷的集聚逐渐带动硅谷产生具有规模效应的高科技产业，随后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长期以来，湾区宜居环境都被视为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湾区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加州以法案形式规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湾区政府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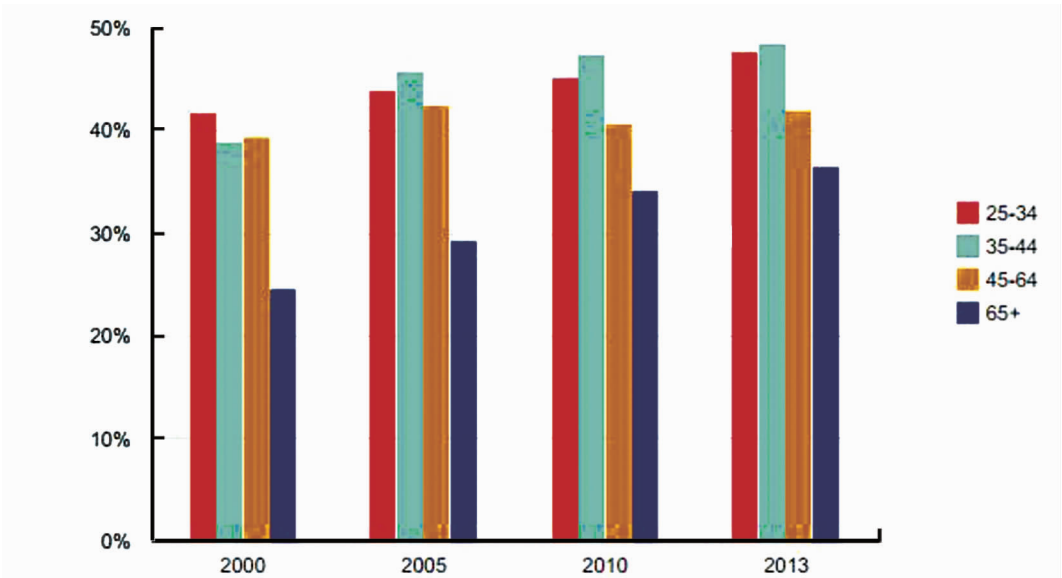


图 4 旧金山湾区各年龄组拥有学士及以上水平学位的人口数量比重对比

资料来源：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2000 and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 – Year Estimates

出台引导性规划方案，从交通、住房、城市土地开发等方面，协调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环境为湾区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体制差异，美国地方自治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没有上下层级划分，在经济发展中秉持市场原则，也没有权限制定能够具有超前特征的产业政策。这种做法实际上维持了湾区较为自由、宽容的创新环境，有利于科技人才试错创新。这一特点应该被视作旧金山湾区经济发展的独特因素。

三是交通网络体系规划注重在绿色交通理念指引下，通过改造现有交通体系和新建城市间交通体系，增加公共交通出行和城市间要素流动。旧金山湾区交通规划较为注重在现有产业和城市发展基础上，通过对人流、物流状况的数据化评定，对交通体系进行改造，从而提升交通网络的便捷性，实现公共出行和要素流动的高效率，进而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目标。这种规划方案既能够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又极具针对性地满足了产业和人口流动需求，且涵盖了环境保护这一长期目标，值得加以认真借鉴。

四是主要城市之间功能划分较为明确，且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竞争。由于旧金山湾区经济主要秉持市场原则，湾区三大主要城市各自形成具有不同定位的产业结构。如旧金山市注重发展金融业、旅游业和生物制药产业，奥克兰市发展装备制造和临港经济，圣

何塞市因处于硅谷重点发展信息通讯和电子制造、航天航空装备等高技术产业。

三、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发展经验借鉴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 GRP 已达 1.3 万亿美元，超越了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的差距逐渐缩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 6520 万标箱，是东京湾港口货物吞吐量的 8 倍；机场旅客吞吐量 2015 年已达 1.5 亿人次，超出东京湾区机场旅客吞吐量近 4000 万人次，是旧金山湾区机场旅客吞吐量的 2 倍。通过将粤港澳大湾区与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对比（表 4），可以看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交往功能、集聚外溢效应和规模效应正在不断提升。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已经具备较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为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竞争力，参照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建设发展经验，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表 4 2015 年粤港澳大湾区、东京湾区与旧金山湾区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粤港澳大湾区（9+2）	东京湾区（一都七县）	旧金山湾区（加州 9 郡）
地区生产总值	1.3 万亿美元	1.8 万亿美元	7585 亿美元
区域面积	5.6 万 km ²	3.68 万 km ²	1.79 万 km ²
人口	6672 万	4383 万	760 万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6520 万 TEU	766 万 TEU	227 万 TEU
机场旅客吞吐量	1.5 亿人次	1.12 亿人次	7147 万人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美国统计局、旧金山湾区各机场统计数据及 WIND 数据整理而得

注：旧金山湾区 2015 年 GRP 数据涵盖加州 9 郡和圣贝尼托、圣塔克鲁兹、圣华金 3 县；旧金山湾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值为 2015 年奥克兰港数值，旧金山 3 个港口中只有奥克兰港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 50，里士满港和旧金山港数据缺失

（一）科学划定湾区地理范围

湾区地理范围的划定涉及对于一系列相关概念的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湾区概念指与自然形成的海湾水面相连接的近海陆地区域，一般指港口及在港口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或者市镇的集合。现代意义上的湾区概念不仅包含与海湾水面接触的陆地城市区域，还包括与狭义湾区概念中所指城市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城市群。这种经济联系既表现为交通连接的紧密，也表现为人口、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城市间的快速流动。按照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辛西娅·克罗尔（Cynthia·Kroll）教授的定义，湾区地理范围的划定标准主要有陆地涉水区域、交通通达性和人口等要素流动的紧密性三项内容。从东京

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建设的实践情况来看，日本、美国对湾区范围的划定基本遵循了上述划定标准。

例如，按照日本国土交通省相关业务部门的解释，东京湾区的范围设定主要指东京港、横滨港、川崎港、横须贺港、千葉港等数个临海港口的集合（按照港湾局有关法令，港湾规模包括港湾区域与临港区域，即水域和陆域）。但从湾区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湾区的范围一般被认为与“东京圈”范围重合，即包括临近东京湾水面的东京都、千葉县、埼玉县以及神奈川县，而且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东京圈”的地理范围理解进一步扩大。按照日本于1956年通过的《首都圈整備法案》以及随后的5次修订，现在通行的“首都圈”不仅包括东京圈“一都三县”，而且包括在三县周边与东京圈经济联系紧密的茨城县、栃木县、群馬县和山梨县四县。从湾区经济的角度来理解东京湾区的地理范围，应是指“首都圈”即一都七县（图5）。



图5 东京都市圈地理空间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2016 年

此外，从旧金山湾区的地理范围划定来看，旧金山湾区不仅包括与湾区水面相邻的旧金山郡（市）、阿拉米达郡、康特拉科斯塔郡、马林郡、纳帕郡、圣马刁郡、圣塔克拉拉郡、索拉诺郡、索诺玛郡等9个郡，而且包括从就业、交通等方面与湾区9郡联系紧密的圣华金郡、圣塔克鲁兹郡、圣贝尼托郡等3个郡。美国公共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将上述12个郡作为一个区域进行统计，并将这一地区命名为“圣何塞—旧金山—奥克兰，加州联合统计区”。从经济角度理解，旧金山湾区的范围应是指上述12个郡范围内的郡、市、镇的集合。

可以看到,对于湾区地理范围的划定,不仅包括自然地理概念意义上的临水地域,而且包括与临水地域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腹地地区。因此从通行概念来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范围,就不仅包括香港、澳门、深圳、东莞等临水城市,也应考虑将与临水地区联系紧密的腹地地区纳入规划范围。按照目前粤港澳地区城市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地理区位、产业结构、交通通达等诸方面因素,建议将粤港澳大湾区范围界定为珠三角“9+2”城市群,即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东莞市、佛山市、中山市、江门市、惠州市、肇庆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二）湾区发展规划应注重地域发展的层次性

以东京湾区为例,传统意义上的东京湾区仅包括港湾区域和临港区域,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资金、人才等要素逐渐快速向东京都集聚,城市功能的协调发展需求使得日本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将临近东京都的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三县纳入东京圈范围,以东京圈为规划范围制定产业发展政策。2000 年以后,东京圈范围向首都圈范围延伸,纳入群马县、栃木县、山梨县和茨城县四县。2015 年 8 月,日本政府批准“新国家空间战略”(New 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按照这项为应对日本国内少子化危机、灾害防治,以及强化日本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的要求,日本国土交通省颁布了《首都圈广域地方计画》,在原有“首都圈”范围基础上,将与首都圈地域连接的福岛、新潟、长野、静冈四县纳入“广域首都圈”范围,从而形成以东京湾核心区域“东京圈”——广义“东京圈”概念下的“首都圈”——“广域首都圈”三个地理空间层次逐次扩张的地域经济发展空间。

这种规划构想不仅能够持续强化湾区中心城市在引领湾区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能够通过更为合理的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实现要素流动的便捷快速目标,带动延伸地区和辐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实现湾区核心区、延伸区、辐射区区域之间的要素对流,增强经济活动的总体效率,以及制定更大范围的区域性产业规划和环境与社会治理方案,从而推进产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借鉴日本东京湾区发展经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也应在强化湾区内部建设的同时,依据交通通达性和产业结构、土地空间开发利用状况、水污染治理需要等因素,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核心区基础上,划定延伸区和拓展区,从而更好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地位和辐射泛珠三角、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引领作用。

（三）优质生活圈建设是未来引领湾区发展、增强湾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

建立绿色、低碳、宜居、可持续的优质生活圈,目前已经是全球公认的城市群发展

基本愿景。作为城市群发展重要形态的湾区建设，更应将优质生活圈建设作为引领湾区发展、增强湾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以旧金山湾区为例，按照加州于 2008 年颁布的《环境法案》，旧金山湾区将于 2030 年实现年温室气体排放比 1990 年降低 40%，并通过“低于 2 度联盟”协定，承诺到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比 1990 年降低 80%~95%。依据法案规定，2013 年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和大都市交通委员会联合颁布《湾区规划：建立可持续发展湾区的战略》，将目标集聚在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须达成的各项措施上。包括进行巨额投资实现交通网络升级，增强城市交通联系的便捷性从而降低汽车使用强度；进行合理的土地开发空间规划，划定在城市区域内的优先发展区和潜在优先发展区发展现代产业，避免因产业发展需求大规模开发绿地；强化湾区北部区域农业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实现特色农业品牌效应；提供可供就业人口负担的住房建设，满足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带来的住房需求。规划认为，通过每年高达 600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能够实现在交通、住房、环境保护等诸方面的目标。同时，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在农业区着重发展可持续农业、清洁能源、有机农场经营和高品质农产品，打造纳帕红酒和以加州料理为主的加州烹饪艺术等享誉世界的特色农业品牌。这些以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础的农业、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与南部圣克拉拉山谷中的著名科技创新企业一同构成对于创新人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宜居环境，从而通过吸引人才集聚继续增强科技创新、生物制药等核心产业的竞争力。

借鉴旧金山湾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应该将建设优质生活圈作为未来引领湾区发展、增强湾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具体应考虑将珠江水流域污染防治和大气环境治理作为优质生活圈建设的基础，加快形成珠三角绿色生态水网。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强化利用既有已开发土地空间进行产业革新，着重推进港城和谐发展，在通过填海开发新的港口用地的同时，借鉴东京湾经验，对旧有港口进行空间再利用。同时，推进建设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强化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统筹协调在大湾区范围内发展具备特色的现代农业，构建连片绿色空间；推动发展绿色交通，提升湾区城市群之间交通联系的强度，提高城市轻轨、地铁、空港与公路体系网络的便捷程度；在湾区临海区域发展游轮、游艇等观光产业，提高海域开发利用强度；初步建立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增强海洋经济国际竞争力。

（四）良好的体制机制是湾区发展的根本保证

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跨行政区域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和高效组合，是湾区经济区别于其他区域经济形态的特别之处。而要素组合形成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离不开

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以硅谷为例，科技创新机制、风险投资机制和政府政策支持机制是硅谷能够长期引领全球科技创新的基础。在科技创新机制运作方面，硅谷的著名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每年向硅谷输送几千名技术人才，并连续不断将研究成果向企业 and 创新人才推介，促进研究成果向科技成果的转换。以人才为纽带，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科技创新的基础。在风险投资机制运作方面，硅谷科技企业可能提供的巨大资本回报促使硅谷地区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孵化器企业，而风投资本的介入放大了科技企业的成长空间，以股权融资为特点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逐渐形成，包括风投资本在纳斯达克市场的退出机制、机构投资者准入制度、风险资本盈利税率优惠政策和以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支持的债权融资“科技银行”的建立。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的融合带动专业服务性机构如法律、会计、技术支持等配套行业发展，并推动各类行业协会塑造一批创新环境支撑平台。此外，美国政府虽不积极干预产业发展，但强调以引导性政策促进研发活动和培育创新环境，形成政府对硅谷创新的政策支持机制。例如，加州政府每年的政府采购总额在 100 亿美元左右，通过政府采购对于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进行扶植。加州政府还出台研发税收抵扣政策，给予企业内部研发和外部研发不同的研发税收抵扣比例，强化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美国政府还积极支持形成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放宽对于高技术人才移民的签证限制，以吸引更多高技术人才投入创新产业。

可以看到，湾区发展既要更好发挥政府宏观指导引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社会、行业协会、创新人才的积极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应按照优势互补、创新合作、共治共享的原则，以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为方向，打破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落差，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中介服务、人员流动、环境治理等领域创新合作发展机制和模式。

（五）携手规避产业同质竞争

城市功能分配合理、产业优势互补是世界主要湾区的重要发展经验。以东京都市圈为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东京都市圈在空间结构上经历从“一极集中”向“多极多圈”结构的转变，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了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基本避免了城市功能集聚和产业同质竞争的状况。其发展阶段主要有两个时段：一是利用 20 世纪 60 年代东京都产业结构升级契机，将原有的重化工和制造业向横滨县与千叶县迁移，形成京滨、京叶工业带。东京市集中发展金融服务、对外贸易、高端技术等高附加值产业，京滨、京叶工业带承接重化工、装备制造、机械设备等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成东京都市

圈第一次产业分工格局。二是随着东京都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扩张，京滨、京叶工业带产业升级的需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利用立法和规划手段再次对东京都市圈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此次调整过程中，以交通规划、新城规划和产业规划同步的形式，在东京都周围形成规模不一的现代服务功能区，包括中心商务区、特色功能型新城、城市副中心新城和居住新城。在强化以交通便捷引导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划定了东京都市圈地域产业分布的基本结构。即以东京为政治、金融、科技中心，重点发展创新与服务经济，多摩地区发展商业、科技产业；神奈川县发展港口贸易、科技研发、商业，埼玉县成为居住生活和商务职能集聚区，千叶县发展空港经济和国际物流，茨城县南部重点集聚大学及科研机构。此次调整更重视城市区域间产业优势互补与合作，形成了第二次产业分工格局。

参照东京湾区发展经验，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现实，推进粤港澳合作发展，规避产业同质竞争，要进一步增强粤港湾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总体性和引导性。通过明确城市功能定位，设置具有引导性的产业、交通、环保指标，规避城市之间产业同质竞争；通过交通规划、新城规划、港口规划一体化的做法，逐步建立区域城市扁平化发展协作机制，从而形成区域内部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 杨东亮、王弈钦：《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式收敛表现》，《现代日本经济》2016 年第 3 期。
2. 中国指数研究院：《京津冀离世界级都市圈还有多远？》，界面新闻，2016 年 11 月 18 日。
3. 日本经济产业省：《东京都地域经济分析》，2012 年。
4. 日本国土交通省都市局：《平成 28 年版首都圈白皮书》，2016 年。
5. 日本国土交通省国土政策局：《广域首都圈计画》，2016 年。
6. 日本国土交通省港湾局：《港湾別コンテナ取扱量（TEU）ランキング》，2015 年。
7. 大都市战略检讨委员会：《大都市戦略：～次の時代を担う大都市のリノベーションをめざして～》，2016 年。
8. AAPA. NAFTA Region Container Traffic, 2015 Port Ranking by TEUs, 2015.

责任编辑：李 蕊

· 智库信息 ·

全球化新形势： 新挑战、新机遇、新对策

——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圆桌会议综述

逯新红

一、经济全球化重大缺陷在于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和包容性

（一）全球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指出，从人类发展历史角度看，全球化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从资源配置方式看，全球化是政府对跨境贸易和投资放松管制的过程。从经济学理念上看，全球化是人类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收益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件好事，每个人都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

（二）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按照多数人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反全球化浪潮兴起

印度尼西亚哈比比中心副研究员亚历山大·尚德拉认为，目前可能低估了全球化遇到的困难，实际情况比预想的严重。全球化危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出现了，主要表现为美国成年男性就业率不断下降，50% 的人口在全球化中没有受益。巴基斯坦中国研究所执行主任穆斯塔法·海德尔·赛义德认为，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反全球化，美国反全球化的原因是认为其在亚洲贸易中吃亏了，美国应直面这个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大家对全球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1990 年以来的全球化通过科技泡沫、信息技术泡沫和金融泡沫，将主要国家带入了虚拟化、泡沫化、空心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当前去全球化实际是全球化战略的调整，调整的原因是指导全球化的发达经济体对目前的全球化结果不满意。国家创新和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彭森认为，不能否定经济全球化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三）要认真对待经济全球化中的两个基本矛盾

彭森指出，如何平衡美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矛盾，如何平衡资本利益和劳动者利益

的矛盾，是经济全球化中的两个基本矛盾。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两个概念，是破解上述两个矛盾和指导未来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方针。

（四）美欧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

张宇燕指出，当前出现逆全球化的声音主要在于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按照多数人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市场失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认为，全球化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观点有待商榷。事实上，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远远高于名义收入的增长，这是拉大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原因。

二、未来全球化仍将继续前行

（一）全球化发展要求加强全球治理

张燕生指出，未来全球化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全球化走向光明，要让开放、市场化、创新等三个发动机起作用；另一个是全球化前途黑暗，可能会爆发战争或经济危机。全球治理就是要让全球化的三个发动机起作用，要有大国担当，能够给全球的年轻人、妇女和小企业创造参与全球化的机遇。比如 2016 年马云提出的全球电子商务平台（EWTP），对于推动新全球化至关重要。

（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崛起成为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拉克什曼·卡迪尔加马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迪努莎·潘迪特拉滕认为，未来全球化要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不能只看到全球化的缺点，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俄罗斯联邦政府分析中心主任康斯坦丁·诺斯克认为，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可能会逐渐丧失领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崛起将成为新的趋势。

（三）服务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新动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服务贸易较快发展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中心正加快从货物贸易领域转向服务贸易领域，服务贸易将影响和决定全球及区域自由贸易的进程与格局。中国服务贸易具有较大增长潜力，保守估计到 2020 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 1 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达到 10% 左右。到 2030 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进口国。这不仅对中国转型升级有重大作用，而且将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三、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用好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和区域性组织

张宇燕指出，要加强全球治理，解决全球化引发的市场失灵，发挥大国领导力。彭森指出，要重新考虑全球治理体系。G20 的出现是一个标志，用好 G20 机制和区域性组织，比如东盟、欧盟、拉盟、非盟、阿盟，形成一个不是由某国主导的全球化，而是大家手拉手一起前进的全球化。

（二）全球化从侧重有效配置资源转为做大蛋糕与合理分配蛋糕并重

张宇燕指出，应打击跨国公司逃税避税行为，主要国家通过制定或者修订收入分配，尤其是教育、医疗、社保政策，对全球化受损者进行补偿。一些大国，特别是 G20 成员国，要严防竞争性货币贬值，不给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口实。

（三）加强全球金融监管

彭森指出，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很大的问题是金融失控，使老百姓非常不满，矛盾加剧。因此，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要考虑贫困人口的感受。

（四）创新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康斯坦丁·诺斯克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改变发展的性质，将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技术驱动以及服务和信息驱动。各国可以开展大型长期项目的国际合作，加大研发资金投入，提高创新速度和水平。建立全球投资新机制，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平衡发展。

（五）加大社会转移支付力度

欧洲中心马达里亚加学院执行主任皮埃尔·德福安指出，应加大社会转移支付力度，平息反全球化声音。比如欧洲占全球人口的 7%、全球产出的 22%、社会转移支付的 50%。

（六）中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捷克前总理、捷克社会民主党前主席伊日·帕鲁贝克表示，面对全球治理碎片化的趋势，要采取措施使全球化更加具有包容性。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亚投行可能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变革。

四、“一带一路”倡议为引导未来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德国席勒研究所所长海尔加·塞普·拉鲁奇表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

建立全球新经济秩序的标志性事件，下一阶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在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美国和欧盟应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之路将使人们朝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努力。彭森指出，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入人心，并推动具体政策落实。李扬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承认各国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共赢，并与各国发展战略相对接。张燕生指出，当前全球产能过剩，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产能短缺；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全球经济福利严重过剩，但这些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是短缺的。过去十多年，美国和欧盟的过剩实际上高于新兴大国，金融泡沫形成之后，“一带一路”倡议要实现经济再平衡。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要改变规则，而是通过推进项目落地，给沿线国家带来福祉，不要过于期望它改变世界格局。康斯坦丁·诺斯克指出，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应支持全球稳定发展，避免经济活动受政治影响。全球融资体制应多元化，全球应积极开展教育合作，进一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二）“一带一路”是一条多彩之路

布鲁塞尔的布鲁盖尔研究所非驻会研究员苏曼·贝利认为，在很多方面，“一带一路”倡议都构成了和资本主义的反差。目前出现西方拒绝开放、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张开放的情况，这一转化将是长期的。亚历山大·尚德拉认为，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项目将改变人们的观念，比如欧亚大陆国家的定义可能会变化。“一带一路”倡议要坚持多边框架。蒙古经济政策和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拉克希米·布朱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在国家层面达成共识才能推进。土耳其马尔马拉基金会主席阿坎·苏威尔表示，“一带一路”是和平生活的重要载体。皮埃尔·德福安认为，所有国家要集体打造“一带一路”品牌，注重正面宣传以消除误读。

（三）智库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秘鲁发展分析集团执行董事米盖尔·贾拉米罗·巴南特指出，智库应通过合作研究来推动各国合作。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乔纳森·希尔曼认为，智库可以为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合作提供风险指导。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理事长田中直毅指出，“一带一路”项目实际风险评估应由实际操作者决定，即银行管理者或投资基金经理，智库主要分析潜在风险。张宇燕指出，学术界特别是智库研究者，要用理论和事实说明长期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将惠及每一个人，并促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7 年 9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复苏更加同步

2017 年 9 月 20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中期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 2017—2018 年有望加速增长，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变得更加同步，但中期增长前景仍不稳定。报告预计，2017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 3.5%，与 2017 年 6 月的预测持平；2018 年增速将达 3.7%，比此前预期上调 0.1 个百分点。

2017—2018 年，美国经济预计分别增长 2.1% 和 2.4%；英国预计增长 1.6% 和 1.0%；欧元区预计增长 2.1% 和 1.9%，比此前预期分别上调 0.3 和 0.1 个百分点，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元区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预期均有上调；日本经济预计分别增长 1.6% 和 1.2%；中国经济分别增长 6.8% 和 6.6%，均比此前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俄罗斯两年均将增长 2.0% 左右；因受商品服务税改革影响，印度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至 6.7% 和 7.2%。

OECD 首席经济师曼恩说：“全球经济短期有一些动能，这种动能正变得普遍，其中一种衡量方式就是放眼全球，没有发现哪个国家的经济在萎缩，这是 2008 年来的首次。”他表示，全球经济出现同步好转是企业进行投资的重要信号。报告再次呼吁各国政策决策者制定均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更好地利用税收和支出政策，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

（二）世贸组织大幅上调 2017 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

考虑到中国经济 2017 年上半年的强劲增长对亚洲进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等因素，世界贸易组织（WTO）2017 年 9 月 12 日将 2017 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2.4% 大幅上调至 3.6%。

WTO 表示，得益于全球主要贸易大国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2017 年上半年全球贸易同比增长 4.2%。其中，发达经济体进口和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1% 和 3.1%，发展中经济体进出口分别增长 6.9% 和 5.9%。从地区来看，2017 年上半年亚洲地区贸易增长最为强劲，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8.9% 和 7.3%。亚洲地区金融环境改善并趋于稳定，提振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也是该地区贸易增长的原因。北美地区贸易增速位居第二，2017 年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9% 和 4.9%。

WTO 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全球贸易前景改善虽令人鼓舞，但世界经济面临的重要威胁依然存在，并可能轻易破坏贸易复苏。这些威胁包括，保护主义言论可能变成贸易限制行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大规模经济损失等。WTO 同时预测，受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等因素影响，2018 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 3.2% 左右。

（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敦促各国政府结束财政紧缩

2017 年 9 月 14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贸发会议”）发表报告敦促各国政府结束财政紧缩政策，以推动经济加快复苏进程。贸发会议在《2017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中预测，2017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2.6%，高于 2016 年的 2.2%，但远低于金融危机前 2001—2008 年的年均增速 3.2%。

报告预测，2017 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为 1.9%，高于上年的 1.7%，但低于 2005 年的 2.2%。报告认为，财政紧缩政策阻碍了发达经济体强劲复苏。根据贸发会议的调查结果，14 个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有 13 个在 2011—2015 年间实施过紧缩政策。贸发会议呼吁各国协调采取扩张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等方式，让各国都能从国内外市场同时发展中获益。

（四）加息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2017 年 9 月 18 日，国际清算银行（BIS）警告称，世界已变得习惯廉价信贷，以至于更高的利率可能破坏全球经济复苏。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将利率削减至历史低点，并向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资金，以提振经济增长。现在，这些央行正准备收紧

货币政策。BIS 被称为央行的央行，因为各国央行在该行开设账户。该行表示，政策制定者在试图让市场和企业摆脱对格外廉价资金的依赖之际，需要把握微妙的平衡。

BIS 首席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里奥（Claudio Borio）警告，利率开始上升后，企业 and 市场将面临风险，因为央行的宽松政策已经使债券和股票价格超出其根本价值，并导致一些公司累积债务，或避免偿还在 2008 年危机之前背负的债务。他认为，债券市场眼下的平静并未反映经济状况，只能用央行的参与来解释。“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其中起作用的所有因素。但是，货币政策正常化方面空前的渐进步伐肯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表示，“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市场参与者认为，如果不合理的市场紧张加剧，央行将不会坐视不管”。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预期美联储将在 2017 年 12 月再次加息。英国央行被认为很可能在 11 月进行 2007 年 7 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而欧洲央行（ECB）已表示将在近期宣布退出其 2 万亿欧元量化宽松政策的计划，很可能从 2018 年 1 月开始行动。BIS 称风险在于，企业现在面临一个债务陷阱，即在借款便宜期间背上这么多信贷后，当利率上升时，他们可能难以偿还债务；还有一个可能的威胁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高地价，这些地方的一些开发商通过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来买地。

（五）全球贸易复苏推动亚太经济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日前发布《2017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版预测，2017 年和 2018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分别为 5.9% 和 5.8%。报告指出，在全球贸易复苏、主要工业经济体稳健扩张、中国经济前景良好等因素带动下，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强劲。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说：“由于全球贸易复苏和中国强劲增长势头的带动作用，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前景有所好转。亚洲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良好的短期经济前景，实施有利于增强生产力的改革，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维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提高长期增长潜力。”泽田康幸称，贸易复苏推动了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2017 年前 5 个月亚洲地区出口产品按美元计价比上年同期增长 11%，进口产品比上年同期增长 17%。出口价值在此前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制造商外部需求疲软连续两年收缩之后，于 2017 年重见起色。

报告显示，由于消费者信心和商业信心回升，日本经济增长意外呈现上升趋势。得益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意料之外的外部需求，201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预

计 2017 年 GDP 将增长 6.7%，较之前预测提高 0.2 个百分点。2018 年，随着中国削减工业过剩产能、减少金融风险等经济结构改革继续推进，增长可能略微放缓。在印度，货币政策以及新商品和服务税制的实施削弱了消费支出和商业投资，2017 财年印度的 GDP 增长率下调至 7%，较 2017 年 4 月的预测低 0.4 个百分点。2018 财年的增长预期从 7.6% 下调至 7.4%，但经济仍将有较好表现。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增长势头更加强劲，其产出将从 2017 年的 5% 稳步上升至 2018 年的 5.1%，分别高于之前预测的 4.8% 和 5%。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口增长将带动该地区经济增长，但亚行对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预测保持不变。鉴于油价稳定、俄罗斯经济增长前景好转、汇款不断增加等因素，2017—2018 年中亚地区的增长预期有所上调。另一方面，2017 年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展望保持不变，但 2018 年略有下调。

报告指出，亚太地区面临的风险已变得更加均衡。该地区潜在的上行风险包括美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油价下滑，下行风险则包括全球流动性收紧、地缘政治事件导致的经济干扰以及气象灾害等。当前，亚太地区虽然已做好迎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准备，但其高负债水平已对地区的金融稳定构成了风险。由于许多亚洲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与美国的长期利率紧密挂钩，各国决策者需进一步加强国家财政，密切监测债务水平和资产价格。

（六）人口老化将拖慢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增长

2017 年 9 月 7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韩国首尔一场探讨“亚洲经济挑战”的会议上警告，人口老化将拖慢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步伐，因此政策制定者须加紧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拉加德指出，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的人口都在迅速老化，这些国家都面临劳动队伍缩小以及生产力增长放缓的前景。她说：“我们预计这些国家的 GDP 年增长率可能降低多达 1 个百分点。”报道称，中国与日本分别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经济放缓将对世界各地产生显著的连锁反应。

研究显示，亚洲是世界人口老化得最快的地区。据预测，2050 年亚洲人口将出现零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将在未来数十年不断缩小。其中，日本将成为第一个“超高龄”国家，即全国总人口中有 28% 为 65 岁或以上老人。韩国到 2030 年则预计有 1/5 人口为 65 岁或以上的老人。

拉加德呼吁亚洲各国政府设法“提高劳动队伍中的女性占比”，包括为职场母亲提供更好的育儿福利与鼓励她们兼职工作等。印度等人口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应为妇女提

供更好的教育，并让她们更容易获得金融援助。她援引预测数据说，若能缩小劳动市场的性别鸿沟，日本、韩国与印度的 GDP 有望分别提高 9%、10%与 27%。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越来越大

2017 年以来，世界经济总体上好于预期。IMF 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将中国 2017 年和 2018 年的经济预期分别上调 0.1 和 0.2 个百分点至 6.7%和 6.4%。这也是本年度 IMF 第三次上调中国 2017 年经济增长预期。与此同时，摩根大通、野村证券、渣打银行、花旗银行、亚行等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也纷纷上调中国 2017 年经济增速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良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

欧洲国际政策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报告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动能不足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显得尤为珍贵。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 30%，理所当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着力推进经济转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出经济增长潜力，改进中国经济发展质量。随着中国去产能工作的深入推进，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将更加凸显。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2017 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再次超出市场预期，保持在 6.9%的水平，超过了上年全年增速。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保持稳定增长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还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报告认为，中国早已摒弃单纯追求 GDP 增速的做法，以推进改革追求以质量和可持续性为目的的新型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具有强劲的韧性，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为新动能的培育与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政府目前也在加快增长动能的转换：以投资、制造业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让位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者模式。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消费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政府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也正在逐步释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措施得到逐步落实，有效地化解了产能过剩问题。这将优化行业内的资源配置，为更加优质的企业发展提供空间，推动行业市场的发展。有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通过去产能措施使钢铁行业产能下降了 6500 万吨，煤炭行业减少了 2.9 亿吨的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将逐步在众多行业深入推进。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不断优化的投资结构与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好的环境和科学的投资引导将会更加有效地激发社会的创造力。中国制造业正在加

快向中高端迈进，中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长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互联网发展催生出新的消费业态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这些新的增长点和新动能对经济的助推力正在不断加大，支撑作用也在显著加强。未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引领下，中国新动能的支撑作用将继续增强。

（二）美国媒体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2017年9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的经济数据表明增长继续保持在即便没那么令人兴奋也颇为平稳的速度上，股市也在回升中。投资者和经济专家表示，中国为保持经济处于可控状态而采取的行动，恢复了对中国管理经济的一些信心。随着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消除了投资者对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健康状况的担忧，股市也开始从两年前的崩盘中恢复。此外，有弹性的经济增长表明企业利润可能会增加。

报道称，人民币是中国经济健康的一个衡量标准，在经济繁荣时期，人民币主要是升值。2017年9月11日，人民币币值达到一年半以来的最高。在2016年年底跌至近7元人民币兑1美元后，人民币汇率逐步反弹。11日上午，中国央行发布的汇率略高于6.5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是自2016年5月以来的首次。

对中国的货币“市场从看跌大幅逆转”，德国商业银行新加坡办事处的经济学家周浩表示。其他货币走势尤其美元，是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之一。随着美联储因为美国经济增长不及预料的有力而迟迟不愿加息，加之通货膨胀尤其低于预期，导致美元贬值。终于开始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的欧洲，过去一年里欧元兑美元大幅上扬。因此，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但兑欧元却贬值了。这降低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商品的中国工厂的影响，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它们的竞争力。

报道认为，中国也许能从自己的货币升值中获得一些政治益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以来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指责北京“操纵货币”保持低价——这项指责不是事实。“如果美元在贬值，中国有很多轻松的政策选项”，美国财政部前副助理部长、现外交关系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布拉德·W·塞策说。

（三）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

2017年9月21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展望由负面调整至稳定。此次降级的主要依据是，“长时间强劲信贷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按照标普的说法，尽管中国政府近期加大控制企业杠杆水平的力度，有望稳定中期金融风险趋势，但预计中国未来2~3年的信贷增长速度仍不低，会继续

续推动金融风险逐步上升。

不少学者认为，标普评级所采用的理论已经跟不上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难以及时、客观、全面呈现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更无法指明中国经济发展趋向。中国可以把标普的部分判断作为“善意的提醒”，但完全不必削足适履。“从标普给出的理由看，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信贷与流动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分析，“关注信贷与流动性本身没有问题，但仅仅因为短期指标变化就判断中国金融系统风险上升，从而调低评级，这值得商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与另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类似，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家机构“所采用的理论已经和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脱节”，它也没有合理评估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这就好比，标普为每个经济体套上一双同样大小款式的鞋子，继而来审视脚合不合适”，乔宝云说，“但我们完全不必惊慌，更不必削足适履。相反，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让我们有足够自信泰然处之。”

实际上，标普所提到的杠杆率问题，正是中国一段时期以来着力研究处理并已取得一定成效的课题。根据 BIS 数据，2016 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 166.3%，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这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 19 个季度上升后首次改变；中国信贷/GDP 缺口比 2016 年一季度末降低 4.2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季度下降，表明潜在债务压力趋于减轻。

分析人士认为，标普做出对中国“降级”的决定，不会对中国的外资吸引力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包括就业、企业利润、工业增加值等各项宏观数据依然表现较好。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正在持续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多项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部分专家认为，虽然标普的降级决定“存在误判”，但该机构指出的一些问题确实可以作为“善意的提醒”，比如深入推进去杠杆，并加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

责任编辑：李 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 年 10 月)				
世 界	3.4	3.2	3.6	3.7
发达国家	2.1	1.7	2.2	2.0
美 国	2.6	1.5	2.2	2.3
欧元区	2.0	1.8	2.1	1.9
日 本	1.1	1.0	1.5	0.7
发展中国家	4.3	4.3	4.6	4.9
印 度	8.0	7.1	6.7	7.4
俄罗斯	-2.8	-0.2	1.8	1.6
巴 西	-3.8	-3.6	0.7	1.5
世界银行(WB,2017 年 7 月)				
世 界	2.7	2.4	2.7	2.9
发达国家	2.1	1.7	1.9	1.8
发展中国家	3.5	3.5	4.1	4.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7 年 9 月)				
世 界	3.0	2.5	3.0	3.1
美 国	2.9	1.5	2.1	2.4
欧元区	2.0	1.7	2.0	1.8
日 本	1.1	1.0	1.4	1.1
印 度	7.7	7.1	7.3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世 界	2.6	2.4	4.2	4.0
进口				
发达国家	4.4	2.7	4.0	3.8
发展中国家	-0.8	2.0	4.4	4.9
出口				
发达国家	3.7	2.2	3.8	3.6
发展中国家	1.4	2.5	4.8	4.5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 10 月)				
世界	2.8	2.8	3.1	3.3
发达国家	0.3	0.8	1.9	1.8
发展中国家	4.7	4.3	4.5	4.6
英国共识公司(2017 年 9 月)				
世 界	1.9	2.5	3.0	2.9
美 国	0.1	1.3	2.0	2.0
欧元区	0.0	0.2	1.5	1.3
日 本	0.8	-0.1	0.5	0.8
印 度	4.9	4.5	3.6	4.6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6 年		1.3	0.4	2.7
	9 月	1.4	0.7	3.0
	10 月	1.5	0.9	2.6
	11 月	1.6	1.0	2.5
	12 月	1.8	1.4	3.0
2017 年	1 月	2.3	1.7	3.2
	2 月	2.4	1.9	3.7
	3 月	2.6	1.8	3.9
	4 月	2.3	1.9	3.7
	5 月	2.1	1.6	3.6
	6 月	1.9	1.3	3.5
	7 月	2.0	1.4	3.2
	8 月	2.1	1.5	3.4
	9 月	2.3	1.6	3.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6 年		2.1	0.4	4.3			
	8 月	2.4	0.9	4.3	50.7	52.0	51.1
	9 月	2.4	0.6	3.9	51.0	52.0	51.4
	10 月	1.8	0.6	4.3	51.9	53.5	52.8
	11 月	3.0	2.0	4.8	52.0	53.3	53.0
	12 月	4.2	2.7	5.1	52.7	53.9	53.7
2017 年	1 月	3.6	1.2	5.6	52.7	53.6	54.0
	2 月	3.6	2.4	5.0	52.9	54.1	54.1
	3 月	4.2	2.6	6.0	53.0	54.2	54.2
	4 月	4.2	2.8	5.6	52.7	53.6	53.6
	5 月	4.8	3.4	6.1	52.6	53.5	53.6
	6 月	4.2	3.1	5.8	52.6	53.2	53.3
	7 月	4.2	3.3	5.6	52.7	53.1	53.7
	8 月	4.1	3.2	5.3	53.1	53.6	54.2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9	3.6	1.4
	4 季度	0.5	2.7	0.3
2016 年		1.5	2.7	0.8
	1 季度	0.6	1.8	1.8
	2 季度	2.2	3.8	-0.9
	3 季度	2.8	2.8	0.5
2017 年	4 季度	1.8	2.9	0.2
	1 季度	1.2	1.9	-0.6
	2 季度	3.1	3.3	-0.2
	3 季度	3.0	2.4	-0.1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9	0.4	5.0
	4 季度	-2.4	-2.3	0.0
2016 年		0.7	-0.3	1.3
	1 季度	-0.2	-2.6	-0.2
	2 季度	1.4	2.8	0.4
	3 季度	1.5	6.4	2.7
2017 年	4 季度	1.7	-3.8	8.1
	1 季度	8.1	7.3	4.3
	2 季度	3.2	3.5	1.5
	3 季度	1.5	2.3	-0.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 年		2.9	3.6	1.4
	4 季度	2.0	3.0	1.6
2016 年		1.5	2.7	0.8
	1 季度	1.4	2.6	1.7
	2 季度	1.2	2.8	0.6
	3 季度	1.5	2.8	0.4
2017 年	4 季度	1.8	2.8	0.4
	1 季度	2.0	2.9	-0.2
	2 季度	2.2	2.7	0.0
	3 季度	2.3	2.6	-0.2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 %					单位: 亿美元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5 年		3.9	0.4	5.0	2016 年	24771		-2.2	27129		-1.8	-2358
	4 季度	2.4	-1.8	2.9	8 月	1874	1.1	0.3	2285	0.8	-1.2	-411
2016 年		0.7	-0.3	1.3	9 月	1881	0.4	0.4	2266	-0.8	-1.2	-385
	1 季度	1.3	-1.3	1.2	10 月	1856	-1.3	0.1	2287	0.9	0.7	-431
	2 季度	0.5	-1.6	0.5	11 月	1848	-0.4	0.5	2312	1.1	2.9	-464
	3 季度	0.1	1.0	0.7	12 月	1895	2.5	3.6	2347	1.5	4.8	-452
	4 季度	1.1	0.6	2.7	2017 年							
2017 年					1 月	1917	1.2	7.3	2405	2.5	8.3	-488
	1 季度	3.2	3.1	3.8	2 月	1923	0.3	6.3	2366	-1.6	4.6	-443
	2 季度	3.6	3.2	4.1	3 月	1922	-0.1	6.8	2370	0.2	9.1	-448
	3 季度	3.6	2.3	3.2	4 月	1916	-0.3	5.3	2389	0.8	8.4	-473
注: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5 月	1923	0.4	5.6	2387	-0.1	6.7	-464
表 10 劳动力市场					6 月	1950	1.4	6.1	2385	-0.1	4.8	-435
单位: %					7 月	1945	-0.3	4.9	2381	-0.2	5.0	-436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 (万人)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6 年						2015 年		4658		2626		2032
	9 月	3.3	0.1	5.0	24.9		3 季度	574		485		89
	10 月			4.9	12.4		4 季度	636		589		47
	11 月			4.6	16.4	2016 年		4571		2807		1764
	12 月	1.8	1.1	4.7	15.5		1 季度	1414		777		637
2017 年							2 季度	1617		762		855
	1 月			4.8	21.6		3 季度	1091		889		203
	2 月			4.7	23.2		4 季度	448		379		69
	3 月	0.0	1.2	4.5	5.0	2017 年						
	4 月			4.4	17.4		1 季度	770		1102		-327
	5 月			4.3	14.5		2 季度	783		997		-214
	6 月	1.5	1.3	4.4	21.0	注: 除年度数据以外,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7 月			4.3	18.9	资料来源: 美国劳工统计局。						
	8 月			4.4	15.6							
	9 月			4.2	-3.3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7	1.3
	3 季度	0.4	0.4	0.5
	4 季度	0.4	0.5	0.4
2016 年		1.8	2.1	1.7
	1 季度	0.5	0.7	0.8
	2 季度	0.3	0.3	0.2
	3 季度	0.5	0.3	0.2
	4 季度	0.6	0.6	0.4
2017 年				
	1 季度	0.5	0.4	0.2
	2 季度	0.6	0.5	0.5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1	6.6	6.8
	3 季度	1.0	0.6	1.2
	4 季度	1.5	0.9	1.6
2016 年		4.4	3.2	4.6
	1 季度	0.3	0.4	0.4
	2 季度	2.7	1.3	1.8
	3 季度	0.1	0.4	0.5
	4 季度	1.3	1.5	2.0
2017 年				
	1 季度	-0.3	1.3	0.4
	2 季度	0.9	1.1	0.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6 年		0.4		43.8	10.0
	7 月				10.0
	8 月				9.9
	9 月	0.2	0.2	46.9	9.9
	10 月				9.8
	11 月				9.7
	12 月	0.3	0.2	55.4	9.6
2017 年					
	1 月				9.6
	2 月				9.5
	3 月	0.0	1.0	77.5	9.4
	4 月				9.2
	5 月				9.2
	6 月	0.2	0.1	65.0	9.1
	7 月				9.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 年		2.0	1.7	1.3
	3 季度	2.0	1.7	1.3
	4 季度	1.9	1.7	1.5
2016 年		1.8	2.1	1.7
	1 季度	1.7	2.0	1.9
	2 季度	1.7	2.0	1.9
	3 季度	1.7	1.9	1.6
	4 季度	1.9	2.0	1.6
2017 年				
	1 季度	2.0	1.6	1.0
	2 季度	2.3	1.8	1.2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3.1	6.6	6.8
	3 季度	3.0	5.9	6.2
	4 季度	3.7	5.4	6.7
2016 年		4.4	3.2	4.6
	1 季度	2.8	3.1	4.2
	2 季度	5.6	3.2	5.1
	3 季度	4.6	3.0	4.3
	4 季度	4.4	3.6	4.7
2017 年				
	1 季度	3.8	4.5	4.7
	2 季度	2.0	4.4	3.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同比 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	(%)		(%)	(%)	口额
2016 年	20477		0.2	17758		-1.3	2719
7 月	1676	-0.3	-9.4	1428	0.9	-7.8	248
8 月	1606	2.7	8.6	1431	0.8	4.4	175
9 月	1771	-0.8	2.3	1527	-0.6	-1.1	244
10 月	1726	0.0	-4.5	1532	2.1	-2.9	195
11 月	1835	3.2	5.6	1593	2.2	5.6	242
12 月	1791	1.9	6.2	1515	1.4	4.9	277
2017 年							
1 月	1634	-1.0	12.8	1648	4.0	17.7	-14
2 月	1717	0.8	5.2	1553	-0.9	7.1	163
3 月	2054	2.2	14.6	1763	0.4	16.8	291
4 月	1689	-1.7	-1.6	1523	-0.3	4.3	167
5 月	1908	2.3	13.6	1707	2.5	18.1	201
6 月	1872	-1.9	3.9	1610	-4.0	6.4	262
7 月	1777	-1.1	6.1	1546	0.7	8.2	23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562	4143	- 3581
	7 月	- 35	158	- 193
	8 月	141	606	- 465
	9 月	- 519	- 55	- 464
	10 月	246	959	- 713
	11 月	223	516	- 293
	12 月	- 451	73	- 524
2017 年	1 月	913	1082	- 169
	2 月	949	951	- 2
	3 月	106	228	- 122
	4 月	74	276	- 202
	5 月	152	229	- 77
	6 月	17	- 405	422
	7 月	- 1855	- 1762	- 93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 1	- 0. 3	1. 7
	3 季度	0. 2	0. 6	0. 4
	4 季度	- 0. 2	- 0. 6	0. 7
2016 年		1. 0	0. 4	1. 3
	1 季度	0. 5	0. 3	1. 4
	2 季度	0. 5	0. 1	- 1. 3
	3 季度	0. 2	0. 4	0. 2
2017 年	4 季度	0. 4	0. 1	0. 0
	1 季度	0. 3	0. 4	- 0. 1
	2 季度	0. 6	0. 8	0. 4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 1	2. 9	0. 8
	3 季度	0. 4	2. 4	2. 5
	4 季度	- 0. 2	- 0. 4	- 0. 3
2016 年		0. 9	1. 2	- 2. 3
	1 季度	0. 3	0. 0	- 2. 0
	2 季度	0. 7	- 0. 9	- 1. 2
	3 季度	0. 2	2. 1	- 0. 2
2017 年	4 季度	0. 9	3. 1	1. 4
	1 季度	0. 8	1. 9	1. 3
	2 季度	1. 7	- 0. 5	1. 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 1	- 0. 3	1. 7
	3 季度	2. 0	1. 3	1. 6
	4 季度	0. 9	0. 0	2. 2
2016 年		1. 0	0. 4	1. 3
	1 季度	0. 5	- 0. 1	2. 7
	2 季度	0. 9	0. 4	1. 2
	3 季度	1. 1	0. 3	1. 0
2017 年	4 季度	1. 7	1. 0	0. 3
	1 季度	1. 5	1. 0	- 1. 1
	2 季度	1. 4	1. 7	0. 6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5 年		0. 1	2. 9	0. 8
	3 季度	1. 3	2. 9	1. 8
	4 季度	0. 1	- 0. 5	0. 6
2016 年		0. 9	1. 2	- 2. 3
	1 季度	- 0. 7	- 1. 4	- 2. 4
	2 季度	1. 6	0. 7	- 1. 1
	3 季度	1. 1	0. 8	- 3. 6
2017 年	4 季度	2. 0	4. 6	- 2. 0
	1 季度	2. 3	6. 6	1. 2
	2 季度	3. 4	6. 6	3. 9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6 年		- 0. 4	2. 06	3. 1
	8 月	5. 1	2. 07	3. 1
	9 月	0. 3	2. 10	3. 0
	10 月	- 2. 2	2. 11	3. 0
	11 月	4. 4	2. 15	3. 1
	12 月	1. 3	2. 19	3. 1
2017 年	1 月	3. 9	2. 13	3. 0
	2 月	3. 4	2. 12	2. 8
	3 月	4. 7	2. 13	2. 8
	4 月	5. 1	2. 13	2. 8
	5 月	3. 7	2. 31	3. 1
	6 月	3. 9	2. 25	2. 8
	7 月	3. 9	2. 27	2. 8
	8 月	5. 1	2. 21	2. 8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6 年	700358		-7.4	660420		-15.8	39938
9 月	59689	0.8	-6.9	54824	1.0	-16.1	4865
10 月	58702	1.7	-10.3	53891	0.2	-16.3	4811
11 月	59564	4.2	-0.4	58099	4.0	-8.7	1465
12 月	66789	2.1	5.4	60430	3.3	-2.5	6359
2017 年							
1 月	54220	0.8	1.3	65139	4.0	8.4	-10919
2 月	63475	6.4	11.3	55364	-1.2	1.3	8111
3 月	72296	-3.9	12.0	66193	3.5	15.9	6103
4 月	63294	-1.0	7.5	58503	-0.3	15.2	4791
5 月	58512	0.7	14.9	60576	0.4	17.9	-2064
6 月	66084	-0.8	9.7	61670	0.5	15.5	4414
7 月	64952	2.7	13.4	60732	-1.2	16.3	4220
8 月	62786	1.4	18.1	61659	1.4	15.2	1127
9 月	68110	-0.3	14.1	61408	0.7	12.0	6702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38307	183930	-145623
	8 月	-12931	-14142	1211
	9 月	-462	44740	-45202
	10 月	-68	15478	-15546
	11 月	5688	12014	-6326
	12 月	654	21720	-21066
2017 年				
	1 月	-75	10964	-11039
	2 月	2176	24160	-21984
	3 月	2497	26252	-23755
	4 月	3305	7937	-4632
	5 月	1441	17915	-16474
	6 月	635	15487	-14852
	7 月	751	12562	-11811
	8 月	2340	8266	-5926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5 年		0.9	2.2	1.3	-3.8	7.7	-3.3
	3 季度	0.8	1.8	0.9	-4.5	8.0	-3.2
	4 季度	0.4	1.7	0.6	-5.8	7.2	-3.8
2016 年		1.5	1.8	0.3	-3.6	7.9	-0.2
	1 季度	1.3	1.6	-0.6	-5.4	9.1	-0.4
	2 季度	1.1	1.7	0.3	-3.6	7.9	-0.5
	3 季度	1.5	2.0	0.7	-2.9	7.5	-0.4
	4 季度	2.0	1.9	0.7	-2.5	7.0	0.3
2017 年							
	1 季度	2.3	2.0	1.0	-0.4	6.1	0.5
	2 季度	3.7	1.7	1.1	0.3	5.7	2.5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5 年		2.8	2.6	2.4	0.8	5.0	4.9
	4 季度	3.2	2.5	1.9	-0.8	4.6	5.2
2016 年		2.8	2.3	1.9	1.5	4.2	5.0
	1 季度	2.9	2.2	1.0	-0.2	4.1	4.9
	2 季度	3.4	2.6	1.8	1.1	4.0	5.2
	3 季度	2.6	2.0	2.0	2.1	4.3	5.0
	4 季度	2.4	2.3	3.2	2.9	4.5	4.9
2017 年							
	1 季度	3.0	2.8	4.3	2.6	5.6	5.0
	2 季度	2.7	1.8	3.8	2.1	5.8	5.0
	3 季度	3.6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6 年		7.0	4.9	11.3	5.5	26.7
	9 月	7.0	4.8	11.8	5.2	27.1
	10 月	7.0	4.8	11.8	5.4	
	11 月	6.8	4.8	11.9	5.4	
	12 月	6.9	4.8	12.0	5.3	26.5
2017 年						
	1 月	6.8	4.7	12.6	5.6	
	2 月	6.6	4.7	13.2	5.6	
	3 月	6.7	4.6	13.7	5.4	27.7
	4 月	6.5	4.6	13.6	5.3	
	5 月	6.6	4.5	13.3	5.2	
	6 月	6.5	4.4	13.0	5.1	27.7
	7 月	6.3	4.3	12.8	5.1	
	8 月	6.2	4.3	12.6	4.9	
	9 月	6.2			5.0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6 年		3.7	3.9	3.4	3.9	3.5
	9 月	4.0	4.1	3.4	3.9	3.5
	10 月	3.7	3.7	3.4	3.9	3.5
	11 月	3.6	3.5	3.3	3.8	3.4
	12 月	3.5	3.4	3.3	3.8	3.5
2017 年						
	1 月	3.6	3.6	3.3	3.8	3.5
	2 月	4.0	3.4	3.3	3.8	3.5
	3 月	3.7	3.2	3.2	3.8	3.4
	4 月	4.0	3.5	3.2	3.8	3.4
	5 月	3.6	3.6	3.2	3.8	3.4
	6 月	3.8	3.3	3.1	3.8	3.4
	7 月	3.6	3.4	3.1	3.8	3.5
	8 月	3.8	3.5	3.1	3.8	3.4
	9 月	3.7	3.6	3.1	3.7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3902	4030	-128	4090	6366	-2276	2016 年	4954	4062	892	3739	3975	-236
8 月	337.3	357.2	-20.0	307.7	544.7	-236.9	7 月	408.8	333.7	75.1	297.7	324.5	-26.8
9 月	339.4	364.0	-24.6	334.1	501.3	-167.2	8 月	401.3	351.0	50.2	324.5	352.7	-28.2
10 月	337.6	339.7	-2.1	330.2	489.7	-159.5	9 月	408.5	339.9	68.6	327.0	351.5	-24.5
11 月	348.0	332.6	15.3	360.0	534.5	-174.5	10 月	419.8	350.5	69.3	326.0	344.1	-18.2
12 月	339.5	315.1	24.4	391.6	477.2	-85.6	11 月	453.1	372.4	80.7	343.4	352.0	-8.6
2017 年							12 月	450.7	383.0	67.7	331.9	341.3	-9.4
1 月	338.4	317.3	13.9	350.2	475.4	-125.2	2017 年						
2 月	323.4	324.5	-1.1	338.0	479.9	-141.9	1 月	402.7	575.6	-172.9	273.2	316.7	-43.6
3 月	372.6	372.0	0.6	387.4	561.7	-174.3	2 月	431.7	461.7	-29.9	313.4	314.4	-0.9
4 月	338.0	346.7	-8.6	334.4	485.9	-151.5	3 月	486.5	425.6	60.9	360.5	371.1	-10.6
5 月	368.4	374.0	-5.6	378.8	524.1	-145.3	4 月	508.5	379.9	128.7	317.5	317.3	0.2
6 月	361.8	386.9	-25.0	362.9	535.9	-173.0	5 月	449.4	393.5	55.9	354.7	375.4	-20.7
7 月	321.6	348.0	-26.5	389.2	514.0	-124.7	6 月	512.9	406.0	106.9	356.1	365.1	-9.1
8 月	344.0	380.3	-36.3	335.9	540.5	-204.6	7 月	488.4	385.6	102.9	321.6	346.0	-24.4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5 进出口贸易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751	750	1	1853	1435	418	2016 年	5167	5473	-306	2804	2306	498
9 月	70.8	65.8	5.0	158.0	125.2	32.8	8 月	435.6	456.3	-20.8	246.5	206.4	40.2
10 月	63.6	65.9	-2.3	137.2	118.7	18.5	9 月	470.1	498.4	-28.3	225.6	181.8	43.8
11 月	71.4	72.4	-1.0	165.2	119.6	45.6	10 月	447.8	484.9	-37.1	267.4	223.1	44.4
12 月	67.6	58.7	8.9	159.4	120.4	39.0	11 月	494.4	513.7	-19.3	253.3	210.2	43.1
2017 年							12 月	476.3	542.1	-65.8	257.0	208.4	48.6
1 月	59.3	67.5	-8.2	149.1	127.3	21.8	2017 年						
2 月	66.0	62.2	3.9	154.7	114.0	40.7	1 月	405.3	421.9	-16.6	237.4	202.5	35.0
3 月	77.9	69.3	8.6	200.9	135.3	65.5	2 月	355.5	403.9	-48.4	226.5	193.0	33.5
4 月	67.3	63.7	3.6	176.9	111.8	65.0	3 月	485.2	506.1	-20.9	257.0	217.5	39.5
5 月	77.3	71.9	5.4	197.9	126.6	71.3	4 月	447.8	456.7	-8.9	243.1	215.3	27.7
6 月	79.0	70.8	8.2	197.9	131.6	66.3	5 月	430.3	471.1	-40.8	255.1	220.6	34.5
7 月	70.9	63.8	7.2	187.7	130.3	57.4	6 月	491.8	525.2	-33.4	258.1	200.0	58.1
8 月	78.1	73.6	4.5	194.8	145.0	49.8	7 月	468.8	485.7	-16.9	271.1	217.4	53.7
9 月				140.3	106.5	33.8	8 月				277.7	220.6	57.1
表 33 进出口贸易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6 年	2642	3596	-954	2818	1914	904	2016 年	1894	1684	210	1445	1357	88
8 月	215.8	291.6	-75.8	232.0	184.5	47.5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228.8	319.9	-91.1	254.3	179.9	74.4	9 月	165.6	147.2	18.4	125.7	113.0	12.7
10 月	234.2	338.1	-103.8	249.0	183.0	66.0	10 月	165.6	142.3	23.4	127.4	115.1	12.4
11 月	200.8	327.4	-126.6	266.5	175.1	91.4	11 月	168.0	147.2	20.8	135.0	126.7	8.3
12 月	239.6	342.2	-102.5	311.3	192.9	118.3	12 月	169.4	149.8	19.6	138.3	127.8	10.5
2017 年							2017 年						
1 月	222.9	319.2	-96.4	251.2	136.8	114.4	1 月	157.6	146.9	10.6	134.0	119.7	14.3
2 月	255.4	332.3	-76.9	257.5	155.8	101.7	2 月	161.5	141.8	19.6	126.1	113.5	12.6
3 月	291.5	396.7	-105.2	313.3	187.3	126.0	3 月	186.1	174.0	12.2	146.8	132.8	14.0
4 月	246.0	380.7	-134.7	261.0	180.9	80.0	4 月	167.6	148.0	19.7	132.8	119.5	13.3
5 月	225.4	379.3	-153.9	281.7	196.5	85.2	5 月	184.1	171.3	12.7	143.5	137.7	5.8
6 月	235.8	365.4	-129.6	295.2	208.3	86.9	6 月	170.9	147.8	23.1	116.6	99.9	16.6
7 月	225.4	339.9	-114.5	347.4	207.7	139.7	7 月	183.4	164.7	18.7	136.1	138.9	-2.8
8 月	238.2	254.6	-16.4				8 月				152.1	134.9	17.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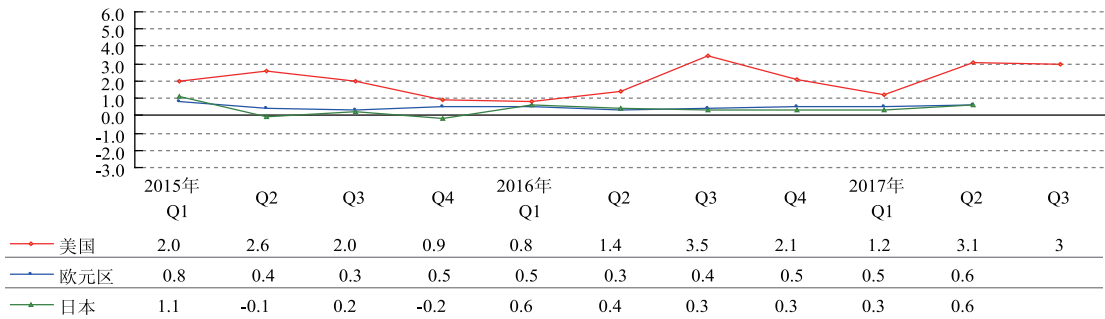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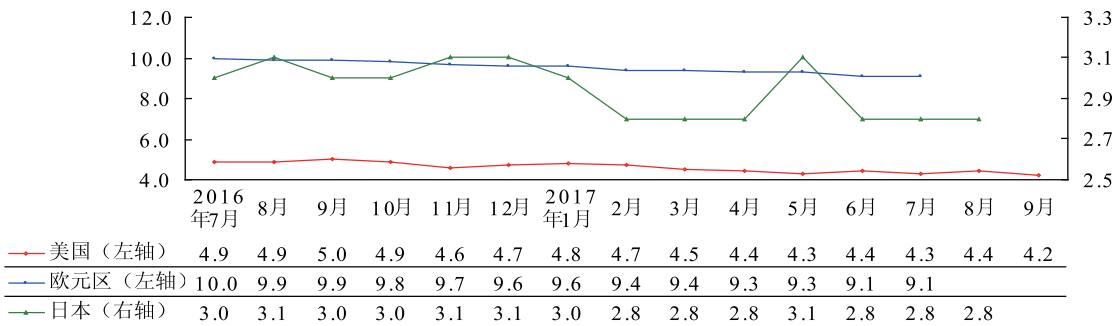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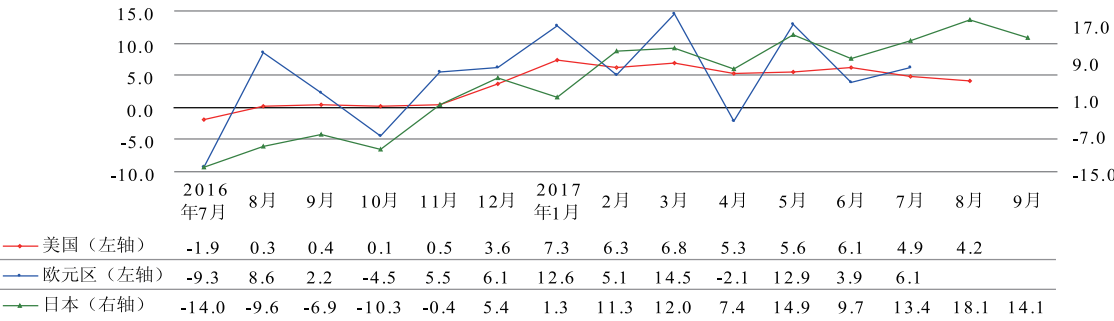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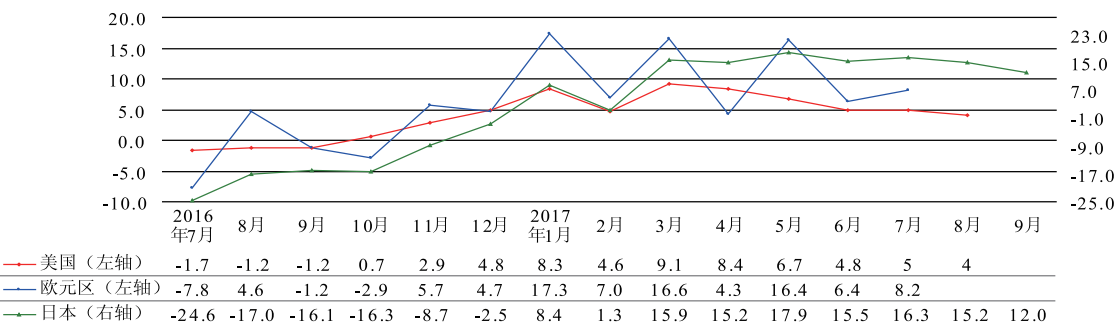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E—international trade”

Chen Wenling and Yan ShaoJun

The evolution of form and mod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 slow, gradual and natural process, but when the evolution continuously accumulates, to some certain conditions, disruptive reform or change will occur, becoming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mat or industry constantly replacing. E –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 evolution of trade form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industry changes, level of productivity and other variables, and it is the main trade way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will gradually integrate with the general trade, processing trade, border trade and procurement trad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oretically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evolution law of E – international trade mod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 – international trade.

(2)Wit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o constantly enhanc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oad——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Liu Qiya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overall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the country.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me major initiatives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eform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ystem and mechanism have been launched, promoting the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productivity, improving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innovative vitality, leading to great progres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level. Facing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continuous supply and demand contradiction, lack of ke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o 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 – driv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grasping the correct guiding ideology, doing a good strategic layout, and enhancing ability in the glob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3)The key to reshap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ang Xiaoho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ing, points out the weak capac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re

the main bottlenecks,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that to reshape the new advantag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quires placing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innovation strategy from imitation – tracking to the leading the leap,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sign to lead the manufacturing in China towards creation in China,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public business,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creating a enterpris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symbiosis,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How ca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become mature?

Huang Zhil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increased rapidly. However, growing up and increasing status do not mean maturity. Reviewing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which is full of twists, turns and firm exploration;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should be correctly evaluated; the lessons of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more worthy of our careful absorp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mature smoothly.

(5) Perfecting strategic reserve function and ensuring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He Xiaowei, Bie Zhenshuo, Guo Hong and Wei Xiaomi

Aiming at the grim situation facing the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monetary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as well as commodity reserve system construction, expounds the rel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strategic reserve and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and tries to propose some feasible measures of preventing financial risks to establish a enterprise joint stock mechanism, build cooperative security mechanism for reservation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mprove the strategic reserve function, and discusses the means and paths to scientifically apply reserve assets to prevent financial risks. 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strategic reserve function, constructing large reserves, reserve assets circulation, guaranteeing financial secur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reserve and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6)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mechanism releases new function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i Hongjuan and Liu Xianwei

In the important period of deepen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land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nd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activating the value of rural assets. Rur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endogenous dynamic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legal system, establish modern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new n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ur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 with symmetr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normative operation procedure will greatly release new energy for the reform of rural development, having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mentum.

(7) The trends, difficulties and suggestion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Yi Xin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China's urbanization will have five trends characteristics, with its focus transferring from the labor force urbanization to consumer urbanization, its driver changing from industry - driven to industry and consumer driven wheel, its mode shifting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and accelerating the city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and its form moving from big city led to city group led. At the same time, China's urbanization's further developments is facing the prominen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weak capacity of comprehensive bearing of cities and towns, biased development concepts, urban and rural du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shortage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China's urbanization should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ization, adhere to development mode with the people as the core, city group as the main form,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city as the suppor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the safeguard, and the innov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embark on the new urbanization path with people - oriented, reasonable layout of urban and rural, green low - carb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8) The movement trends of the US dollar index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 choice

Xu Changchun

The dollar circulation mechanism is the basis for the operation of Jamaic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at mechanism, the dollar index shows a depreciation cycle of about 10 years and an alternative 6 years' appreciation cycle. At present, the dollar interest rate rising cycle has started. However, the trend of the dollar index has exhibited a paradox of "ought to be" and "reality". This is because the current dollar index does not have a basis for sustained rising. Comprehensive judgment shows that, in the next year, it is more likely for the dollar index to be within the box of 115 as the upper limit, under great short - term downward pressure. In order to avoid the dollar interest rate hike risk, China should promote Sino - US FTA (FTA)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through market integration;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reate a goo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ably allocate diversific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enhance economic base of private sector, flexibly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9)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bay area development

Tian Dong and Wang Fuqiang

The international famous bay areas have features such as an open economic structu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convenient traffic system, strong innovation ability, livable environment, inclusive culture, strong agglomeration function, wide spillover e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 - Hong Kong - Macao Bay Area should learn from these characteristics, scientifically demarcate geographical scope, map out the level planning of Bay area's regional development, guide industries to avoid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build the quality life circle for the Bay Area and innovate mechanism and mode for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Editor: Huang Yongfu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